

中国经济，不是潜力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再"聪明"的经济政策也治不了经济体制的病
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决策层对待深层次改革的决心
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改革常常是逼出来的，不走入绝境，往往就下不了改革的决心
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之间的竞争
蔑视常识是我们社会许多悲剧的根源

自由与繁荣

Freedom & Prosperity

卫志民◎著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经济的未来

◎迷茫的中国改革

◎机遇和挑战并不总是对称的

◎中国改革的午休时间过长了

◎遏制两极分化应着眼于初次分配领域

◎用制度取代政策，用规则取代相机抉择

◎推进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中国人的“折旧率”应该比欧洲人高

◎国企存在的逻辑

◎我们要像信任党一样信任市场

◎关键是要消除滋生行政审批项目的体制基础

◎关于文化侵略

◎中国的学术腐败

◎经济学教科书的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学

◎没有财务自由，就难有思想自由

◎春天如果到来，坚冰必然融化

选题策划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封面设计　晨　曦





Freedom & Prosperity

自由与繁荣

卫志民◎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与繁荣/卫志民著.—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080－7402－3

Ⅰ.①自… Ⅱ.①卫… Ⅲ.①中国经济—研究 Ⅳ.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5394 号

自由与繁荣

作　　者　卫志民 著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200 千字
插　　页　3
定　　价　29.8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作者像

目录 contents

危机与改革



中国经济的未来

政策的药治不了体制的病，不能再试图用“聪明的”政策去掩盖体制层面的问题了，依靠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外需拉动、牺牲环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中国经济的出路取决于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深层次经济改革的态度。

中国经济将进入低增长时期？

如果你问我中国经济在某个特别的日期以后会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我恐怕只能诚恳地说不知道。我不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我也显然不可能有什么内幕消息，不知道最近会有什么重大政策出台。但我知道，中国经济在 2012 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这种困难不是简单的经济不景气，从根本上说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内生性的，尽管诱发因素是欧美大型经济体因为金融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所引起的外需骤降。

既然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内生性的，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只能依赖于系统性的结构调整，而非依靠相机行事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样的技术性手段所能解决。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好经济长期低迷的心理准备，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等待国际经济形势好转就能自然痊愈。

虽然不具备预测能力，但我愿意猜测一下。我猜测高层的宏观经济管理者们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他们清楚，长久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在存在严重结构性缺陷的情况下，依靠外需的强劲增长，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时

间的大量投入，依靠外来投资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依靠高储蓄率，依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获得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有其致命的弱点，一是难以长期维系，二是经济增长的成本过高，后遗症很严重。当然，宏观经济管理者明白，目前这种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是一回事，是否能够着眼于未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是另外一回事。决策者自然有决策者的难处，俗话说得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站着说话不腰疼。

事实证明，小平同志是对的，中国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不走入经济险境，深层次经济改革的决心往往就下不了。只有经济形势的发展威胁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才有可能痛下经济改革的决心，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经济改革总是意味着要承受新变化所带来的未知后果与风险，意味着目前利益格局的调整与既得利益的流失。所以，对于经济改革，我们总体上来看是说得太多，做得较少；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这样的问题谈得较多，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出台得较少；相机行事的政策调整太多，制度性的改革较少，总是应急、救火，而不大愿意立足长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不愿放手既得利益，又急功近利，要求立竿见影，怎么可能着眼根本、立足长远？同时，由于决策不科学、不透明，那些专注于短期政策效果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会矫枉过正、忽左忽右，从政策的实际效果上看，反而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对于实质性的改革常常只说不做，甚至玩打左转灯向右转的把戏，如以改革的名义搞国进民退、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部门利益、以经济改革的名义寻租。

不能再试图用“聪明的”经济政策去掩盖经济制度层面的问题了

2012 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低增长时代的元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可能很难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上去。从国际环境上看，至

少在最近三年，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不会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状态，美国的经济虽然已经探底开始回升，但也不能指望它能够重现格林斯潘年代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强劲需求，美国刚刚收获了一个大的教训，不可能这么快就忘记了金融危机的痛苦。欧债危机还在发展之中，欧洲人还未痛下决心告别高福利体制，他们的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难以重新旺盛起来的。

从国内市场来看，内需继续不足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中国的内需不足是由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内需不足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中国家庭部门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太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反过来说，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太多，国有企业部门的利润总量太大，寻租活动的规模太大。家庭部门本来就只有很低的收入，因为社会保障系统的缺失，因为住房、教育、医疗、中国社会未来的不可预见性等原因还不敢进行充分消费，或者已经被高昂的房价预先透支了。

如果继续走老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大量投资来刺激经济，驱动经济增长，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原本已经严重过剩的产能，势必会恶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然同时也伴随着宝贵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2008年银行系统的新增贷款余额为4.9万亿元，2009年、2010年、2011年的新增贷款余额分别为9.6万亿元、7.6万亿元和7.5万亿元，加上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投放的财政资金，加上地下金融系统的新增贷款，30万亿元的资金投下去，有什么效果？打鸡血、吃兴奋剂的办法无疑是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

再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上升也不支持中国经济继续走低成本扩张的老路。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工厂”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俨然已经成了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的晴雨表，只要中国统计局传出好消息，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必然上升，否则必然疲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很快，尽管还有一半的人口在第一产业部门就业，尽管中国劳动力供给上的

“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在经济学者之中还未达成共识，但大学招生规模的跨越式发展无疑已经使“刘易斯拐点”的症状明显出现了。由于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超前发展和超常规发展，目前每年的入学人数已近700万人，造成了“大学生产能”的显著过剩。大学生在总量上供大于求，就业日趋困难，工作状态和薪资水平正在迅速地蓝领化。同时，非熟练工人的供给日趋紧张，工资水平向白领化方向运动，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不断增强，熟练工人更是如此。而制造业所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多为蓝领工作岗位。把年轻人送进大学，表面上是积累了人力资本，为他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但人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还有个匹配的问题，超前发展必然导致过剩。同时，把这些年轻人送进大学也断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很难再成为打工仔、打工妹了。农二代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长年累月地通过媒体宣传那些对草根阶层来说不切实际的美好生活、现代生活，农二代们越来越难以接受他们父辈黄牛般辛苦劳作的生活了。他们要过现代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和薪资水平能够让他们过上电视中表演的那种生活吗？廉价的劳动力提前消失了。

激进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劳动力供给在急剧减少。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再加上时间成本上升、抚育成本上升、生存环境恶化、贫富差距等原因，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到比较危险的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所进行的人口普查，北京、上海、东三省这些地区，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大体上仅为0.7，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广西也仅为1.7左右，大大低于完成正常世代更替所需的2.1水平。可以预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劳动力的成本一定会保持持续、快速上升的态势。

土地的成本短期也难以显著下降。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土地的供给不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自然增加，土地的供给量受行政力量的支配而非供求定理的支配。为了土地多卖钱，地方政府自然不愿意充足地供应土地，自然会受到很强的激励去人

为地制造土地供应的短缺，人为地通过抑制容积率和小面积住宅单元的供给数量来抑制住房的供给，同时去打击住房“黑市”——小产权房。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不但透支了中国未来的市场需求，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各行各业商业活动的成本。

环境方面的成本也在上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常被人称为涸泽而渔式的甚至是断子绝孙式的发展模式。如果我们把过去30年的环境成本也计算进去的话，我们的GDP还能够剩下多少真就是个问题了。也许将来治理这些污染、恢复生态环境所需耗费的代价在价值上会超过我们先前所取得的产出。现在我们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到了人民容忍的临界点了，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导火索，厦门、大连、启东、宁波这一连串的事件都因环境议题而起。

所以，原来依靠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外需拉动、牺牲环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渐渐地走到了尽头。

未来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不能再试图用“聪明的”政策去掩盖制度层面的问题了，中国经济的出路取决于管理层对改革的态度。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人均GDP还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50%，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空间也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还根本看不出人类想象力、创造力的边界，基因非常出色的中国人更是如此。中国缺的不是钱，中国缺的是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投资机会。

应该从六个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如何才能够让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变为现实呢？不能光靠投资、靠大建“铁公机”，要靠制度变革、体制创新。对于改革与创新，我们不能只喊口号，只谈理念。那么，具体来说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改革呢？我想应该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是保护私有产权。政府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同样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得不到有力的保护，企业家创业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民营经济部门的投资就会短期化，人才和财富就会外流。

第二是改革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不是政企分开，不是管理创新，不是强制分红，更不是抓大放小、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布局调整。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设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只有在市场失灵的经济领域才需要政府介入。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国有企业是一个如何尽快退出的问题，而不是加强管理、做大做强的问题。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越大越强，这个市场的竞争性就越弱，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受损害。凡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地方，必然伴随着进入管制、不公平竞争、价格管制。即使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仅仅意味着提供预算，而不必然意味着设立国有企业。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最先进的战斗机都是由民营公司提供的，政府下达订单即可。美国的航天飞机退役后，往太空运输物资的服务就是由一家民营公司提供的。国有企业凭什么政企分开？凭什么自主经营？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生存于竞争性经济领域，不让它自主经营，它如何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呢？让它自主经营，岂不是变成了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了一种变相的“经济割据”和“官僚资本”，出资人的利益如何保障？至于在民营化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一个规范与监管的问题。不进行民营化，跑、冒、滴、漏，国有资产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失吗？因噎废食的想法并不可取。至于“国计民生”的理由，把人民置于其自身利益的对立面，甚显荒唐，自相矛盾，不足道也。至于“执政基础”的理由，同样荒谬，政府运行所需经费，大可光明正大地动用征税权去解决，大量低效国有企业的存在不是稳固了执政基础，而是在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千万不要忘记经济增长是我们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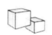
第三是打破行政垄断，解除经济管制。垄断这种经济现象，所有类型

的经济体都会存在，但中国经济中的垄断却与众不同。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垄断与微软公司的垄断不同，我们的垄断大都是各级政府创造出来的垄断，属于行政垄断，是政府保护的结果。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是经济垄断和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效率的体现。如果能够对国有企业完成布局调整，将国有经济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行政垄断就自然破除了。行政垄断降低了市场的竞争性，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减缓了企业创新的速度，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次价高，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经济管制不仅窒息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压抑了中国人的创造性，经济管制还是滋生寻租活动的肥沃土壤。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消经济管制就是清除官员腐败行为最有效果的措施。扬汤止沸远不如釜底抽薪。在中国，经济管制无处不在，所以，寻租活动也就泛滥成灾。与经济管制无处不在的状况同时并存的是社会管理，不论从质还是从量的角度去衡量都严重不足。原因很简单，经济管制体现的是权威，带来的是利益，即所谓租金；而社会管理提供的是服务，体现的是责任和义务。都愿意管别人，不愿意被人监督约束，都喜欢金钱和享受，不喜欢辛勤劳作，此为人性使然，非觉悟也。这就是为什么行政审批取消一批又长出一批，甚至越清理越多。

所以，管制与管理不同，取消经济管制不是要不要政府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科学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转变政府职能，把我们的各级政府改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的问题。这个政府不仅是服务型的，还是有限的、透明高效的、强大的。这就是我想说的第四点，转变政府职能。

有限的含义就是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活动的范围，总的原则就是政府经济力量只在市场失灵的经济领域存在，如提供国防、外交、司法等公共产品，界定产权，维护市场秩序，制约企业的市场力量，消除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国务院在清理整顿行政审批项目的时候说过，凡是民众能够自决的，政府都要退出；凡是市场可以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否则



许多问题不早就解决了？但说总比不说好，至少能够起到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透明就是要有一种机制保证把政府的活动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也就是说要有一种制度机制保证把政府拥有的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之下，置于法律的笼子中。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保证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而不是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的上级。谁给予他权力，他就会向谁负责，这是铁律。

如果政府的活动透明了，社会的言路畅通了，各级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就不再会是僵化的了，就会对民意做出灵敏的反应，犹如企业家一样，就会具有纠错能力，就能够不断进化、不断完善，就会变得生机勃勃。

第五是降低税赋水平，调整税收结构，抑制非税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在现在的体制下，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政府主导的，种种理论不过是在为它做理论背书而已。政府要主导，必然会拥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必然要控制尽可能多的经济资源，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必然会集中大量的经济力量来干预经济活动，壮大政府力量，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同时，政府的权力得不到制约，所以，财政收入大幅跑赢 GDP 和居民收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民营经济部门尚可在夹缝中生存，政府的财力也可同步大增，但在今天经济增速下滑的阶段，民营经济部门高增长时代尚能勉强背负的高税负、高物业租金、名目繁多的收费罚款，就越来越变成一种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抑制非税收入、调整税赋结构、降低整体的税赋水平，迫在眉睫。

但降低税赋水平与完善社会保障系统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方面有相当大的空间。看看环绕北京城区的会议中心，看看高档酒店、饭庄、旅行社的发票存根，看看大街上无处不在的豪华公车，就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减税的空间。况且政府手中

还控制着海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还有一百多家巨型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我们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出售，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账户和养老金账户。

共建美丽中国

中国需要改变，问题是谁来改变中国，如何改变中国？

中国的经济改革事业陷入徘徊犹疑的状态，这并不难理解。在目前的利益格局中，各级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自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既是改革的领导者，又是主要的改革对象，自己革自己的命，当然很困难。看看官员公布一下自己的私有财产有多困难，看看全国住房信息的联网有多困难，你就知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会牵涉到他们多大的利益了。但虽然如此，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永远不会由单个利益集团所决定，而是由所有利益集团的合力一起决定的。所以，即使你非常不幸地生来就是草根，也不要自惭形秽、愤世嫉俗、心灰意冷、轻言放弃。你也许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至爱亲朋吧。你可能不知道，你在慢慢改变自己的同时，已经在悄悄地改变着这个世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既包括权贵，也包括屌丝。你选择了鲜花，这个世界便多了一缕芳芳；你选择了灰暗，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丝光亮。不要问谁是英雄，不要问什么时候春暖花开，而要问你为美丽中国的建设做过哪些努力。

迷茫的中国改革

许多改革实际上是沿着强化强势集团利益的方向进行的，对广大民众来说似乎称为“折腾”更合适一些，以至于现在民众已经开始害怕改革了。现实中的许多改革，是在革别人的命，革弱势群体的命。这些形形色色的改革把原本就缺乏安全保障的民众抛入到日趋白热化的生存竞争之中。这些“伪改革”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改革的热情，甚至把这些“伪改革”的受害者驱赶到改革反对者的队伍中去了。

中国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到底是什么？这是个问题。中国的改革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凌乱的、碎片化的、被动的和临时对付的特点。

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是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各个领域的改革、各个层面的改革都应该在同一个虽然可能是粗线条的但却没有结构性错误的大框架下来进行。应该有个整体的规划，这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一项具体的改革，即使是微观层面上的改革，都能构成整个战略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如同一个摔碎的瓷瓶，每一个碎片都是这个瓷瓶的一部分，看似不规则的碎片却能复原为一个漂亮的花瓶。否则，这些具体的改革就有可能要么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要么是服务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我们回过头来检视一下，在过去的30年中，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我们不断地进行着各种改革，不断地总结出数不清的先进经验，不断地取得效果良好的制度创新，但这些经验与创新大都非常短命。我们的制度建设在很多方面就像我们的城市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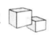
设一样，总处于缝缝补补或拆了建、建了拆的折腾中。

我们原本是个喜欢制定各种规划、战略和计划的国家，但在改革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上却似乎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由于缺乏整体规划，我们的改革显得很凌乱。当然，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涉及所有领域深层次变革的系统工程，但也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必须在所有的领域同时展开改革，也不意味着完全不能采取过渡性的改革措施。我们当然不能分两步跨越深渊，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悬崖。

为什么全社会难以就改革的最终目标达成一致呢？就管理层来说，主要涉及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制约。现在这个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个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是行政权力和垄断利润密切结合的市场经济，是扭曲混乱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明显过渡性质的制度安排。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各级政府在竞争性经济领域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控制着土地、资金等重要的经济资源，掌握着大量可以直接干预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权力，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这些权力没有得到民众的有效制约。这样，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就能自由地寻租设租，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就是一个在所难免的结局。任何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都指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大既得利益集团的管理层自然不愿意明确改革的终极目标，而采用各种“伪改革”来强化自己的权力，或平抑民众对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的诉求。

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管理层中也有一些人在21世纪的今天，还沉迷于把人民（这个国家的主人）当做防范的对象、在竞争性经济领域维持一个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集中力量办大事、规划许可这些旧思想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就有强烈的动机去刻意模糊改革的远期目标，强调国情，强调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强调渐进的好处和必然性，甚至把那种主张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去设计改革方案

的人斥责为理想化、天真幼稚、不切实际。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拖延改革，防止改革走向深入，走向自由竞争的、现代的市场经济。管理层甚至还会利用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以刺激经济、加强宏观调控、整顿经济秩序的名义，把加强政府干预经济、干预市场的能力当做应对经济衰退的手段，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改革离现代市场经济越来越远。也有一些管理层以外的人在思想观念上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受原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反对市场化改革。这部分人虽然不是既得利益者，但却常常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沦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一股力量。

由于改革是由管理层主导的，所以，我们的许多改革都是非常被动的，甚至是动机不纯的。被动就是不拖到十万火急的时候不改革，不到崩溃的边缘不改革，所谓“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只要日子能够过得去，管理层就会失去改革的动力。近年来，中国改革的步伐停滞了，所以，寻租活动愈演愈烈，经济管制不减反增，行政垄断横行霸道，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生态环境严重透支，各种社会矛盾在不断累积。所采取的改革措施通常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愿意从长计议、采取治本之策，而喜欢玩些小聪明、小技巧，搞权宜之计，缺乏大智慧、大格局，缺乏历史的责任感。所以，感觉总是在救火，总是在仓促应付。

动机不纯指的是许多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拖延，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倒退行为。近30年来，改革作为时代的主旋律，从未离开过我们，各级管理层从未停止过改革和总结改革经验，但许多改革实际上是沿着强化强势集团利益的方向进行的，对广大民众来说似乎称为“折腾”更合适一些，以至于现在民众已经开始害怕改革了。现实中的许多改革，就是革别人的命，革弱势群体的命。这些形形色色的改革把原本就缺乏安全保障的民众抛入到日趋白热化的生存竞争中，但政府的权力在这些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和制约，反而日趋扩张和强大。这些“伪改革”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改革的热情，甚至把这些“伪改革”的受害者驱赶到改革反对者的队伍中去了。

顶层设计，并不是高层人士或高层机构设计的意思，而是一个具有清晰终极目标、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民众长远利益和真实要求的整体规划。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这个面向未来的顶层设计只能主要由管理层自己来做。

总体来说，现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机还没有到，即使有个总体规划出来，也是个过渡性的“顶层设计”。中国的改革只能在政府包容、底层推动、启蒙普及、理性讨论、外部善意示范、充分借鉴这些前提条件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在政府、民间、学界、国际社会的合力下歪歪扭扭地前行。可以缩短这一进程，我们可以平滑改革的实际路径，但我们绝对无法略过这个过程，也无法把它变为一条笔直的短线。

机遇和挑战并不总是对称的

为什么非要等到山穷水尽时才去拼命求得柳暗花明呢？我们的改革常常是逼出来的，不走入绝境，往往就下不了改革的决心。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挑战和机遇放在一起谈，这是一种国情的产物，一种平衡术，一种自我保护的安全措施。

只谈挑战，容易让偏激的听众指责为偏激，指责为看问题不全面，指责为散布悲观情绪。只谈挑战，也会被喜欢极端化的听众指责为没有指出解决的路径，从而是没有意义的废话。所以，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舆论环境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就是一种政治上比较正确的表述方式。

但是，即使没有指出解决的路径，仅仅是把问题本身认识清楚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或者对所存在的问题缺乏一个最基本的认识，那么就根本谈不上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法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况且，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机遇与挑战，不见得一定要在一篇文章或一个发言中都涉及才算是全面，可以单独谈其中的一个问题。如果言论没有受到限制的话，针对一个问题的各种各样的看法都能允许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然就会在宏观的层面上实现一种平衡，对一个问题认识自然就会不断深入和走向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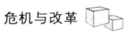
就管理层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而言，如果从挑战和机遇的角度去表述，我认为可以用两句话概括：所面对的挑战前所未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正在迅速地离我们远去。

管理层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五个大的方面。

一是管理人员的腐败。如果我们把每年遭到党纪国法处理的干部数量和公务员的数量做个比较，公务员群体可能要名列中国社会犯罪率最高的群体之一，而这部分人理论上是我们社会最精华的一部分人、最先进的一群人、最进步的一群人、政治觉悟最高的一群人，他们受上级之托在管理着这个国家，当然是以人民的名义。更为不幸的是，目前各种数据和个体的微观生活体验都不支持这个群体的犯罪率正在下降的结论。

二是贫富差距。近十年来，没有官方的基尼系数可以引用，各个研究团体的估算高低不一，但都在0.4这个国际通用警戒线之上。各大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客户信息所进行的统计表明，2%以上的账户控制着50%以上的银行存款。我们知道，越是高资产净值人群，其资产的多样性越明显，银行存款在其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低。我们社会中不同家庭之间收入分配和资产拥有方面的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够比西式的民主国家更好地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优越性之二是能够比西式的民主国家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所有统计数据都不支持这个理论上的优越性。

三是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破坏。与国际上的兄弟“单位”相比，我们管理层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度过高，速度稍微慢一点就睡不着觉，惶惶不可终日，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也许只有高速度才能够让大多数依靠工资性收入生活的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或者勉强与通货膨胀率打个平手。因为家庭部门的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近10年来是下降的，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又那么高，GDP的增长速度低了，社会就会不稳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管理层管理这个“单位”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我们过分依赖增长速度，导致管理层为了今天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牺牲一切，仅在语言上讲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在行动上常常无暇顾及增长的质量。这种经济增长只有今天，没有明天，没有未来。许多人把我们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批评为断子绝孙式的经济增长，不无道理。

四是社会管理能力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严重脱节，这在食品安全领域和环境保护领域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若干年后，当我们迎来癌症潮的时候，管理层如何面对草根大众怨恨的目光呢？北京市民死亡原因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肺癌，尽管我们的媒体尽最大努力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吸烟，并在北京市所有的公共场所实行全面禁烟，但肺癌发病率还是稳步上升，因为我们无法不呼吸、不出门。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到现在还不愿公开讨论 PM 2.5 的真实状况，还在矫情外国机构该不该擅自发布空气质量检测数据、所发布的数据准不准、规范不规范。

五是老龄化问题。过去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把人口多以及国民党政府运走大陆银行的黄金这类因素当做大陆地区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并以此为依据开始执行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直至今天。作为一种常识，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和失业率与 GDP 的增长率根本就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一头母牛生下牛犊都不会被看做是社会的负担，人却被看做是社会的负担，这是什么逻辑！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同时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人，是什么原因使他无法成为生产者，从而只能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成为社会负担的？虽然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但今日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落后，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受到了自然资源的约束。资源贫瘠和自然环境、政治环境恶劣的以色列在经济上能够取得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随着 GDP 的增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必然会下降，现在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无一不为这个问题头疼，而我们的管理层还通过无情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这个问题，真是不可思议。中国的老龄化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在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中，计划生育部门是个比较弱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我们连这个利益集团都摆不平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对中国的改革前景维持乐观的预期呢？

在我们目前这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普罗大众的生活如此艰辛，生存如此不易，你怎么可能指望我们的 90 后、00 后们为了 60 后、70 后们多生孩子呢？发达国家的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呢。中国的草根民众在未来也

许连婚姻都负担不起，或许爱情与婚姻已经变成了奢侈品或一种传说，可望而不可及。

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面对老龄化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延长退休年龄，同时维持一个非常低的公共养老金水平。我很担心20年后的公共养老金无法维持一天三碗拉面的消费，很可能是这样的。这样，即使政府不强制延长退休年龄，国人又怎么能够退休得起呢？也许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倒在工位上，就是我们草根民众的最终结局，工位就是我们最终的归宿。老龄化几乎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尚未看到有哪个国家曾经成功地解决过这个难题。

如果对未来抱有单纯的乐观态度，毫无疑问是一种糊涂的表现。如果对未来悲观绝望，就是消极。消极就会导致不负责任、无所作为、得过且过，甚至抱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乃至移民、转移财富，把中国当做是一艘巨大的泰坦尼克号，随时准备弃船逃走。面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问题，积极应对，立足长远，全盘规划，标本兼治。许多问题拖到今天已经晚了，但今天不着手解决，明天更不好解决。

改革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做的。只说不做，不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忽悠吗？心理战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战术，不能指望依靠心理战取得经济可持续增长、民族复兴这场大型战役的胜利。

挑战和机遇不总是对称的，不总是同时并存的。机遇是稀缺的，否则还叫什么机遇呢？稀缺的就是珍贵的，既然是珍贵的就要珍惜。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改革就是避免我们的社会陷入无序和混乱的唯一途径。

中国改革的午休时间过长了

自由竞争不是不要政府，不要法治，恰恰相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自由竞争、公平竞争都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

总有观察家预言中国经济即将陷入危机，但中国的经济至今没有如他们所言，陷入不可恢复的困境。是这些预言家怀有不可告人的阴暗目的，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唱衰中国？还是这些观察家学艺不精，缺乏洞察力？抑或兼而有之？这其实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没有认真回答的价值。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的健康到底有没有问题？问题有多大？需不需要留院治疗？

坦白地讲，如果一个具备专业分析能力的研究者用专业的态度去研究中国经济，他很可能会情绪低落，乃至抑郁寡欢。因为稍具专业水准的观察家心里都明白，中国经济如果继续留在目前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这个轨道上，它的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许多悲观的中国经济观察家的预言都失败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败在了他们所提供的中国经济倒下的时间表上。这就好像一名医生，去预测一位罹患重症的病人还有多长的剩余时光。一名医生不应该预测患者的生命还有多长，这是有悖医德的。他应该竭尽全力地去探明病人的病因，确定最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并努力说服病人接受治疗，使其尽早恢复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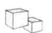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中国特色或有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彻底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经济系统。这样的一个经济系统，其实现的增长注定是低效率的，从而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在这个半政府管制的经济系统中，拥有雄厚资源和充足政策手段的各级政府的权力还得不到民众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政府官员可以随意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去自由设计各自辖区的经济增长路线图，或为寻租，或为抱负，或二合一、三合一，无疑就是雪上加霜了。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增长的效率与代价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近几年来一直陷入胶着状态，国进民退的反复已经引起了许多中国经济观察家的忧虑，虽然不是每个中国经济观察者都认同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已经显著地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但这样的说法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重新启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常说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做好几件事：解除政府经济管制，向民众开放经济机会；积极而富有诚意地创造条件，尽快在竞争性领域把国有经济力量撤出来；调整税收结构，降低平均税负水平，恢复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管理，改变政府管制泛滥、管理不足、“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局面；富有诚意地、主动地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改变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机制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提高市场的自由度和竞争性。

如果不在这几个方面诚心诚意地改革，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什么科学发展，什么可持续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化为一种口号、一种表态、一种良好理念的宣示。

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变轨，必须摆脱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这条老



路，积极主动地走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自由竞争不是不要政府，不要法治，恰恰相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自由竞争、公平竞争都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必须主动变轨，但中国经济如何变轨？要重新启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个老项目，必须首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新项目。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启，在目前现实制度环境的约束下，虽然存在官民相互促进的过程，但无可选择地还是只能由政府来主导。我们能够做的、应该做的就是不懈地推动改革，去开阔自由空间，点点滴滴地去培养和积攒社会中积极、健康的力量，通过自己微弱的力量，用正确的理念和坚定的行动去寻找我们的未来。

中国的经济改革未死，只是午休的时间太长了。

遏制两极分化应着眼于初次分配领域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中国经济之福，而是中国经济之祸。

我们其实一直没有权威的基尼系数，但似乎统计部门已经默认中国的贫富差距到了不便细说的程度。世界银行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1%的中国家庭拥有了中国41%的财富；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 500元以后，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就只剩下2 400万人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税了；《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蓝皮书》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2月至2011年3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达107亿美元（不含私人飞机、游艇与豪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还多，以微弱差距位列世界第二，预计中国将在2012年毫无悬念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这样的证据还有很多。

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的确让人非常难堪。但中国拥有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是符合逻辑的，是一系列"因"的必然产物。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来驱动，而土地和资本主要掌握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这样，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作为资本和土地所有者的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自然就大大快于劳动的所有者。所以，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每况愈下、内需不足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在市场竞争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垄断，是基于效率形成的，因为市场是

开放的。只要不存在损害市场竞争性的行为，单纯市场占有率意义上的垄断对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没有损害的，这种垄断也是暂时的。看看“世界500强”榜单每年的变化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百年老店何其少也，何其难耶！但在当下的中国，行政垄断却成为中国经济领域垄断的主要形式。这些凭借政府进入管制保护的垄断者，利用其对市场和公共资源的垄断，获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成为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巨大来源。数据显示，在中国最高收入的行业与最低收入的行业之间，雇员的平均收入相差15倍。站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最繁华的十字街头，你都会发现，耸立街道两侧的豪华建筑大多属于两类机构：政府机构和国有垄断部门。

政府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愈演愈烈的寻租活动。伴随着这些寻租活动，国民财富围绕着权力快速地聚集，这些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领域能够滋生出那么复杂的经济管制体系的根本原因。经济管制部门有点像商业部门了，俨然成为中国最强大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听到“一定要打破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之类的狠话时，总是不敢抱十足的期望。

所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源头在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从初次分配领域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仅此二次分配领域通过税收来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整，就难免不是通过治标来替代治本，回避治本。

要形成较为合理的初次分配结构，必须围绕向民众开放经济机会、提高中国经济的自由度来进行。

首先，要在竞争性领域打破行政垄断，给民众开放经济领域。我们许多行政垄断是以国计民生为理由设置的，但在制度和政策设计上把民众当做是可能会伤害自己、需要严加防范的一种力量，其本身在逻辑上就是非常荒谬的。剥夺了民众创造财富的经济机会，就是剥夺了民众获得收入的机会。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这些行政垄断领域已经形成了强大的

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改革的内容、方向和节奏，但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难以打破不等于无法打破，也不等于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奇迹的发生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良心发现。认识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最终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基础。

其次，摆脱既得利益集团强加给我们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竞争性经济领域撤出国有经济力量，把被少数国有企业和少数人占据的经济资源从行政垄断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再次，转变政府职能，解除经济管制，消除政府部门寻租的制度基础。在现有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变革的前提下，解除经济管制就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反腐败政策，正如取消关税能够在一瞬间消除正常物品的走私一样。我们目前的状况是经济管制错综复杂，社会管理漏洞百出。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保护私有产权、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经济秩序、保护环境，而经济管制的核心是限制市场竞争，保护既得利益集团。

最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非有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政府的有形之手只应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存在，正如一个家庭不会雇用保姆替他旅游、看电影一样。

如何才能让政府少花钱?

政府收税有个特点，即把钱先收上来，然后再考虑如何花掉它。不是以支定收、量需为入，而是把政府当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了，财政收入多多益善，只怕不够花，何愁花不完?

如果把我们这个经济体比作一个家庭的话，现阶段的地方政府就像是这个家庭里可以自行其是的阔管家。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虽然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在2011年刚刚超过5 000美元，排在世界第93位，仅为美国的1/9。而且中国内部的贫富差距极大，虽然自2000年后“管家”不再公布家里基尼系数的数据了，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在0.5以上，大大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比较能够说明一国平均收入水平的指标本来应该是“中位数收入”或“众数收入”，但这两个统计指标具有政治上的天然缺陷。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12年以前，长时期以两倍乃至三倍于GDP增长速度的速度高速增长，成为我国国富民穷格局得到不断强化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2012年中国的经济比较疲软，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跑赢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中国政府收税有个特点，即把钱先收上来再考虑如何花掉它，不是以支定收、量需为入，而是把政府当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了，财政收入多多益善，只怕不够花，何愁花不完?每年的第四季度都是财政资金支出的旺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财政活动根本得不到纳税人的有效监督。中国的各级政府过去都把财政预算列为机密信息，属于

“秘密”等级，这是非常荒谬的。本来财政预算应该挂在网上广而告之，接受纳税人监督的。每年人大开会审议各级财政预算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仅仅按照功能报告一下大数，比如教育多少钱，军事多少钱，没有细目，根本无从审查其合理性。

中国政府征税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以间接税为主，被人征了税还蒙在鼓里。我们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占的份额不到一成，但你消费任何一种东西或服务都在悄悄地纳税。政府收取的土地租金更可怕，一下子就征到了21世纪末期。你在北京买一套住宅，五环内100平米公寓类住宅400万元一套，其中买主支付的政府预收75年的土地租金就能够占到一半。几百万元现金，读者可以算算，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你一生能够挣多少钱？最近政府要在试点的基础上推广房产税，这意味着你交给了政府上百万元的土地租金，还要为自己租来的“别人的”土地根据土地的市场价值再纳一次税。土地日后涨价了，你还要不断调整纳税额，政府会给你的住宅定期评估。

那么，如何让政府少花钱呢？首先是别让政府太有钱。那如何节制政府？这可真是难倒我了。我是个庸医，嘴硬不愿意说自己看不了政府乱花钱的病，就说几点没有用的药方吧，其实只是一个改革的方向而已。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按照自由竞争的、法治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和现代政府的要求，以此为改革的远期目标设计改革方案，科学界定政府的边界。政府的活动范围小了，政府的规模才有可能缩小，才更容易做到缩小财政收入规模。现在政府有那么大的活动范围、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多的钱，能不乱花钱、能不成为败家子吗？以前根本没有什么制约政府的力量，现在还有微博、论坛、手机短信这类东西简单制约一下，有聊胜于无。科学界定政府的活动边界，也意味着未来的政府将以提高公共产品为主，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样的认识和转变都非常有利于政府财政收入规模缩小和支出更加合理。

二是推动政府财政预算的公开透明。只有公开和透明，才有可能科学

合理。不用担心老百姓看不懂预算，看不懂是因为政府不想让老百姓看懂。只要你全盘托出，大白于天下，不专业的网友就能告诉政府什么支出是合理的，什么支出是不合理的。至于那些普通网友判别不清楚的部分，别忘了还有专业网友呢？专家教授、政府总理也是上网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税人根据常识判别即可明白七八分。例如，地震局用于地震预测的支出仅是用于购买公车支出的几十分之一，就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常识不会错。关起门来搞预算，偷偷摸摸的，不敢给纳税人看，肯定不是科学的、合理的，否则就给你看了。

7.5%还是8%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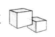
如果一个社会充满公平正义，即使零增长也未见得就一定不稳定；如果一个社会贫富悬殊、赢者通吃、弱肉强食，即使经济高增长也未见得就能心平气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够经受得住经济的低增长了，什么时候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裁判员不再关心比赛的结果，而是开始关心比赛过程是否公平有序了，中国社会就真正走向和谐幸福了。

谨防“打右转灯向左转”

2012年3月6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增长目标设置为了7.5%，而去年的增长目标是8%。这样的调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调整很重要吗？这种改变到底有多大的理解空间呢？

从技术的角度看，这样的变化首先意味着中央政府放弃“保8”了。管理层意识到，美欧经济恢复和提高国内家庭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并非一日之功，通过地方政府政绩工程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再继续走下去也太危险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再加上通货膨胀和国企改革的停滞，都意味着继续通过以往的激素疗法去刺激经济是比经济减速更危险的事情。

其次，中央政府用改变这个作为预期目标的数字，向外界再一次做了宣示，中央政府将继续维持其过去一贯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反对唯经济增



长的政绩观，反对那种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地去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将一如既往地认为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追求可持续的公平正义的经济发展。

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措施，如果没有展示决心的具体措施，如果没有真正瞄准病源的具体措施，如果没有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在阻碍中国经济转型、阻碍法制的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形成的力量最终扣动扳机，仅仅是以不断加重的语气去表达一些一如既往的主张和理念的话，我们就未免会担心，中国经济在未来还会在管理层正确理念的不断宣示中，在管理层苦口婆心的劝诫中，在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涸泽而渔式的老路上越走越远。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如何如何”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如何”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如何去达到自己所宣示的目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了没有。最重要的是，你所采取的行动是不是能够达到你所宣示的目标，还是指东打西，打右转灯向左转。

主动调整还是被动选择?

从8%调整到7.5%，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但即使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也最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从这个角度理解，也是科学与理性最终占据了上风。所以，依然具有积极的含义。

说被动是因为，如果不是我们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的速度，在现实意义上已经清楚地表露了无法继续安全地维持原有的增长速度，也许国家不会在2012年3月去调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值。所以，这种调整显然存在被动跟随的味道，被动跟随的味道大过主动引导的味道。

如同我们的许多经济改革都是逼出来的一样，不到万分紧急，不陷入险境乃至绝境，管理层往往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做出让步，做出利益上的让步；往往就难以迸发出足够的改革勇气去触动一下既得利益集团。在任何

国家，经济改革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严峻的现实状况被动地推着向前走的，而不是在一个全面系统的、有清晰改革目标、着眼于未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全面规划下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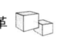
这种调整当然也含有管理层主动引导的导向含义。管理层再次表达了自己并未搞 GDP 崇拜，也从未主张过。中央政府 20 年来一直在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意义，要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由外延式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内涵式的经济增长，后来又提出了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绿色增长等新说法，其实意思都差不多。说了 20 年还在说，这说明管理层说得太多了，做得太少了。我们经常说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对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

为什么会说得太多、做得太少呢？就是因为经济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到了今天的这个层次，改革已经无法按照帕累托改进的方式来进行了，改革已经无法在每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都不受损的情况下继续向前推进了。

中国的经济失速来得过早？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经济体，利用其“后发优势”，长期维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容易实现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低也有其必然性。这就犹如一个考 40 分的同学，把成绩提高到 60 分、70 分是比较容易的，但要一个学习好的同学把成绩从 90 分提高到 95 分，就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了。这在经济学上叫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但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经济失速来得过早了，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还过早吗？的确如此，中国的长期快速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新闻语言，可以称为“经济奇迹”，但从学术的角度，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现代经济学完全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从



最本质上说，就是市场经济的成功，就是自由竞争的成功，经济自由就是中国经济30年快速发展的最基本经验。

劳动时间的巨量投入，自然资源的巨量投入，让人不敢正视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利用后发优势所获得的飞速的生产技术进步，国民收入令人心酸的超低消费率，地方政府年复一年的大兴土木，自由的富有秩序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就凑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无法再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了，大家勤奋得都疯狂了，抑郁了；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可以透支了，我们还有子孙后代呢；如果我们不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全世界的能源都给我们使用，也无法一直维持现在的增长速度；环境与生态破坏的情况就像PM 2.5一样，终究会浮出水面，不可能永远藏起来，治理污染、恢复生态所需耗费的金钱将来会超过我们以此为代价所获得的财富；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已经没有多少了，毕竟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了，我们不能总是扮演学习者和模仿者，要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我们就终究得演变成创造者、人类文明的贡献者；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可能年年都以大幅高于GDP增长速度的速度增长，总有个极限，目前已经接近极限了，老百姓毕竟还是需要衣食住行这些基本消费的，总得给大家留点钱；地方政府多年来的大拆大建已经闯下大祸，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起，把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很难设想继续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了；美欧这些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未来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蒸汽机、电、计算机技术这类划时代的技术创新推动，很难预期他们能够获得高速经济增长，从而对我们产生旺盛的出口需求，况且他们的老龄化问题以及与此高度相关的政府债务危机都非短期内能够解决；世界的平均关税已经很低了，贸易壁垒虽然没有完全消除，国际贸易领域还存在很多贸易摩擦，但自由贸易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世界上局部动荡乃至局部战争目前正处于活跃期，因为世界在转型，但转型的方向和结果是和平和民主，这一点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是

有利的。

没有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是没有未来的！

在现有的体制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调整政府宏观调控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值也是必然的，国内外各种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基础的因素，其演化方向大多数都是对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速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不利的。如果管理层不在行动的层面上实质性地推进深层次制度变革，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很快将突破中国这个经济体的最高载荷，成为我们无法承受的一种致命负担，为我们带来难以承受的可怕后果。

所以，我们不是无计可施，更不是别无选择、只能走向失序和动荡，有很好的选项在等待着我们去选择，那就是通过改革，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法制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只要管理层能够勇敢地选择深化改革，中国经济还能快速增长 30 年。良好制度的威力，能够为中华民族带来难以想象的制度红利。

如果我们建立起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就不要讨论中国经济要以多快的速度增长这样无聊、愚蠢的问题了，这完全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特有产物。这就好像父母整天考虑自己的孩子一年应该长高多少厘米一样。父母应该考虑的是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环境，至于长高多少，只是个结果而已。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因”，而不是“果”。如果只把眼睛盯在果上，就容易产生喂孩子激素、刺激其长高的冲动。特别是在邻居山姆大叔家里的孩子个个都是高富帅、自己家里的孩子总想找理由去他们家里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如何建立起法制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呢？以认真的、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任的、面向未来的态度积极地去创作条件，将国有经济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破除行政垄断，向这个国家的主人开放经济领域，不要再把他



们当做防范的对象，更不要与民争利；解除名目繁多的经济管制，实行对内开放政策；加强经济管理，加强法制，保障民生，创造一个透明公平的商业环境；优化税收结构，简化税制，降低平均税率，恢复经济活力，改善实体经济的制度环境。若能如此，则是民族之大幸。

GDP的预期增长率，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可以预测，但不可去直接追求。政府最好也不要预测，谨言慎行，少说话，多做事。政府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能够保证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若能如此，共享的、高效率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水到渠成、不请自来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够经受得住经济低增长了，什么时候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裁判员不再关心比赛的结果，而是开始关心比赛过程是否公平有序了，中国社会就走向正常了。

7.5%还是8%，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

用制度取代政策，用规则取代相机抉择

> 我们的市场有两只手在配置资源，政府这只大手强有力、自私而僵硬，市场这种小手虽然灵活但发育不良，扭曲变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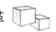
总理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

所谓的"两难"，当然指的是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在政策选择和改革方案选择时所面临的一种困局。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时，都会遇到两难的局面，只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会面临更多的两难选择，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当然会面临尤其繁多的两难局面。

因为欧美这样的先发展国家的市场经济虽然还不完美，但基本成熟，虽然免不了伤风甚至重感冒，如华尔街金融风暴，但身体基本健康，能够在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在质量良好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自行运转。他们的市场经济由分散的市场主体的分散决策所驱动，私营企业自由决策、自由投资、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而是专注于提供优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所谓"优质"，就是这个游戏规则能够为市场竞争主体提供尽可能低



的交易成本。没有一个能够保证低交易成本的游戏规则，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无法成熟起来的，这就是“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句老生常谈的话的含义。“法制经济”就说明了制度性基础设施对于市场经济发育成熟和正常运转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基本成熟，所以，他们没有“宏观调控”，“调控”的含义是主动的，他们有“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是“中性”和“被动”的，成熟现代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极其简单或单一的，仅剩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是由完全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来做出的，其调整银行拆借利率的目标也较单一，就是维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并在此前提下去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不会考虑对股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和社会的稳定等。他们几乎没有财政政策，“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为我们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因为新的例子不太好找。他们的政府税收最主要的功能是为政府的活动筹款，他们的立法程序也不允许他们把财政政策作为调控手段，因为决策程序太复杂，决策时间太长。他们的政府对税率的调整，通常是立足于长远的，考虑的是经济系统的活力这样的整体目标和远期目标，而不是相机行事的经济刺激手段，税率不可能频繁调整。微观层面上的政府直接干预，全部是在非常时期偶然性、应急性地在局部使用，从未大规模、大面积、常态化地使用过。至于有约束力的产业政策似乎从来没有在这些国家真正实行过，他们的法律环境也不允许政府这样做，金融系统也是由私营银行组成，充其量只是在工会、选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被动地对一些有政治影响力的、日暮途穷的夕阳产业实施一些有限度、有期限的过渡性保护措施而已。政府专注于“游戏规则”的制定，就不会面临太多的两难局面。犹如体育赛场上的游戏规则一样，这些游戏规则是事前制定的，没有特定的产业指向，更没有特定的企业指向，何来两难？

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这样的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的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政府的行政力量自然就要去填补市场力量顾及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市场有两只手在配置资源，

政府这只大手强有力、自私而僵硬，市场这种小手虽然灵活但发育不良，扭曲变形。政府直接介入市场，管的具体事务太多，自然面临的两难局面就很多。政府直接介入市场，既有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客观原因，也有政府自身利益的因素。

固然我们的市场经济发育时间太短，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也不可能这样快就成熟起来，毕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的市场经济成长的步伐无疑受到了来自政府不当干预强有力的阻碍。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对经济资源还无法起到基础性的配置作用，是因为政府的不退出、不配合。大量的政府不恰当干预和政府的经济管制、大量存在的政府企业和行政垄断、巨无霸式的国家控股的金融机构、政府主导的证券市场、沉重的税赋，都使我们的市场发育程度比它原本能够实现的程度要低很多。政府的不退出主要与由此而获得的种种利益相关，当然也不完全排除政治家赶超战略、加速复兴国家的雄心与抱负，以及对政府和国有经济盲目信任的“传统智慧”的影响。似乎没有政府部门愿意主动交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权，主动放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而我们的制度又使政府没有强有力的平衡力量，这就使这种状态会拖拖拉拉地持续很久。我们的认识总是大大地领先于行动，刻不容缓的事情往往议论很多很多年。越拖就越“两难”，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越拖越强大，越来越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什么时候政府真正转变职能了，变为一个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匹配的现代“服务型”政府了，变为一个专注于制定游戏规则、执行游戏规则的、中立的现代政府了，他面临的两难选择就会少很多了，因为他不再需要作出那么多的政策选择了。

无招胜有招，没有技巧就是最大的技巧。减少两难选择的最好路径也是唯一的路径，就是减少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运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发育、强大和灵活起来，取代政府这只僵硬、笨拙、莽撞、刚愎自用、有时还很自私偏心的有形之手，用市场

的力量取代政府的行政手段，用制度取代政策，用规则取代相机抉择，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逐渐取缔主动实施和常态化的产业政策。政府退出市场竞争，不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再为某行业、某集团的人民服务，不越位、不缺位，在可靠的现代政治制度的保证下中立而勤勉地服务于纳税人，并在他们的有效约束下专司制定游戏规则、执行游戏规则，则天下太平了。

政府应该目标明确地按照尽最大努力为市场经济的发育创造条件的原则来指导自身的改革进程，而不应该一方面设置障碍，阻碍市场经济的成长发育；另一方面又以此为理由，也就是说以人为制造的市场失灵而不是市场机制自身所固有的市场失灵为借口，来强化政府的直接干预，甚至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实施直接干预。如果太顾及不同集团自身的利益，把经济问题过度政治化，就会非常的“两难”。试图用“高明”的政策设计、“高超”的调控技巧来解决制度层面的缺陷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是缺乏洞察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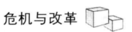
也谈民富、国强和民族尊严

"国强"其实是以"国富"为基础，把奥运金牌、军事部门的实力这样的"单项冠军"作为国强的标志，进而去追求这样的国强，常常是妨碍了国强目标的实现的。没有几个人会把前苏联一枝独秀的军事部门看作是国强的标志，相反大办军事导致他国力衰弱。一只强壮的青蛙即使小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它是强壮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富"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指的是国家拥有了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较多的财富，特别是物质财富，更为准确地说，指的是一个国家拥有了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较强的财富创造能力或劳动生产率。在这种含义下，"国富"的衡量标准就是一国的经济规模——GDP。在现代社会，除了少数主要依靠出售自然资源获利的国家以外，GDP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另一方面指的是一国的政府控制和支配着这个国家创造出来的较大份额的GDP，是相对于国民个人支配的部分而言的。

"民富"既可以从政府与私人部门在GDP的支配比例上来理解，也可以从人均GDP的角度在与其他国家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理解。前者衡量的标准是一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后者衡量的标准是人均GDP的国际排名。

如果政府控制了过多的GDP，就会形成"国富而民穷"的局面，如今日的中国，所以中国的内部需求，特别是民间需求，长期以来总是不足的。在"国富民穷"的格局下，如果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政府不能够妥



善地使用自己掌握的这些财富，就会形成国富、民穷和所谓的“国家能力”成长缓慢的局面。

“国强”其实是以“国富”为基础，把奥运金牌、军事部门的实力这样的“单项冠军”作为国强的标志，进而去追求这样的国强，常常是妨碍了国强目标的实现的。比如，你能够把印度的奥运金牌少看做是“国不强”的标志吗？你能够把中国的奥运金牌多看做是国强的标志吗？你能够把前苏联的军事力量强大看做是“国强”的体现吗？思维简单化和幼稚化了，奥运金牌多还要看是怎么多的，奥运金牌少也要分析是怎么少的。军事强大还要看是如何建立起强大的军事部门的，以什么为代价强大起来的，没有几个人会把前苏联一枝独秀的军事部门看做是国强的结果，恰恰相反，大办军事导致了它国力的衰弱。也没有多少专家会简单地把“金牌大国”等同于体育大国、体育“强”国。至于把有没有国际金融中心当成国“强不强”的标志也很欠思量，不了解经济学常识。世界上注定只需要很少的金融服务业中心，有固然好，没有也没什么关系，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产业部门都世界领先，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间存在着经济竞争导致的分工与合作，大阪应该因为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沮丧吗？还是瑞士因为没有纽约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而富而不强了呢？

至于瑞士、挪威、卢森堡这样的“小国”所谓“富而不强”的例子，就很费解了。一只强壮的青蛙即使小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它是强壮的，把青蛙没有狮子力气大、影响力大看做是青蛙不强的例子很娱乐、很双重。小国富是从人均 GDP 的角度看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主要是由经济规模、人口、资源和制度优势决定的。以小国之人力、资源和经济活动的规模，追求美国那样的“国强”，我想没有哪个小国的人民或领导人会“醉”成那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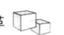
政治学家们所谓的“国家能力”，如某教授所说的经济能力、战争能力、教育能力、研发能力、社会保障能力、政治能力，和“追求财富”之

间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性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国家的层面上，“追求财富”就是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提供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这样一个制度系统是不会妨碍你追求各种国家能力的，战争能力取决于你选择的军费预算规模、军事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军费利用效率，教育能力取决于你选择的教育预算规模、教育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研发能力取决于你选择的研发投入规模和创新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研发费用的使用效率，社会保障能力取决于你选择的社会保障投入、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保障经费的使用效率和社会保障水平。

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提高了，才可能不断提高军事、教育、社会保障、科技进步方面的能力，否则就是无源之水。在当今世界找不到一个穷国而有强大的创新能力、教育水平、军事能力、社会保障水平的例子。当然，一个国家富裕了，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部门，这是一个国家公共选择或独裁者选择的结果，甚至一个很不富裕的国家也可以选择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部门。总之，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更加有助于它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或军事部门。

在古代能找出很多野蛮民族打败富裕国家的例子，那是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时代里发生的故事，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在当今世界，战争已经变得异常“昂贵”，在军事部门已经变成技术高度密集、资金高度密集的部门的情况下，财富的创造能力和军事产品的生产能力、创新能力或购买能力是高度相关的。军事强国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强国，军事大国也无一例外都是投入巨大经济资源的产物，财富生产能力的提高对于成为军事大国或军事强国都是非常有利的。有钱当然不见得能够买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但创造财富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你自己造出先进的航空母舰呢？还是二者没有什么关系？抑或不利于你制造航空母舰呢？你也可以举出石油国家富有而国力不强的例子，这样以偏概全的例子也没有什么意义，毕竟不是所有民族的祖先都有那么好的远见，都那么会选择定居地。



我们需要的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赐。

加拿大和日本所谓的“富而不强”涉及这些国家国民的公共选择，涉及他们的国民愿意拿出多少财富来发展和体现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涉及这些国家的“新闻价值”，不能够简单地把国际舆论界的“曝光率”等同于国家能力或政治能力的体现。

在金融危机中，与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金融方面联系紧密的国家自然就会受到较严重的影响，而与其他经济上联系较少或没有联系的国家自然受到的影响就较少，甚至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你能够简单地据此说这些国家应对国际金融的能力比富国还强？中国的金融系统以国有银行为主体，资本项目还没有放开，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很微弱，你能够说我们对金融系统的管理水平比美国还高？中国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难道是我们一种主动选择的战略？还是一种无奈的结果？我想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清楚。

至于一个民族的尊严、民族价值观的维护、民族文化的保护和财富的创造能力之间根本看不出存在什么冲突。虽然不是富了就必然受人尊重，但也不是穷了就光荣，毕竟一个民族能够拥有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件事情，即使是靠出售自然资源致富也不是可耻的一件事情。当然，没有人认为只要有钱就必然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善于创造财富”本身不会妨碍你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这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创造财富也不是必然要以放弃自己的民族价值观为代价，一个善于创造财富的民族，它的价值观是更易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普及呢，还是相反？一个善于创造财富的民族是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呢，还是相反？对于一个善于创造财富的民族，它的文化是更加富有生命力和吸引力呢，还是更易于走向衰落呢？为什么要把不是对立的东西刻意地对立起来呢？

我国今日经济增长快而所谓的“国家能力”不强，与两个原因直接相

关。一个原因是改革以经济改革为主，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第五个现代化”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另一个原因是后发展国家所谓的“后发优势”。例如，尽管自己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但我们的起点很低，可以依靠吸收已有的技术来取得经济上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当然不能够说明我们的“经济能力”已经很强大了，只能够说明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提高得很快。一个原来考 20 分的同学和一个考 90 分的同学，谁更容易获得班级的“最快进步奖”呢？

民富、国强和赢得民族的尊严最终还要依靠制度，特别是基础性的制度。没有基础性制度的现代化，国民的财富创造能力就会受到阻碍，创造财富的效率就会降低，经济发展的代价就会加大；没有基础性制度的现代化，国民创造出来的财富就难以以合理方式加以利用；没有基础性制度的现代化，国家的一系列能力就不能够随着财富创造能力的增强而同步增强；没有基础性制度的现代化，国家的硬实力就会受到基础性制度空间的局限，国家的软实力更是会受到基础性制度的局限。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如何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国民的幸福、民族的自信与自豪，什么才是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尊重、民族尊严和安全感的最佳途径。

中国梦的制度基础

>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准备如何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没有行动，梦想就有可能蜕变为空想、幻想。想将这个梦想孵化为现实，就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为它提供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如同准备将一枚已经受精的鸡蛋孵化为小鸡一样。优良的制度系统就是民族复兴梦想的孵化器。

如果你随便在大街上找个人问，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什么？可能许多人会很茫然。我们每个人都仅仅是茫茫人海中的沧海一粟，怎么可能知道这十几亿人共同的梦想是什么呢？如果那个共同的梦想的确存在，是不是足够伟大呢？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一旦谜底揭晓，我想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大家一定深有同感，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重现旧日辉煌，重拾尊严与荣耀，乐享幸福与安宁，实现伟大复兴呢？

一个民族到底有梦想好，还是没有梦想好呢？当然是有梦想好。没有梦想，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没有梦想就没有未来，没有梦想就没有希望。心如死灰，麻木不仁，过一天算一天，是一种极度绝望的表现。但有了梦想，却发现这个梦想难以实现，就会滋生出更多的痛苦。或者发现这个梦想虚无缥缈，过于宏大，与升斗小民日常的琐碎生活相距甚远，就会慢慢淡忘，最终流于一种口号和标语了。再或者发现这个梦想的实现与否，其实与自己卑微生活状况的改善关系微弱，也就自然会不大关心了。

所以，在国家、民族这个层次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宣示决心这个层面上。如果没有行动跟随其后，宣示的就不再是决心，而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心理战，仅仅是想鼓舞一下士气，还没有做好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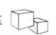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准备如何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去努力把这个梦想变为现实？没有行动，梦想岂不是成了空想，甚至成了幻想。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已经做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不同的政治家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告诉大家，如果按照他的设计去行动，这个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实现。

从笔者这样一个蹩脚的观察者的角度，要将这个梦想孵化为现实，必须依靠方向正确的行动。换言之，要想将这个梦想孵化为现实，就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为它提供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如同要把一枚受精的鸡蛋孵化为小鸡一样。

中国建国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也经历了三十多年，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严重的问题。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经济管制横行，社会管理不足，假冒伪劣泛滥，市场失序，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等等。千头万绪，似乎给人无从下手之感。

其实，推动深层次改革的抓手应该是无数个，而不是一两个。如果认为应该很精明地确定一两个抓手，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以点带面，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如果把“一发”当做抓手，必然会遇到全身的消极抵抗，乃至积极反抗。所以，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展开，相互配合，否则制度结构就会因为改革的进度、方向不同而日益扭曲，变成一团乱麻，变成一个不新不旧、新旧杂陈的怪物。

改革应该在所有的层次、所有的领域同时展开，社会转型本来就是个需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系统工程。避重就轻，先易后难，柿子先拣软的捏，这些做法已经很难再见效了。当然，我们不是主张激进，主张轰轰烈烈，我们当然同意培养，同意内生，同意协商，但这些都不能演变为一种拖延实质性的深层次改革的借口。



现在可不可以继续不争论，抓住老鼠就行了？问题是现在花猫只想自己抓老鼠，而不想让黑猫也不想让白猫捕鼠。我们要谨防改革沦为一种概念、一种题材。现在没有人反对改革，但改革就是深入不下去。

中国的改革难以深化，核心问题至少有三个：一是改革的目标不够清晰，表达得更不够清晰；二是缺乏顶层设计；三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得不到有效的节制。

目前改革的目标完全不清晰，不同利益集团各怀心事，讲的都是改革，都赞成改革，但在改革的具体内容上，常常相距甚远，甚至南辕北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继续不争论、不打灯，甚至打左转灯向右转？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非常成熟和强大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前进的方向盘，他们现在只想让花猫抓老鼠，不想让黑猫和白猫捕鼠。

解决的办法首先就是要逐步放松对言论的管制，让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都能够张开嘴巴，发出他们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充分的讨论，最终凝聚出关于改革的共识来。只有通过相对自由的讨论所达成的共识，才会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珍惜，才会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真心诚意的支持。否则，改革就会沦为一种概念、一种题材。现在没有人反对改革，但改革就是深入不下去。

在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中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陷入胶着状态十余年了。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是自由选择的胜利，中国经济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源于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不完善，而非市场经济本身。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不是强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是应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核心是如何让政府的权力得到有效的法律制约，得到有效的舆论监督，使政府的权力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能够在阳光下运行。

目标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就找到了，而且这个目标不是少数几笔杆子

闷在屋子里面精心总结提炼出来的，而是全民参与讨论达成的基本共识，就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执行。否则就会变成数不清的标语、口号、精神中的一员，就难以从墙上或文件中走进社会生活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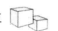
目标明确了，才能够进行顶层设计，否则，不仅没有设计的方向，还会顾虑重重，总担心左右的问题。顶层设计，就是整体规划。国家层面，行业层面，不同经济区域层面，都可以有自己的顶层设计，不是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够进行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意味着事无巨细地都事先设计妥当才能够开始行动，照图索骥。顶层设计要解决的问题是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框架、基本原则这类粗线条的东西。顶层设计就是指导中国改革的世界地图，最简略，也最重要。指导各个地区、各个领域改革，还会有更为具体的方案，就犹如还会有省地图、市地图、县地图、城区地图，但这些地图简化之后能够重新拼成一幅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所以，顶层设计，不是不要基层创新，不是只能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顶层的意思是总体、全局的意思，而不是高层的意思。

通过公开的讨论，也能够有效瓦解既得利益集团阻滞改革进程的负面力量。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好像是水面上飘荡的小舟一样。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可以从逐步减少敏感词的数量，逐步放松对思想言论的管制入手来凝聚改革共识。

因此，实现中国梦，不能依靠表态，而要依靠行动。要通过方向正确的实质性改革来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 离开十几亿人各自的梦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成为了无源之水。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个民族，它的每个个体是否心怀梦想？心怀什么样的梦想？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将梦想看做是一件很奢侈的东西，同时人们的梦想高度同质化，这个社会就是不健康的。

在社会个体的层面上，每个人的人生梦想都各不相同，有的想发财，有的想当官，有的想做诗人，有的想做商人，有的想做警察，有的想做法



官。这些五花八门的个人梦想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有什么关联吗？会不会干扰这个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呢？

其实，离开十几亿人各自的梦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记起民族复兴这样伟大的梦想，这样的表述只会在政治性、宣传性的文本中出现，但这一点都不值得你担心。因为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个民族，它的每个个体是否心怀梦想？心怀什么样的梦想？

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将梦想看做是很奢侈的一个东西，特别是身处社会中下层的草根阶层，那这个社会必然是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必然是缺乏自由和平等的，必然是缺乏民主与法制的，必然是两极分化的，必然是缺乏光明和希望的。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梦想与希望，失去生活，失去快乐，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整日挣扎于生存线上。

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梦想高度同质化，都想做官员，都想进央企或国企，都想出国，这样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样的梦想也不再是真正的梦想，因为它是人性压抑和扭曲的产物。这个社会必然是行政垄断横行，寻租活动泛滥，政府权力得不到约束，缺乏民主与法制，权力和金钱主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务实和世故，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与贪污和腐败抗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试图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转而向他们曾经痛恨的社会黑暗势力妥协投降，并争先恐后地努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如果在中国这片我们祖先已经生活了几千年的土地上，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无论自己是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出生在富有之家还是草根家庭，无论贫富贵贱，都拥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潜力，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追逐自己的梦想，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全无权贵或政府的压制；他们无须奴颜婢膝，无须忍辱负重，无须行贿收买，无须助纣为虐，无须放弃自己的梦想，无须扭曲自己的心灵，因为他们就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愿意，每个人的潜力都能够得到发挥，都能通过诚实的劳动过上幸福的生活，走向成功，而无须依赖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恩赐——这样的信念，才是真正的中国梦。在中国这片古老沧桑、满是伤痕的土地上，通过诚实劳动、通过公平竞争、通过发明创造实现的梦想，才是真正的中国梦。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怀揣这样的中国梦，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都有机会尽情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根本不需要被经常提及，因为民族复兴已经变成一个自然的、必然的结果，这一过程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否则，民族复兴就一定会失去其微观基础，演变为一句僵硬空洞的口号，演变为一个装饰性符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她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活得快乐，活得有尊严，相互友爱，相互尊重，也受世人尊重，并能够对整个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这个民族就完成了复兴的使命。我们不能狭隘地把民族复兴理解为一些标志性事件的成功，理解为某些经济指标的实现。数字并不能完整地呈现出一个民族那些活生生的个体所过的生活。

> 决定民族复兴大业时间表的首要因素就是制度。在近一千年来，特别是近三百年来，尤其是近100年来，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她庞大的人口、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创造潜力非常不相称。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制度，特别是基础性的制度束缚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同时又激发了我们人性中的不良成分。

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如何把它改造成一片实现梦想的乐土？如何把中国变为一个梦想制造大国？依靠制度变革。在21世纪，决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制度，对于中华民族，决定民族复兴大业时间表的首要因素就是制度。回顾中华民族四五千年的历史，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何等辉煌的成就，但在近一千年来，特别是近三百年来，尤其是近100年来，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她庞大的人口、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创造潜力是何等的不相称。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制

度，特别是基础性的制度束缚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不良的制度激发了人性中不良的成分，是我们陷于内耗，同时强迫我们把聪明才智无穷无尽地耗费于寻章摘句式的文字游戏中，耗费于各类考试之中。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基础性的制度体系去空谈民族复兴，民族复兴的进程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对待世界先进制度的态度，特别是取决于执政团队对待其他民族先进制度的态度，有没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有没有勇气与智慧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面向未来，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大胆地吸收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

> 对于中国的前途，就长期而言是没有任何理由悲观的，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短期和中期发展路径。要实现中国梦，我们需要先进的制度孵化器。

如何打破经济管制刚性，把政府改造成一个服务型的现代政府，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依靠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官员的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来源于上级，他就会对上级负责，而对民声民意缺乏兴趣；如果官员的权力就其本质来说来源于选票，来源于人民的阶段性审核和授权，他就会弯下身躯倾听民意。

政治体制改革，说起来就不容易，做起来就更是难上加难了，难到让人怀疑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整天说鸡汤好喝，但就是不愿意杀鸡，因为有属于自己的利益在里面，下不去手。凡是不利于强势利益集团的改革都不受他们欢迎，凡是强化他们地位的“改革”，都是他们所欢迎的，这是人性的问题。最令人伤感的是那些饱受其苦的弱势群体，受传统智慧的控制，时常下意识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去思考中国的改革，去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于是，深层次的改革就变成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甚至闪着右灯向左拐，指西打东。但没有改革，就会等来混乱与动荡，等来枭雄。

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不会由某个强势利益集团单独操纵，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在各个利益集团的合力推动下进行的，即使无助的网民，不也坏了不少贪官的大好前程？所以，对于中国的前途，就长期而言是没有任何理由悲观的，毕竟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古国。一个国家，它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就永远关不上了。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演进的潮流，都会推动着中国继续走向开放。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短期和中期发展路径。

要实现中国梦，我们需要先进的制度孵化器。

制度与政策



推进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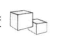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目前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的程度，他们已经饱尝“渐进式改革”的好处，他们会通过尽可能多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

2010年3月，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被国务院退回，从公布的内容来看，如果是真的，属情理之中；如果不是真的，也应该被退回，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收入新政”是否有“紧张修改”的价值。

从这个方案公布出来的基本结构上看，即使不了解其中的细节，也能清晰地感觉出来，这个“新政”的瓶子装的还是旧酒，还是在旧思维指导下进行的设计。这个改革方案的“渐进”色彩很浓，显然属于一个治标的、过渡性的方案。

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指向结果的，而不是指向原因的。这个方案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根源，试图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涨工资这样的技术性手段去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这就好似装作看不见釜底下熊熊燃烧的柴火，而在讨论是否应该用勺子扬汤的办法或加快勺子扬汤的频率来给釜中的汤降降温，以免釜“溢”了。

在过去“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众多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了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障碍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对象了。试图

“绕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生怕触怒这些脾气暴躁的狮子，试图以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来解决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产生的问题，不是天真就是无知。略有洞察力的人都知道，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目前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的程度，他们已经饱尝“渐进式改革”的好处，他们会通过尽可能多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延缓实质性改革的到来。

从公布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的内容来看，“收入新政”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增加农民收入。只要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在第一产业部门工作，通过转移支付只有可能消灭极端穷困，或者保证最低生活标准，而不可能让他们富裕起来。只有城市化，只有把农民从农村地区、从农业部门赶快转移出来，才可能真正提高他们的收入。城市化靠的不是口号和理念，靠的是制度创新以及源于这个良好制度的经济增长。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你看我们连出租汽车行业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我们怎么能够幻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收入新政”的第二部分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这种扶持只有在“标本兼治”的情况下才值得赞美。如果没有治本之策，我们很难对这些“治标”的技术性手段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收入分配格局已经扭曲到如此地步，但我们在目前依然无法预期收入分配格局能够根本转变。这些治标之策只能是有比没有好。

“收入新政”的第三部分是提高工资收入，对这样的措施能够感到兴奋的恐怕只能是那些生存于政府部门和行政垄断性质的体制内部门的幸运者了，因为只有他们的工资水平才能够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操控，而对于那些工资水平由市场、竞争和供求来决定的开放的市场化部门来说，除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除了给他们一个高效、严明的司法系统，

除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除了减轻他们沉重的税务负担，除了解除施加于他们身上种种不合理的经济管制，除了向他们开放被行政垄断控制起来的经济领域，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显著提高呢？

"收入新政"的第四部分是个税的调节。个税一定要改，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对穷人减税和对富人严格征管双管齐下。例如，原本是用来平抑收入分配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却成为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元凶。随着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日趋严重，中低收入者承担了大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我们不是在"劫富济贫"，而是在"劫贫济富"。

也许许多思想"成熟"的"智叟"认为，中国的事情很复杂，需要时间，问题是这些技术性手段还能争取来多少时间？争取来的这些时间是做什么用的？为未来改革的攻坚创造条件？还是尽可能多地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在这样的"渐进"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是变得更加强大，还是被逐渐消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呢？

改革进行到现在这样的阶段，要想深化改革，想绕开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是不可能了。想让时间的流水去消融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钟乳石"，是在逃避，是在装天真？这个"钟乳石"只能够在时间流水的滋养下越长越大。

在目前这样的改革攻坚阶段，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耐心，我们更需要危机感。推进中国的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中国人的“折旧率”应该比欧洲人高

如果在一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大多数国民形成了一致的认识，那么许多原本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就变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顺理成章、波澜不惊了。

中国社会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公共养老金不仅会出现赤字，而且还缺乏保值增值的可靠渠道。就平均数而言，中国家庭储蓄的规模其实很小。我们这套制度系统对经济增长率高度依赖，目前看来在短期似乎难以戒除“流动性”毒瘾。通货膨胀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来临之前似乎是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始终会缠绕着我们孱弱的身躯。工作强度大，生活的心理成本高，工作比人家早，寿命比先发展国家短，如果因为养老金缺口就简单地和国际接轨，延长退休年龄，情何以堪？

公共养老金其实是靠不住的

中国人的养老原本就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绝大多数城市人的工资和退休金水平一直很低。因为工资和退休金的上涨跟不上 GDP 的增长速度，所以，虽然绝对收入在增加，相对收入却在下降，因为在许多年份，工资性收入跑不赢通货膨胀率。所以，从购买力的角度，我们的实际工资和实际退休金在许多年份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

因为工资性收入水平很低，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储蓄额其实是很少的，尽管外传中国人酷爱储蓄，其实一人均也没有几万元钱。2011 年年

末，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余额为34万亿元，人均不到3万元，这还是平均值，如果是“中位储蓄额”的话会更低，因为收入差距非常大，这会导致中位值大大低于平均值。所以，依靠家庭储蓄养老也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因为中国人很难规避通货膨胀风险，难以实现储蓄的保值和增值，所以这点非常有限的储蓄按照现在的状况，在可预见的将来，一定会是越存越少的。要继续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在未来恐怕还得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就是刺激我们经济增长的兴奋剂和摇头丸。在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坏蛋之中，管理层在未来很可能会频繁地一会儿按下这个坏蛋，一会儿按下另一个坏蛋。

由于管理层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所以，我们的管理层对经济增长速度是高度依赖的。这不是一个是否认识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是否认识到资源环境重要性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

草根民众微薄的公共退休金在未来是难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的，能不能依靠公共养老金在10年、20年后一天吃上三碗面条，其实都是很可疑的。很显然，单纯依靠公共养老金是不行的，但问题是个人储蓄，就平均水平来说，也是极其微薄的。公共养老金靠不住，个人储蓄也靠不住。

个人储蓄很少，银行利率又长期低于通货膨胀率，为了不让通货膨胀把这点有限的储蓄蒸发掉，草根民众懵懵懂懂地走上了理财之路。不幸的是，草根民众既不具备理财的常识，理财的渠道又极其有限，各种市场又极不规范。结果简直就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不理财，财还少得慢点，越理越少。我国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民众才2 400多万人，两市各有6 800余万个有效账户，搞收藏的也有8 000余万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程度这么大，绝大部分人收入水平这么低，但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又拿这极其有限的收入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财岂能不越理越少。大家已经被通货膨胀、贫富差距、赢者通吃和老无所依吓疯了，真的是很可怜。

公共养老金本来就水平很低，在现收现付的制度下，将来还可能连这点微薄的公共养老金也领不到。当然，不是领不到钞票，而是领不到真实的购买力。因为公共养老金没有增值的可靠渠道，只能购买政府债券，增值很慢。跑不过通货膨胀率，就意味着越存越少。也许大家应该为可能并不长的退休生涯存点方便面。

延长中国人的退休年龄是不人道的

另外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是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72，也就是说每个中国妇女在育龄期内平均生育2.72个小孩，而达到生育更替水平需要2.1，因为一部分孩子在成长到育龄之前会有夭折和死亡。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18，其中城市妇女的综合生育率为0.88。而全球的平均生育率是2.5，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1.7。但我们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今天还没有清除，奉命行事的白衣天使们从孕妇的腹中拖出即将分娩的婴儿的人间惨剧还在发生。这种计划生育政策还造成畸形的性别比例，同样畸形的生存竞争和生存环境又使许多中国妇女在成年后不同程度地放弃婚姻和生育。在女少男多的同时，剩女却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2012年7月10日，中国老龄办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7%。到2013年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21亿，占总人口的16%。

中国社会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越来越少，性别失调，剩女还越来越多，社会保障系统尚处于草创阶段，经济增长效率又那么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政府的运行成本

还无法降下来，草根民众还在为政府职员吃鱼翅、喝茅台酒这样的问题束手无策、苦恼烦心，政府还在为“上天入地”、“神行太保”这样的项目挥金如纸。未来怎么办？不由得想起了秋瑾女侠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博学的专家学者们说，欧洲许多国家的退休年龄已经延长至65岁了（实际上他们的实际退休年龄也就61～62岁），但专家们没有告诉你普通中国人的工作强度、生存环境和生存压力与欧洲人有多么的不同，中国人的“折旧率”怎么能和那些好吃懒做、养尊处优、生活体面的欧洲人定成一样的呢？我们一生吃了多少化学元素，孩子喝点奶粉都要到外国抢购，还得是有钱人。2012年6月初，人社部放出风来，称正在研究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结果民意沸腾，网络调查90%以上的民众反对。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除了高管们，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留在职场江湖中煎熬。但在未来就不好说了，如果未来的退休金少到无法糊口，大家也许死也不愿意退休呢？

但延长退休年龄却是不可避免的。公共养老金不足，能有什么办法呢？无非两条：降低公共养老金水平；延长退休年龄，缩短国民领取公共养老金的时间。但公共养老金几乎没有降低的空间，现在我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完全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下一步是“提高”的问题。2012年7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了《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了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地区达到34.6%，月均养老金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近10年来城镇老年人平均收入仅增加1.1倍，农村增长了1.5倍。

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就是缩短领取公共养老金的时间。再说，未来就那微薄的公共养老金，即使允许你60岁退休，你也只能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打零工，以非常廉价的身价继续奋战在职场上。也许过几年，老年人还抗议政府让他们60岁就退休呢，因为在未来，单靠公共养



老金会越来越糊不了口，同时年轻人越来越稀缺，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会导致工资水平越来越高。这样，从发展趋势上看，老年人退休与不退休在收入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2012 年政府的公共养老金账户尚有结余，至于未来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坦率地说会很大，但具体有多大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综合生育率的演变情况，退休年龄是多少，政府计划为老年人提供一个什么水平的公共养老金，在未来年份的通货膨胀水平，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如何变化，未来中国人均寿命的演变情况，等等。在经济学上，所有的结论都是有前提的。专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公共养老金缺口莫衷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讲前提、信口开河的产物。

中国公共养老金水平低的另外一面就是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人无人赡养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必然导致公共养老金筹集能力下降。工作人口减少的一个后果就是薪资水平的上升，所以在未来，服务的价格会越来越贵。在家庭这个微观层面上，一个年轻人也许要面对两个老人，一个年轻的家庭要面对四个老人。从国际经验上看，已经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回归社区和家庭的居家养老是毫无疑问的主流。《2010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城镇老年人愿意住养老机构的比例，10 年来从 18.6% 下降到 11.3%，农村老人则从 14.4% 下降到 12.5%。10 年来，城镇空巢老人的比例由 42% 上升到 54%，农村地区由 37.9% 上升到 45.6%，增幅非常明显。同时，老人自有住宅比例较高，城镇老年人拥有自己产权住房的占 75.7%，农村为 71.2%。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年人最符合逻辑的晚年生活将是孤独在自己的居所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甚至没有儿孙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中国的老龄化：死马还是活马

说了“怎么看”，还要说说“怎么办”。按我国国情和中国式逻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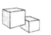
说“怎么办”会让读者骂的，那么就按照惯例，说说对策。

对策一，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归还民众完整的生育权，最好辅之以金钱鼓励，鼓励生育。但根据现在这个情势，放开了生育，草根们也不太会多生育小孩。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单是经济增长这一个因素就够有杀伤力的了。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稳定地下降。你看现在的经济发达经济体，大多为少子化、老龄化问题而担忧，大多采取了经济激励政策来刺激生育，如政府直接发放红包、实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府承担一部分的养育费用等，但实际效果都很差。

对策二，出售国有资产来充实公共养老金账户。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因为没有制度上的优势，市场没有失灵，只要打破行政保护，去除政府保护，对民间经济力量开放，引入竞争，行政垄断就立刻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所以，竞争性经济领域内的国有企业，迟早要退出，无非是主动退出与被动退出的选择而已。即使马上退出阻力大，也应该先提高国有企业利润的上缴比例，这部分钱也可以充实到公共养老金账户中，否则就无法体现“国有”的性质，全民作为股东在逻辑上也应该得到至少一部分的投资收益。现在的国有企业，在实际上的运作层面上就是被内部人控制的私营企业，是一个个分封割据的经济王国，收益被内部人分享，亏损由纳税人负担，“国有”变成了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对策三，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立足长远，立足整体，把整个经济系统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养老问题。例如，实现经济的对内开放，致力于促进自由竞争的、法制的、民主的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得越健康，越有效率，越是可持续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就越有能力负担老年人的生活，就越有经济力量提高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再完善资本市场，为公共养老金的保值和增值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基础。

对策四，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建立自由竞争的和法制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科学划分政府的边界，消除“越位”、“缺位”，致力于建立一个



高效、透明的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提高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在有没有钱的前面，还有一个如何使用财政收入的问题，至少吃鱼翅、喝茅台酒的钱是可以省去的吧！“三公”消费每年消耗多少财政资金，一直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此外，如果能够取消或减少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劳民伤财的政绩项目，我们显然有能力大大缩小在可预见的未来必然出现的公共养老金缺口。

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明知人微言轻，但也要持之以恒。许多道理单是知识人、文化人自己明白还不行，还要让普天下忙于生计、无暇忧国忧民的草根民众都明白，中国才能真正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每一个国民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如果在一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大多数国民形成了一致的认识，许多原本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就变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顺理成章、波澜不惊了。

国企存在的逻辑

在市场没有失灵的领域，凡是有国有企业存在的地方，必然同时存在着补贴、进入管制这类的“配套措施”。

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基本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我们讨论所有涉及国有企业的问题的一个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需要国有企业的存在，就是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在绝大多数经济领域是非常有效的，想想你生活中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有多大比例是从市场中购买到的？绝大多数。但市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市场因为四大方面的原因会失灵，导致它不能有效、充足地提供某些产品和服务。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就是：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自然垄断。像外交、军事、司法、警察、天气预报这类服务就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由政府统一提供最有效率。但即使是公共产品，其生产环节也是可以由民营公司来提供的。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物质产品和服务，通过政府直接成立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直接提供，其实应该是其面临的众多选项中的最后一项，前面的选项还包括政府补贴，政府采购、外包等选项。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公共产品，而是完完全全的私人物品，如金融服务、航空服务、建筑、钢铁、交通运输服务、烟草产品、石油产品等。况且，即使是公共产品，也不见得一定要运用成立国有企业的方式来提供。这其实是最没有效率的一个选择。在日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做得最彻底，连邮局都

民营化了。

国有企业由于其天然具有的激励、约束问题和内部人员控制问题，效率低下是其固有特征。所以，在市场没有失灵的领域，凡是有国有企业存在的地方，必然同时存在着补贴、进入管制这类“配套措施”。

为什么要设置进入管制？为什么要限制竞争呢？为什么必须对其进行补贴呢？这不仅是因为国有企业要追求高额垄断利润，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经不起市场竞争的考验，必须有政府保护、政府撑腰才可以勉强生存。切记，并不是所有受到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都能获得暴利，更多的国有企业是在亏损，可见其效率低下的程度有多么严重。那些有幸获得巨额垄断利润的国有企业，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就自然变成了浪荡子，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奢靡堕落。

垄断全世界都有，中国有所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垄断是行政垄断，与微软在操作系统领域具有的市场垄断地位完全不是一回事。微软拥有的市场垄断地位叫市场垄断，是公司富有效率的体现，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市场地位是通过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获得的。这种垄断，仅仅是就其市场占有率而言的，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没有损害的。当然，若这些拥有了市场垄断地位的公司采取了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就另当别论了，如微软的捆绑销售。中国的垄断国企是政府制造的一种垄断，是行政垄断。

至于中国经济中所谓的自然垄断，在更多的时候，不过是行政垄断所穿的“马甲”。“自然垄断”中的“自然”，其含义就是必然，就是指由于技术、规模经济效应等原因，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走向寡头垄断，如公共事业部门的管网系统。对于自然垄断部门，准确地说是这些部门的自然垄断环节，政府最好也不要设立国有企业，而是应该交由民营公司经营，政府对其进行价格、服务质量、产品技术指标等方面的监管即可。如果需要，政府可同时予以这些民营公司补贴以降低价格。从市场占有率角度看，大型民用航空器生产领域是个典型的双寡头市场结构，波音公司和空

客公司瓜分了几乎所有的市场份额，但它们之间的市场竞争却非常激烈，这个领域的技术进步也非常迅速。

所以，要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人给自己发高薪，要解决行政垄断所带来的暴利问题，要解决国有企业的奢靡作风，非常简单，就是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对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也要尽最大努力引入市场竞争力量，引入民营经济力量，如通过产品生产外包、服务外包的方式引入市场竞争。

要么选择釜底抽薪，要么任由锅中的肉汤沸腾，而不能试图既不抽薪，又要止沸，这是不可能的。今日中国国有经济部门的基本状况是决策层不想抽薪，不愿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当然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愿放弃自身已有的利益，人民的意见又很大，不改革又不行，于是针对国有企业部门“扬汤止沸”或“加薪止沸”这类的改革措施自然就层出不穷了。

国企“中国病”的解决之道，就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创造条件将国有企业尽早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越快越好。在这些领域，市场根本就没有失灵，根本就不需要政府设立国有企业。而对于非竞争性领域，也要尽最大努力利用市场的力量。在发达国家，更多的是采用政府补贴、生产与服务外包、政府采购、价格管制、质量监管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如铁道系统具有自然垄断特性，但并不意味着高铁的修建必须要由国有企业来承担，工程建设环节完全可以民营化的。在美国连最尖端的隐形战斗机都是由民营公司生产的，当然是政府独家订购，实行买方垄断，民营公司不能自己出售。

中国的国企，名曰国企，名曰企业，实际上既非“国有”，也不是真正的“企业”。我们首先假装国有企业是企业，给它自主经营的权力。但因为其“国有”的性质，天然地缺乏对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结果必然出现严重的“内部人员控制”问题，使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为其实际控制者的私人王国，成为了一种变相的私有企业，成为这些国企领导人“受封的领地”。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所追求的不是所有者长期利益的最大化，

也不是公司利润的最大化，而是管理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国企不是真正的企业，就意味着不能让其自主经营，自行其是。但不让它自主经营，它如何能够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有效运作呢？要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民营化。

解决国有企业“中国病”的办法很简单、很清楚，但这个办法做起来却很难，难到让人怀疑其不可行，让人怀疑持此主张者天真幼稚。这个办法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取消政府保护，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生产环节，对自然垄断企业实行严格监管，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离开国有经济力量的布局调整，离开国有经济力量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和生产性领域，离开打破行政垄断，离开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中国的“国企病”就没有办法根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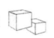
国企高管薪酬

民营化政策是最直接和见效最快的反腐败政策，我们从来不用担心民营经济部门的企业家会贪污浪费他们自己的钱。

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和高管之间在显性收入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分布在“土地肥沃程度”不同的行业的国有企业员工之间同样也在薪酬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太意外，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感到太意外，我们真正感到意外的可能是——原来在“显性收入”这一块他们也敢做到这样高的水平上。

在中国，国有企业既是企业，又是国有企业，身兼双重身份。在城市，经过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和产业领域的不断开放，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数量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减少，现存的这些国有企业主要凭借行政垄断或行政保护赚钱，直接一点的就直接进行相关产业的进入管制，搞特许经营，婉转一点的就依靠形形色色的产业政策、依靠国有银行所垄断的金融资源、依靠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的方式，来减少自己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

这类国有企业，一方面是政府投资，另一方面又搞自主经营、（假）自负盈亏、自我管理、（假）自我发展。赚钱的时候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是企业；亏钱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国有企业，只负赢不负亏。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方面是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生活在竞争性的领域；另一方面又可以依靠行政保护排斥竞争，靠垄断赚钱。政府出了钱，当然是老百姓的钱了，实际上政府不仅出了钱还提供了这些国有企



业最重要的生存之本——行政保护，但政府却不对它进行什么特别的监管，甚至监管得比民营企业还松，国家这个投资者甚至都不参加分红，因为要自我管理，自主经营，那些大型央企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王国。在企业的实际经营层面上和私人企业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运用纳税人的钱，做着市场中的经济大亨，搞经济领域的经济割据，控制数十亿元甚至数百亿元的国有资产，又不用接受什么实质性的政府监管，基本上靠自觉，胆子的大小和所在行业的“肥沃程度”决定了这些企业领导人显性收入的多少。那些大型垄断国有企业，有行政保护，有国有银行支持，稳赚不赔。在薪酬上他们与民营企业的经理人比，在接受监督上又要搞自主经营，天下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了。

世界上市场经济成熟一点的国家，其国有企业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民营化浪潮之后已经很少了，日本最后一家当然也是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一家国有企业——日本邮政也在顽强地抵抗了数十年后于2006年民营化了。在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如果还有国有企业的话，国有企业在法律上从来都是被看做是“特殊的企业”的，而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为什么把这些国有企业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呢？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存在于“非竞争性经济领域”的，这些企业因此而不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去赚钱，也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为政府设立这些企业根本就不是为了赚钱。政府有收税权，难道还需要通过成立国有企业的方式去在市场上“筹集活动经费”吗？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政府只有在私人部门不愿意进入、没有能力进入、因管理上的困难不适合他们进入的领域（如装配原子弹）才有运用税收设立国有企业的可能性。记住，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因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面临着一种选择：是亲自设立国有企业，还是更多地运用市场和私人部门的力量，仅仅提供预算资金，充当一个所需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的角色。如美国政府向私人企业下订单订购隐形战略轰炸机，而不是亲自成立一家国有的军用飞机制造企业。

所以，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来说，第一，它只会分布在非市场竞争性领域；第二，它不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第三，政府要对它进行严格的管理，像管理行政机构一样去管理它，像中国这样踢开“投资者”搞“自主经营”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有企业的雇员都是公务员，不论是清洁工还是企业的最高负责人，这样就不可能出现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受政府监督地自己设立游戏规则，让自己赚上数百倍、上千倍于该国人均收入水平的薪酬的情况。

解决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薪酬差距问题，在技术层次上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步伐，加快解除进入管制、行政保护的步伐，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的步伐，取消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形形色色的、冠冕堂皇的产业政策。我们的政府现在还拥有餐馆、旅馆、剧院之类和国家安全、国计民生怎么也扯不上关系的企业，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二是对在市场失灵的少数领域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要实行严格的政府管理，把它们当做特殊的企业对待，当做政府的行政机构去管理，对这些企业里的员工要当做公务员来对待，来进行统一的管理。他们本来就是为公众服务的，政府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让国有企业拿着纳税人的钱搞什么自主经营，让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根据胆子的大小、良心的多少和自留地肥沃程度的不同，在经济激励和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去为自己捞钱了。

但是政府机关里的官员也有贪污腐败的，怎么能够保证把国有企业的员工纳入公务员管理就万事大吉了呢？的确如此，所以我们说上面的对策是在技术层次的解决办法。民营化政策是最直接和见效最快的反腐败政策，政府从来不用担心私人会贪污浪费他们自己的钱。我们在进行了国有企业的退出和布局调整后，国有企业的数量就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度地减少。我们在大幅度地取消了经济管制政策和产业政策这些政府的微观干预政策后，就在根本上消除了产生腐败的经济基础。当然，这不意味着政府的市场经济管理部门就没有办法向私人部门寻租，也不意味着政

府的国有企业管理部门就没有办法伙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从国有企业中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国有企业为自己渔利了，但与国有企业在经济领域大量存在的情况下相比，毕竟产生腐败的经济基础大大地减小了。

我们要像信任党一样信任市场

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抛弃了产业政策，或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对产业政策感过兴趣，曾经实现过某种程度产业政策的国家，其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之间也不具备因果的关系，实行产业政策的经历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教训而不是宝贵的经验，更不是什么难以逾越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

2008年4月30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发布《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这是北京市首次以市委、市政府文件的名义就金融业的发展发布权威的指导性意见，此前只是由北京市发改委提出过相关的建议。该文件对北京金融业发展的总体布局是“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从优化金融发展环境、优化金融功能区规划建设等十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应该控制在企业手中，企业应该成为投资的主体，企业在商业原则的支配下自主决策，市场要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市场越是能够发挥这种基础性的作用，企业的决策越是能够不受政府特殊产业政策的影响，市场就越有效，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越高。反之，有特定产业指向的产业政策越有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越低，否则我们就不用搞市场经济了。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掌握了一切经济资源，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产业结构，可以像“导演”一样随心所欲地安排不同城市的“经济角色”，进行区域间的经济布局，但官员的精心计划比不上市场的分散决策，计划经济比不过市场经

济，最后，计划经济消失了，市场经济永久性地复兴了。这些浅显的结论，既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基本常识，也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在寻找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数十年来所进行的艰难探索的经验和教训的凝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是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决策的，而官员不会比企业家更了解市场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所以，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抛弃了产业政策，或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对产业政策感过兴趣，曾经实现过某种程度产业政策的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之间也不具备因果的关系，实行产业政策的经历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教训而不是宝贵的经验，更不是难以逾越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所以，北京市政府现在对金融行业的意见仅仅是“指导性”的意见，其约束性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政策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这类富有“雄心壮志”的、“积极”的产业政策或产业意见越少越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致力于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而不是去直接干预企业的商业决策。一个好的经营环境就是一个产权和契约能够得到有力保障的经济环境，就是一个交易成本比较低的经济环境，就是一个得到政府有效管理、拥有良好经济秩序的经济环境，就是一个没有经济管制的、可以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就是一个有良好基础设施的经济环境。政府应该是中立的、没有产业偏好的，所有的规则都是不偏不倚地针对所有企业的。政府应该坚持非歧视性原则，不要试图像在计划经济年代那样去扮演挑选“明日的希望之星”的角色。哪个产业应该发展，某类企业应该向哪个地理区域集中，是不同的企业家在商业原则下进行分散决策的一个最终结果，而难以事先规划，华尔街和硅谷是谁规划出来的呢？作为金融中心的平遥和太谷是谁规划出来的呢？平遥和太谷金融业的衰落又是谁刻意压制的结果呢？实际上这是市场运行的结果。相同类型的企业会逐渐地向某一特定的区域集中是经济规律，是受规模经济效应支配的，所以，再小的城镇也有自己的“商业街”和“繁华地

段”。因此，没有政府的规划，也能够产生王府井、硅谷和华尔街，一切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再伟大的人、再善辩的人都无法和市场争论，语言改变不了经济的规律，在市场没有失灵的领域，市场的决定就是最优的、最正确的。就北京金融业的发展而言，“筑巢”和“引凤”都不应该是政府考虑的事情，是写字楼里的投资人考虑的事情。

产业也没有“好”与“坏”的问题，只有合法不合法、违法不违法的问题。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的产业就是适合北京的产业，能够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就是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为了一点租金补贴就扬言要搬家，那搬家好了，不下蛋的鸡你给它修个金窝也下不出来蛋，给它起个再洋气的名字也是个下不出来蛋的鸡。在北京没有赢利能力的企业就是一个不适合北京的企业，能够在北京获得良好投资回报的企业就是一个适合北京的企业。那些真正能够在北京赚到钱的金融企业，它会为了一点写字楼租金补贴就放弃“最优”的投资地点，而把数十亿元的投资投放到北京这个“次优”的地方吗？数十亿元的投资会为了一个北京户口改变自己的投资决策吗？那些拼命游说政府进行照顾和扶持的产业或企业都是前景暗淡的产业和企业！北京的地价这么贵，密集使用土地的产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自然就会逐渐提高，否则即使政府刻意地去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也没有用，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看看许多城市那些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规划”出来的空空荡荡的“商业街”就知道了。

所以，如何协调金融街和CBD之间的关系，如何和上海、深圳、天津争夺金融中心的地位，如何和其他的城市竞争金融企业，根本就不是地方政府应该考虑的事情，而应该是新闻记者谈论的事情，这样的话题很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哪个城市成为金融中心，那是金融企业家分散决策的一个最终结果，市场在绝大多数领域都是有效率的，在这些领域，市场的决定就是对的，不要和市场争论。政府不要给不同的行业算命，也不要给不同的城市算命，试图算出来什么行业是有希望的、什么行业是没有希



望的，试图算出来到底是北京还是上海能够在日后成为亚太地区经济运行的控制中心，试图算出到底是“金融街”吃掉“CBD”，还是“CBD”吃掉“金融街”。这样的话题政府不应该介入，这样的话题应该留给媒体记者，这些话题都是炒作的绝好标题。

北京最终成为还是没有成为金融中心根本就不重要，成为金融中心固然不错，成为艺术中心也不错，成为文化中心同样不错，北京市政府的责任不是挑选“北京经济”所穿“衣裳”的款式和花色，而是管理这个城市，使之适合从事商业活动，至于什么产业发展起来，不需要政府关心，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胜出者就是最适合北京的。北京可以制定一个较高的环保标准，但不能为了限制特定的行业而对不同的行业实行环保方面的双重标准。

金融业的特殊重要性根本就是臆想出来的，纽约有了华尔街就比芝加哥、布鲁塞尔和卢森堡享有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吗？根本没有！金融服务对于经济的运行是重要的，其他的服务业同样是重要的，服务业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有市场需要不需要的分别。经济竞争的结果是利润率的趋同，金融业的利润率并不会比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这是经济规律，尽管外观上看金融机构都在金碧辉煌的大厦中办公，那不过是一种广告行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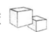
我们要像听党的话一样听市场的话，我们要像信任党一样信任市场，我们要像尊重党一样尊重市场。

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

> 我们反对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去直接推进城市化，注意，在这里我们说的是“直接推进”，而不是主张政府部门对城市化无所作为。城市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是经济发展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不应该把人为的城市化当做刺激经济增长手段，这个因果关系一定不要颠倒了。

要思考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这里所说的“农民”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户籍制度，所以对“农民”至少可以做三种理解，第一种是从户籍的角度来说的，指农村户口的居民，在他们中间，现在已经有大约2亿人长期在城市从事各种工作，剩下的人在农村地区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第二种是从实际居住地的角度来说，指在农村地区工作、生活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第三种是指在农村地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他们几乎全部都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这三种人口可以用农村户籍人口、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加以概括。我们通常所说的“提高农民收入”中所指的农民主要是指农业人口。

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呢？依靠提高粮食的产量可不可以呢？粮食这种商品具有需求价格弹性低的特点，就是说当粮食的供给增加以后，粮食的价格会在价格规律的作用下下降，而且价格下降的幅度要大于需求上升的幅度，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单纯为了增加粮食的销量而进行的粮食产品打折活动。超市在开张时售卖超低价大米是为了增加客流，就一家超市而言，大米的价格弹性十足，但就整个粮食市场而言，大米缺乏弹



性。和时装不一样，一个人不会因为大米便宜就吃五顿饭。

因此，在现在这样一家几亩地、十几亩地的经营规模上，如果我们单纯依靠增加粮食产出的办法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就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所谓“谷贱伤农”。那么，如何提高农户种粮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呢？出路在于增加农业人口的人均粮食种植面积，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进而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粮食种植产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的收入才能随生产的增加而增加。当然，它们之间是一个渐进的、相互促进的过程。

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可以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产品结构的途径来提高收入，比如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大力发展养殖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与保证粮食种植面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发生冲突。

增加人均的粮食种植面积，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又依赖于农村人口准确地说是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所以说不能局限在农村、农业、农村人口来研究“三农”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或主要是一个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够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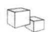
这里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指城市的经济发展，因为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存在着显著的聚集效应，经济活动和人口随经济的发展自然就会聚集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区域内，因为这样能够节省交易费用，这就是我们即使在一个很小的市镇上也能够发现自发形成的“商业区”的原因。虽然三大产业在农村都存在，但第二、第三产业的规模都很小，主要是为附近的农村居民提供那些难以长途运输、难以远程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如豆腐房、理发馆、小饭店、杂货店等，这些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很难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当然，新兴小城市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了，自然就另当别论了。对于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来说，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无疑主要依靠城市化。城市化包括现有城市的扩张和新

兴城镇的形成。

所以，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解决，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长期和根本上来说要依赖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城市化。虽然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发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应有之意，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城市的发展，依靠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只有工业部门发展起来了，才能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只有工业部门发展起来了，第三产业才能够逐渐发展起来，去满足人民生活对服务产品的需要，满足日益繁荣的市场交易对各种服务产品的需要。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为提高原先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的收入创造了条件，也为提高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的收入水平创造了条件。所以，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人口会持续降低，农业人口的收入会持续上升。当然，在一国经济系统中，农业的比重和从业人口的降低与农业的重要性不应混为一谈。

我国的经济持续增长近 30 年，但农民的收入似乎增长有限，以至于出现了“三农”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农村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口，对这些剩余劳动人口的消化和转移不是在短期能够完成的，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所以，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出了举世罕见的经济奇迹，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创造出了数以亿计的工作岗位，目前已有两亿多农村人口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依然庞大。所以，我们不应该质疑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对农民收入提高的基础性意义。

但我们反对运用行政的手段去直接推进城市化，注意，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直接推进”，而不是主张政府部门对城市化无所作为。城市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不能够把人为的城市化当做刺激经济增长手段，这个因果关系一定不要颠倒了。城市里如果没有就业岗位，农民进了城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徒增城市管理的难度和成本，这些人也难以在城市长期生存下来。如果城市里随经

济的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不用刻意宣传，农民也会进城来工作，因为他们的收入会因劳动力的流动而提高。所以，在城市化的问题上，各级政府应该做的是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尽可能良好的制度环境。在绝大部分经济领域，市场并没有失灵，不需要政府特殊的促进措施。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公平竞争，需要的是统一的游戏规则。只要我们的经济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持续增长，城市化就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不需要特殊的直接促进。

虽然城市化过程不需要政府直接的促进措施，但在两个方面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一方面是解除政府对劳动力流动、居住和就业的各种限制措施，例如应该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分阶段、分层次、有序地解除户籍制度，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另一方面，面对城市化过程，除了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外，政府还应该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有所作为，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这类产品和服务需要由政府垄断性地提供。随城市人口的增加，这类产品和服务的人均数量和质量也应该根据人口的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应地增加和提高。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一下子做到按照统一的规则让每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无差别地享受这些公共产品与服务，但这至少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目标，应该积极地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创造条件，而不是消极地等待时机的成熟，更不能拖延改革的步伐。

由上分析，不论是农村人口还是农业人口，收入的提高都高度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依赖于这种发展的结果（即城市化），依赖于政府是否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好的游戏规则、好的制度环境。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是一个会持续数十年的过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还会存在，甚至会进一步扩大，因为农业人口收入的增长速度在现在这样的经营规模上是不可能超过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速度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有数亿

农民居住在农村，而且在总体上来说是缺乏劳动技能的低水平劳动力，从年龄结构上来说也是以中老年人为主。据乐观的估计，即使到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城市化水平提高到了60%，我国农村仍然会有5.5亿左右的居民；就是到了2050年我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农业人口降低到15%，也仍然会有1.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但我们不能让这部分人口在漫长的岁月里陷于贫苦的境地而无动于衷，我们也许无法让这部分人口获得和城市人口一样的收入水平或一样的收入增长幅度，但我们现在已经有经济实力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各级政府也一直有这样的政治意愿，所以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卫生、教育、村容村貌环境整治等许多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但着手点是建设和改善与农村居民生活有关的洁净水和自来水系统、电力系统、交通系统、电视广播系统、下水道系统、沼气系统、厕所等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的局面，改善农民的生活、生产和消费环境，当然也有利于启动农村的潜在消费，创造新的农民就业机会，带来工资性收入，减轻第二产业产能过剩的压力，促进城市的发展。

新农村的建设资金应该主要由公共财政提供。农村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应该和城市一样由政府提供，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缩小城乡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差距，让他们分享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应该以现在的自然村为单位进行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要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从各个地方的真正需要出发；要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站在农民的角度进行规划和实施，要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要给农民造成新的负担；不能搞成政治运动，也不能搞成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不要把华西村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不能强行拆农民的房子建别墅或新房，农民建新房应该是自主的行为；不能强迫农民进行迁移、合并，要注



意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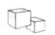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与努力，不应将其理解为运动，“三农”问题中的任何问题都不是通过一场运动能够加以解决或明显缓解的。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不是要将农民固定在农村，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修建公共基础设施，对提高农民的长期收入水平帮助不大，不会在客观上阻止农民进入城市。

尤努斯的穷人银行

> 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之分，难道还有“穷人的数学”和“富人的数学”？但就经济政策和具体的制度安排而言，却存在有利于哪个利益集团的问题。

孟加拉国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为创办了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乡村银行——格莱敏银行（孟加拉语“乡村”的意思）——帮助了数百万的穷人特别是妇女摆脱了贫苦，被授予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的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同的人从中得到了不同的启示。有的人说“穷人的信用不比富人差”；有的人说中国呼唤“穷人经济学”、“穷人经济学家”、“穷人银行家”；有的人赞赏尤努斯对穷人的关爱和信任；有的人痛斥中国的银行和“坏经济学家”、“坏经济学理论”嫌贫爱富，傍大款，喜欢锦上添花，不喜欢雪中送炭；等等。但就我看来，这些认识都不得要领。

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的银行向穷人索要23%的高利率，你还会认为尤努斯关爱穷人吗？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的银行只对五人组成的小组贷款，而且这个小组每周必须开一次会时，你还会认为尤努斯特别信任穷人吗？尤努斯绝不会要求富人贷款也来个“保甲连坐”的。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的银行96%的客户是妇女的原因，是因为尤努斯认为孟加拉国的妇女较男人更有荣誉感、更不喜欢赖账、更善于理财时，你还会认为尤努斯特别信任穷人，特别具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吗？如果我告诉你，取得尤努斯的贷款需要满足许多特别的条件，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如要求客



户只喝煮过的水、家里要有洁净的厕所、子女的数量不能过多等，你还会过分地将尤努斯和好心的慈善家浪漫地联系在一起吗？如果我告诉你，尤努斯是一位亿万富豪，你还会想当然地将他尊称为穷人银行家吗？

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虽然尤努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家，虽然尤努斯创办这样的银行，其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穷人摆脱贫困，而是由于他敏锐地发现了穷人也能够成为银行的潜在客户，能够从他们身上获得比大客户更高的回报，并且成功地创新出了新的金融制度去满足穷人对资金的这种需求。

虽然尤努斯创办的是一家商业银行，而且这家银行的利率还很高，虽然尤努斯不是穷人而是一位富豪，也根本不是什么“穷人经济学家”和“穷人银行家”，但这丝毫不会降低尤努斯在帮助穷人脱贫方面的功绩。所有接受过贷款的穷人都应该感谢尤努斯，因为穷人也有尊严，穷人也渴望能够有机会、有尊严地依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而不是仅仅依靠好心人的施舍，是尤努斯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没有因为尤努斯开办的是一家商业银行，就忽视了小额信贷银行的伟大意义。诺贝尔委员会奖励的不是尤努斯的好心，而是他在金融组织方面的创新，这种创新在减少贫困方面已经带来了显著效果。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希望，通过授予其诺贝尔奖来鼓励这种金融组织形式的普及，鼓励更多有类似效果的金融制度创新。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呼唤的不是“好人”的出现，而是好的金融制度的出现。我们的社会当然需要好人，需要慈善家，而且这样的好人越多越好，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富裕不可能够建立在个别好心人的善举上，我们的未来不能依赖于好心人的善举。我们从尤努斯的“先进事迹”里真正应该得到的启示，是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能够出现这样的银行家，出现这样的银行？

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都嫌贫爱富？是我们“黑心”的经济学家太多了？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争先恐后地为穷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廉价品和服务，甚至远在非洲的“穷朋友”都在受益呢？为什么“黑心的经济学

家”没能阻止这些企业家向穷人提供廉价物品呢？为什么有些企业家特别喜欢选择那些披着经济学理论外衣的“伪经济学”理论呢？其实，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有经济学和“伪经济学”的区别，犹如科学与伪科学，哪里有什么“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难道还有“穷人的数学”和“富人的数学”？不要让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判断力。

为什么我们的许多企业家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他们“喜享爱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论他们贫穷与富裕？为什么还有一类公司“嫌贫爱富”、面目可憎呢？把他们归为两类，一看就明白了。凡是不嫌贫爱富的，凡是整日为了市场利润殚思竭虑、爱“财”如命的，都是民营企业，这些领域都是对民营经济开放的经济领域，都是市场经济规律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凡是嫌贫爱富的，大多是“官商”、“官营”，因为这些领域有进入管制，有行政保护，可以搞垄断。官商做的都是“大买卖”，哪里看得上穷人的那点小钱？再说国有大银行贷给国有企业，最后还不了可以剥离出去，一笔勾销，都是公对公，万一穷人还不了，岂不成了国有资产流失？

不要说中国没有想到赚穷人的钱，不要说中国的“金融家”不信任穷人，也不要说中国人没有想到对穷人搞“小额贷款”，你看过去有“山西票号”，今天有“地下钱庄”。是什么阻碍了中国人的金融制度创新呢？是什么阻止了“乡村银行”的健康发展呢？是我们对民营银行的限制。银行对于普通中国人和民营企业来说就是个存钱的地方，只有对国有企业来说才是个“不计得失”的“慈善贷款者”。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资格贷点款了，还是让人大半辈子喘不过气来的房贷。现在我们的金融业已经对“西方金融列强”开放了，都依然对民营经济进入这一领域设置了很高的门槛。难道我们的金融行业宁愿对尤努斯开放也不愿意对我们的民营经济部门开放吗？我们中国的穷人难道只能等待尤努斯的“乡村银行”进入中国吗？

其实，只要我们开放金融领域，只要我们致力于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

金融部门创造一个公平发展、平等竞争、开放有序、法制严明的制度环境，以我们中国人在商业领域的创新才能，难道我们还用担心没有中国的乡村银行、没有中国的尤努斯出现吗？也许捎带着还能得个诺贝尔和平奖呢，像尤努斯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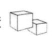
刺激内需需要的是供给政策

期待改革一蹴而就无疑是幻想，但消极地去等待时机自然成熟则不是幼稚就是不怀好意。改革需要我们积极地创造条件去推进，如果消极地等待，条件永远也不会自己成熟起来的。

中国经济在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和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就是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率。内需不足是老问题，过去出口增长比较快的时候，再加上政府投资的拉动，还能够高速前进，现在出口遇到了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大家想到的就是进一步增加政府投资，这其实是一种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的惯性思维。

中国经济存在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效率和内在活力，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拉动，过度地依赖于资源的投入。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而是需要增强经济活力的供给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供给政策当然要双管齐下，但二者解决的问题不一样，重要性不一样，政策的力度也不应该一样。财政刺激政策是应急性的、技术性的和着眼于短期效果的，而供给政策则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和着眼于未来的。

供给政策的第一项内容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向民营经济开放现在受到进入管制的经济领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许多外国资本都能够进入的经济领域，却为民间资本的进入设置了重重障碍，设置了高门槛，如在金融、石油石化、能源、矿业冶金、邮政、交通运输、烟草、电力、港口机场、电信服务、重大装备制造、教育、文化、卫生、传媒、法律、



艺术等领域，“对内开放”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对外开放”的步伐。

行政垄断之所以难以打破，就是因为垄断利益太丰厚了。但行政垄断终非久长之策，迟早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越早打破行政垄断，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就能越小一点。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学理论，单就打破行政垄断、开放经济领域，就能够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经济的自由化政策就是最有效的就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反腐败政策。

供给政策的第二项内容就是解除各种经济管制措施，提高我国经济系统的自由度，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我们知道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能够通过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去降低我们的交易成本，通过降低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我们知道，比较不同制度优劣的指标就是交易成本，一套好的制度系统的标志就是低交易成本。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对经济的运行管理不足、管制有余，特别是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太多了。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现在不仅控制着大部分的经济资源，还掌握着大量的微观调控能力，不该管的管得太多了，该管的往往又没有人管，或没有管好。企业既要围着市场转，还要围着官场转，跑“部”前进，听从两个指挥棒指挥。总有盖不完的章、填不完的表以及名目繁多的公关活动，导致企业负担太重，效率大大降低。形形色色的经济管制对中国经济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作茧自缚”。

我们知道，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虽被冠以“奇迹”，其实并无经济理论上的不可解释之处，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长期快速经济增长，如前苏联、日本、联邦德国、中国台湾等，只有具体原因上的区别，而没有基本原理上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重新获得了经济自由，尽管还不那么彻底。有了经济自由，可以自己自由选择、自由决策了，中国的民营经济才有机会重新萌芽、发展起来，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才有可能有机会和国外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制度、国外的投资结合起

来，才能够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发挥它的经济价值，才有机会模仿，才有机会利用贸易不断自由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才最终有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别人50年、100年走过的道路。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控制了所有的经济资源，封锁了所有的经济机会，亲自组织所有的经济活动，老百姓不但不可能自己掌握经济资源、自己组织经济活动，连在心里想一下都不行，因为那是最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乘着世界金融危机这股“西风”，解除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提高经济的自由度，为所有的经济成分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民间的投资就能够得到大发展，就业率和家庭需求就能够得到大大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能够持久保持，我们经济增长的效率才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否则，民间经济越来越依附政府，越来越依附国有经济力量，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有可能越走越偏，甚至可能会偏到权贵市场经济那边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问题。

供给政策的第三项内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我国的民间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一直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内部需求在90年代中期以后也长期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民间需求增长乏力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迟缓直接相关，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没有能够领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反而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造成了“国富民穷”、民间需求不足的局面。

在政府职能转换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并存。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符合经济规律的运行规则，如果这些游戏规则得不到严格的执行，我们的市场经济必将演变为一种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另外，由于我们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增量改革的途径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还长时期地保留着大量的微观调控权力，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从而具备了“越位”的基础和能力。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现代政府首要的或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交易成本尽可能低的制度环境，也就是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不是能够无条件地运行的，也不是无条件地就能够成熟起来的。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但真正建立起能够正常运转的、有秩序的、所谓“好”市场经济的国家不超过三四十个。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保护产权、保障自由竞争和平等竞争的制度系统，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我们最终得到的市场经济必然只能是低效率的、混乱的、残酷的和权贵的市场经济。

目前，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多层次、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在建设之中，这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安全网”还不能说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产权还得不到非常有效的保护，合同的执行还得不到有力的保障，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还得不到真正平等的经济机会。政府部门目前控制着四分之三以上的资产性财富以及这些不断增值的资产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巨大收益，掌握着金融系统和金融资源，掌握着巨大的、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的权力，还进行着大量微观层次上的经济调控，基础性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格局尚未最终形成。

因此，内需不足的老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内需不足，准确地说就是家庭部门的需求不足、民间的需求不足，而不是政府的需求不足。政府的需求一直很足，来自政府的需求和来自外国人的需求一直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轮子。

但是，依靠政府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因为它的效率太低了，是在用新的政府投资来消化旧的政府投资，用政府投资来

带动新的政府投资，用新的政府投资来消化政府投资形成的产能，搞政府投资的自我循环。这实质上是在透支未来，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过度超前，政府投资兴建的地标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豪华政府办公楼愈演愈烈，甚至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我们不能总是建设造新工厂的工厂，要考虑这些工厂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有没有人买，特别是在现在外部需求下降的环境中。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建立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建立一个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而是“到位”的政府。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深化认识、统一认识，但不能止步于认识、目标和指导方针，要进一步把这些认识和指导方针转变为可操作的改革措施，否则那些改革的目标就难以化为现实。期待改革一蹴而就无疑是幻想，但消极地去等待时机自然成熟则不是幼稚就是不怀好意。改革需要我们积极地创造条件去推进，如果消极地等待，条件永远也不会自己成熟起来。转变政府职能涉及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在现有的国情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部门自己革自己的命，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和阻力，但我们别无选择。能否打破阻力，转变政府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决定了我们在未来是走向法治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继续走向权力加市场的权贵市场经济。

供给政策的第四项内容就是减税，特别是对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减免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扩大内部需求，特别是民间需求。

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人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 GDP 的增长速度，我们有很大的减税空间和能力。2007 年我们的财政收入较 2006 年增长了 31%，达到了 5.1 万亿元，按照 200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去计算的话，相当于 12.3 亿个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或者相当于 3.7 亿个城镇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正好占城市和农村可支配收入 10.7 万亿元的一半。而经济系统最复杂、服务业最发达、社会保障系统完善的美国，2007 年的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为 2.4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8%，相当于 8 500 万个美

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占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8.4万亿美元的1/4。

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仅占GDP的20%左右，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政府还有很大的发债潜力。可供参照的是西欧国家，它们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普遍在60%左右，美国政府的比重高一些，国债余额占到了GDP的71%。所以，我们的政府还有很大的国债容量没有使用。因此，减税、免税对于政府的财力来说不是个问题。

企业的税赋减轻、经营成本下来以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增加，来自国际的需求就会自然上来一些。家庭的税赋负担降低以后，国内的需求自然就会增加，填补出口下降留下的缺口。

供给政策的第五项内容是深化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建立基础性生产要素由市场配置的机制。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面子、计划经济的里子，是市场经济的苗、计划经济的根。最终产品的价格98%都放开了，由市场来定价，但许多关键的基础性经济资源还控制在政府手中，实质上就是放开了馒头的价格，但还控制着小麦的价格。政府部门依然掌握着从计划经济时代继承下来的资金、土地、自然资源等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能力，还有太多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按照计划经济的逻辑运转。

大量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和巨大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使政府拥有了同样巨大的寻租基础和寻租空间，结果导致钱权交易、钱权联姻、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扩大，威胁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同时，这些经济资源的行政定价和低价政策也使生产要素的价格严重扭曲，在事实上鼓励了资源的浪费，强化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怎么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呢？所以，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必须转变到以市场配置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上来。

把钱直接交给老百姓

消费券的发放或可成为终结凯恩斯主义"传统智慧"的开始。

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内部需求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一些争议。其实，发放消费券并不是一个新的、复杂的东西，欧美、日本等国家已经有过先例。发放消费券操作简便，行政成本较低，刺激家庭需求的效果明显，也没有什么漏出。

一些学界朋友反对的一个理由是这种措施缺乏针对性，是撒胡椒面，殊不知这正是它的优点。相对于无消费限制的消费券，有产业指向的消费券会限制消费者的选择自由，降低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率，还会人为扭曲产业结构，使之偏离人们在自由选择条件下的消费结构。有产业指向的消费券还会引起不同行业部门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寻租竞争，大家争着要成为政府消费补贴能够关照到的对象。把资金集中投放到少数产业，当然效果的"能见度"就高了。但把消费券所代表的消费需求由消费者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去，虽然政绩的"能见度"没有了，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不好总结了，但经济运行的效率提高了，这样岂不更好？

经济学家们反对发放消费券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存在一个替代效应，恐怕最终起不到刺激需求的作用。替代效应是存在的，但远远没有百分百那么夸张和极端。我们的家庭部门目前的情况是既缺钱又不敢花钱，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可支配实际收入都长期低于实际 GDP 的增长率。所以，内需不足，其主要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出了问题，工资性收入在

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过低，无钱可花。况且，难道我们因为退休者不会将养老金的增长部分全部用来消费，就不应该给他们提高养老金了吗？这样的逻辑其实是很荒诞的。

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消费券刺激消费后劲不足，政府应该将财政用于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上，发放消费券有宝剑砍柴之嫌，同时会加大政府的财政压力。其实，消费券和完善社保体系并不矛盾。中央之前对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和针对生活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的行动在性质上都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属于社会救济。况且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体国民的、真正能够承担起“社会安全网”职能的社会保障体系，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我们不可能在这期间无视经济运行的现实需要，把其他“治标”的措施都视为是无意义的，那样就太极端了。

至于财政压力，其实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一个财政支出的结构问题，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发放消费券直接刺激民间需求，还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间接地刺激民间需求。再说，我国财政前几年盈余不少，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来看发债的空间目前还很大。

也有学者指出，发放消费券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和长远问题。全民发放消费券本来就是一种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应急性措施，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没有人期待它去解决本质上的问题。如果眼前的这个坎都过不去，经济失速了，失业加剧了，社会不稳定了，哪里还有环境去实行治本之策呢？标本兼治、治标治本都很重要。

就应急性的措施而言，我认为发放消费券应该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对于未来可能发放的消费券，除了要坚持消费上的无限制，保护消费者的消费自由、保护所有经济成分的利益以外，还要坚持消费券发放上的无选择性，不论贫富，不分老幼，人人一份。这是因为这样做既可以节约耗费在甄别不同人群上的资源，还能够减少因此而发生的贪污腐败和弄虚作假。就让富人搭穷人的便车，否则得不偿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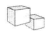
就消费券的消费而言，与收入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不同，越富有的人

替代效应就越低。我们还可以鼓励那些自我鉴定为富人的人把自己得到的消费券捐献出来。强制消费券与现金“捆绑使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配合的比率宜低不宜高。

发放消费券还引发了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担忧，其实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未来可能发放的消费券应坚持“少食多餐”的原则，以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并持续地刺激内需。例如，我们可以规定每张消费券面额100元，每张消费券有效期的起始日期间隔一个月，每张消费券有效期限为两个月，过期作废，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千元的消费分散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合理消化，避免通胀。真正需要警惕的倒是目前银行贷款发放的速度过快，埋下了未来发生通货膨胀的隐忧。

至于消费券的发放主体应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发放对象上应该是“普惠”还是“特惠”，我认为是一个中央和地方如何配合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因为资金的来源不一样。中央层面应该发，也有能力发，我建议执行“国民千元消费券计划”；各地方政府也可以发，但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当地的财力量力而行。在越宏观的层面上，“普惠”的比重就要越大。中央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最好完全按照“普惠”的原则；越靠近基层，在发放的对象选择上可以越有针对性，因为越靠近基层，政府越拥有关于发放对象的信息优势。这样，地方政府的“特惠”和中央政府的“普惠”就形成了一种相互配合的格局，点和面都照顾到了。但基层政府也要以“普惠”的消费券为主，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减少弄虚作假、贪污腐败、降低行政成本的问题。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有行政效率和行政成本的意识，要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机制来推行这项工作。

就刺激消费而言，把钱直接发给政府的委托人——老百姓，总是比把钱交给老百姓的代理人——政府让人更放心。这应该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太穷、政府太富有。我们的产能已经大大过剩了，基础设施早已经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了，银行的坏账已经够多了。我们



还要迷恋早已过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多久？凯恩斯主义能够给中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不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效率和可持续的繁荣。对于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经济发展的早已不是生产方面而是需求方面了。对于中国，我们需要的根本不是什么加大政府投资这样的需求管理政策，我们需要的是打破行政垄断、解除限制性的经济管制、调整税收结构、减税、解放民营经济、鼓励创业、鼓励私人投资这样的供给政策。

中国的改革原本就是逼出来的，但愿这次金融危机能够逼着我们把改革再向前推进一大步，但愿未来消费券的发放能够成为我们抛弃政府万能、歧视民营经济的"思维定式"和"传统智慧"的转折点，把改革和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制度质量与经济繁荣

> 即使一个穷国突然之间拥有了和发达国家一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但其人均产出水平可能仍然只是发达国家的一部分。支持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民营化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思想的主流。保障经济自由与产权的制度体系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发动机，当经济失去自由时，它或许能增长一段时间，但停滞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会到来。

经济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会增长或不增长，制度的变迁通常也是经济增长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第一位的影响因素。如果我们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与总体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缺乏了解，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距。制度的变迁通常意味着人们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社会文化和商业活动交易成本的改变，从而使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对基础制度以及它们对经济活动绩效的影响缺乏了解，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实的经济系统是如何运行的。

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依赖于这个社会所能提供的产品与劳务的规模、质量及分配状况，一个社会的产出规模不仅取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人口规模，还取决于该国制度系统的质量，更准确地说取决于该制度的生产效率特性。所以，即使一个穷国突然之间拥有了和发达国家一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但其人均产出水平可能仍然只是发达国家的一部分。落后国家之所以不能有效地



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就在于制度性基础设施的质量。

一国制度系统的质量取决于由这套制度系统所决定的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越低，制度的生产效率就越高。由于一国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依赖于一国的制度系统，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教育文化等诸方面的制度，所以一国的制度系统至少部分决定着该国的经济绩效，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绩效最终可以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得到至少是部分的解释。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是造成持续贫困和财富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一国的制度系统决定了一国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又决定了该经济系统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的规模，清晰的和受到法律保护的产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经济规模，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不受强制性实体或政府滥用权力影响的经济体能够使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得到充分发展。17 世纪兴起的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出现的不同经济增长率，就可以从每个国家所建立的制度系统的性质中找出答案，荷兰能够成为这一时期的经济领袖，就是因为荷兰政府通过保护私人产权和反对行会等限制性组织的发展，激励了人民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到发明与创新活动之中；法国和西班牙经济活动的衰退，就与王室通过保护和支持行会的垄断性限制权力，以换取行会缴费和筹集财政收入的做法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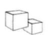
虽然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宗教信仰和工作伦理对一国经济的增长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一旦支撑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制度框架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将会失去大部分甚至全部的作用，人们的行为特点也将随之改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一个历史悠久而又非常注重历史传统的国家，在发生了某种革命性的剧烈制度变迁的前后，这个国家的人民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方面所发生的剧烈变化。文化传统本身就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这些习惯和传统也会被制度变迁所破坏，因为制度系统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开展活动的

激励结构，决定了人们采取某种行动的预期回报率。从这一角度看，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强烈的社会生产性，制度通过决定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来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制度变迁会改变努力与收益之间联系的预期，进而通过改变一国社会成员的行为取向而最终影响到一国的经济绩效，因制度因素而产生的较高交易成本有时也被称为“制度税”，这种税有时高得使某些经济活动彻底终止。曾被英国派驻香港任财政部长的马丁，在1844年曾预言香港不会成为贸易繁荣之地，但香港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可以证明，比物质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保护个人财产和自由契约的市场经济制度。

1979～1985年间中国农业部门发生的奇迹，也成为验证制度因素决定性地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理论的重要案例。在1950～1978年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在1979年实行改革之后，人均产量到1985年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些证据都表明，制度因素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

一个保证人民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公正清晰的、能够有效规范政府行政活动的法律体系和高效、廉洁、透明的司法制度对于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个体现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的法律体系将会提供一个保护自由竞争、平等竞争、公平竞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框架。自由贸易、自由企业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会大大减少官员腐败的范围和程度，并使政府将行政活动集中于提供真正的公共物品上——良好公共秩序、公正的司法制度、高效的公共教育、完善的社会保障、货币稳定等。

20世纪我们所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一国制度系统的质量是决定该国经济增长绩效的最主要的长期因素。政治开放、个人拥有较多权利、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比政治封闭、政府拥有过多权力为特征的国家或地区享有高得多的平均增长率。经济自由度也常常被看做是描述制度性基础设施质量的一个指标。经济自由的本质就是私人经济部门的投资者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不受国家的广泛限制，享有较高的经济



自由度。历史经验说明，市场化程度最高以及拥有最低税率、最少的贸易障碍和最强有力的产权保护的国家均享有了经济上的繁荣，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相关关系。

逻辑和历史均已证明，将个人和自由置于国家和强制基础之上的自由经济制度，要远比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制度的成本小，支持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民营化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思想的主流。所以，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想要摆脱贫困的国家必须给予其社会成员以更大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并给予产权以最好的保护。保障经济自由与产权的制度体系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发动机，当经济失去自由时它或许能增长一段时间，但停滞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会到来。

用体制改革而不是塔吊来建设世界城市

>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用“推土机”和“塔吊”来建设世界城市，而不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制度环境的优化来建设世界城市。作为世界城市，它必然首先成为一座开放的、多元的、繁荣的、理性的、宜居的、自由的城市。

在2010年1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市政府在其向人大代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的目标。

什么是世界城市？你可以从金融中心、国际机构的数量、国际会议中心、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贸易中心、国际交通信息中心、世界研发中心、世界教育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流的基础设施、人均GDP、年入境人数等多个方面对世界城市进行定义，但在这些指标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更为核心的标准，就是一座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具有的全球性的影响力、控制力和辐射力。

这种影响力、控制力和辐射力作为一种“结果”，其产生的基础是制度因素。所以，如果没有世界一流的城市管理体制，或者说没有世界一流的制度性基础设施，想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是绝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用“推土机”和“塔吊”来建设世界城市，而不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制度环境的优化来建设世界城市。我们必须明白，作为世界城市，它必然首先成为一座



开放的、多元的、繁荣的、理性的、宜居的、自由的城市。

如果我们能够致力于体制的深化改革，特别是基础性的体制改革，我们的国家和北京这座城市就能够真正走向可持续的繁荣之路，北京成为世界城市就会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水到渠成。如果我们急功近利，想用几天建成“罗马”，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大量的政府主导的投资来回避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与创新，我们能建成的只能是一个貌似“世界城市”的北京。以这种方式建设世界城市，则北京越像世界城市，它离真正的世界城市的目标就越远，因为那些昂贵的巨型的建筑越多，资源越多地被配置在这些政府主导的项目上，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越低。

我们在短期是不可能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十年之内也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我们自己对“世界城市”重新作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定义。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能够迎来只能是一股新的基础建设新高潮，而不可能是深化体制改革的高潮，犹如在前奥运时代我们看到的一样，因为短期能够看到效果的只能是盖楼。

有专家提出，把北京建设成国际一流水平的世界城市，要走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超常规发展道路”，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模式就是不能依靠市场力量的“自然发育模式”，而是主要依靠政府力量的推动，这其实就是用盖大楼的方式来建设世界城市。还有人提出通过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来带动北京周边区域的发展，这也是把建设世界城市理解为盖大楼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了。

坦率地说，北京什么时候成为世界城市一点都不重要，那只是个结果而已，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成为世界城市的基础是什么，如何才能够让北京、让中国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什么时候中国真正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国崛起了，北京可能也就自然成为世界城市了。如果我们仅仅想通过大搞基本建设、招商引资的办法来建设世界城市，我们充其量只能把北京建设成为一座外观上很像世界城市的巨大城市而已。

政府与市场



关键是要消除滋生行政审批项目的体制基础

> 这些无处不在的经济管制，极大地遏制了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创造性、想象力的成长和发挥，极大地遏制了聪明智慧的中国人企业家才能的培养和发育壮大，中国企业家研究市长和政策的时间大大超过研究市场的时间。在那些创造并掌握行政审批大权的部门和官员眼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这些貌似崇高的目标与理念，与实实在在的部门利益、私人利益比起来，都显得那么遥远和抽象。

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了314项行政审批项目，并且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改革指导原则：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这样的改革措施无疑是值得称赞和鼓励的。改革总是在经济增长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容易取得进展。低增长带来的种种风险比较容易激发起管理层改革的勇气，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均是如此，不论在西式的民主国家，还是在制度特色浓郁的国家，均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即使没有选票的激励，也是如此。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这次改革措施出台的基本背景。当然，现在的执政团队希望能够多留下一下优质的政治遗产，为新的执政团队多消化一些经济体制上的不良资产，也是

可能的动机之一。

但这计划取消的314项行政审批，与目前按照“两个凡是”标准划分出来等待取消或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比起来，虽然不敢说是沧海一粟，但给人的感觉是杯水车薪。况且，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发生实质性进展的话，如果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依然得不到人民有力约束的话，其他的行政审批项目还可能会源源不断地滋生出来，甚至可能重新出现越清理越多的情况。

目前这样的改革还是主要依赖于管理层的自觉，主动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取消什么，保留什么，先取消什么，后取消什么，完全是由管理层说了算。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在决定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时候，就可能会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把那些高附加值的行政审批项目留在手中，而首先放弃那些低附加值的行政审批项目。

我们当然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溶解三尺之冰，也非一日之功。不同层次的成千上万不合理的政府审批项目，要全部取消绝非易事。但既然国务院已经清晰地给出了“两个凡是”界定标准，就应该按照这个标准对现有的政府管制措施加以彻底审查，然后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个明确的取消这些不合理政府管制项目的时间表。

要把我们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成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建设成法制的、民主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需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该做的做得太少，如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城市公共交通、下水道、市场秩序、商业环境、廉洁高效的司法服务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而不该管的又管得太多，如五花八门的政府管制措施、竞争性经济领域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添乱的产业政策、忽冷忽热的政府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价格指导、企业约谈、名目繁多的优惠措施、不胜其烦的评比检查等。所以，政府的“越位”、“缺位”并存、经济管制有余、社会管理不足就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些无处不在的政府管制，再加上政府部门施行这些管制活动时所具有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这些政府管制不可避免地成为滋生寻租活动的肥沃土壤。这些无处不在的经济管制，极大地遏制了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创造性、想象力的成长和发挥，极大地遏制了聪明智慧的中国人企业家才能的培养和发育壮大，中国企业家研究市长和政策的时间大大超过研究市场的时间。

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绝非中国经济发展之福。只要是政府主导，结果必然是经济管制无处不在，社会管理动力不足，寻租活动泛滥成灾，行政垄断横行霸道，商业环境不断恶化，税收负担沉重不堪，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民营企业发育不良，经济波动剧烈频繁，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私有产权难以得到充分保护，市场难以发育成熟。

所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沿着六个方向进行：保护私有产权；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调整，将国有经济力量主动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实行“对内开放”的经济政策，加强市场的竞争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解除经济管制，恢复市场活力，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能；降低税负，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致力于消除“三公”消费；转变政府职能，按照法治、民主、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科学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把政府工作的主要中心放在为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弥补市场失灵、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物品上来。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显然陷入了难以继续向前推进的胶着状态，因为在过去20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渐进式的改革节奏，为依附于这些过渡性制度安排上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充足的时间、空间和养分，使它们能够从容地萌芽、成长、壮大。伴随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成长，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呈现出固化和刚性的特征，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在近十年来难以进一步深化。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似乎已经能够比较从容地控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方向和节奏，尽管在中国经济进入不景气



阶段时，也能够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做出大小不等的妥协和让步。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许多领域，在许多情况下，改革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改革的对象。许多政府部门成为这个领域内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在那些创造并掌握行政审批大权的部门和官员眼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这些貌似崇高的目标与理念，与实实在在的部门利益、私人利益比起来，都显得那么遥远和抽象。

因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辟空间，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过去 30 年取得的成就也很可能得而复失，坠入体制改革停滞的陷阱之中。法制的、民主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须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中国要续写过去 30 年经济增长奇迹所必备的基本前提，否则民族复兴、大国崛起均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而要实现建成现代市场经济的目标，必须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如果政府的权力能够在阳光下运行，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如果能够采取一种机制使官员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而非感恩于提拔自己的上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掉那些不合理的行政审批项目滋生的土壤。若能如此，实为中国之大幸。

互害还是互利取决于制度环境

> 如果我们连人的头脑、思想、言论都能管理得井井有条，还有什么样的市场管不好呢？政治思想战线的经验是什么？那就是：毫不留情，绝不手软，放弃幻想，老老实实。

互害社会

做馒头的不吃自己做的馒头，炸油条的不吃自己炸的油条。为什么？因为当这些生产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在作为生产者的自己面前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是对称的，他知道自己是如何生产出这些东西的。

因为他们是生产者，所以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生产领域搞“特供”，如菜农专门为自己开辟一块园子种菜，厨子用自认为相对安全的原材料为自己做饭。所以，不是只有高管才能搞特供，我们几乎人人都在搞特供，因为我们都身兼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可以欺人，但不会自欺。我们都会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全部信息以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但我们作为生产者通常只生产一种或一类东西，因为今天的我们是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而非小农经济环境中。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分工与交换。我们以分工的形式进行专业化的生产，然后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自己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因此，除了在自己的生产领域内，我们每个人是无法在生产上对自己搞特供的。在消费上，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邮购商品，搞特供，但这样做

的经济代价和时间代价太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别无选择地不得不去冒险消费那些不可靠的商品和服务。于是有人创造了一个新词汇——互害社会。人人加害别人，同时人人都是受害者。

要像管思想一样管市场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不可靠？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二是因为政府不尽职，市场监管不力。

作为消费者，与生产者相比，他获得的所生产产品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生产者拥有的信息多，消费者拥有的信息少。所以，世界各国的法律都强制生产厂商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关键信息的披露，所以我们买方便面的时候都会看看配料表。

生产香肠的厂商可能会因为采购了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做原料而加工出有害消费者健康的香肠，在这种情况下，就这个具体的案例看，元凶就是信息不完全。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市场监管的问题，否则生产香肠的厂商在合法市场中购买到的、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检验合格的猪肉中怎么会查出瘦肉精呢？

所以，互害社会的形成其次本质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提供了劣质的公共服务，就犹如纳税人花了买豪车的价格，得到的却是一辆自行车。因为大家消费了这么多有毒有害的商品，我都不好意思举例说大家得到了一辆经济型轿车。之所以说是次本质原因，是因为政府提供了劣质的公共服务本身依然是某个或某几个“因”的“果”，我们仍须追寻那个最本质的“因”。

这个最本质的“因”就是政府的权力得不到法律的约束，得不到人民的监督与问责。政府官员对于政绩能见度低的事情（如软环境的营造），缺乏积极性。而对于那些短期就能够见到成效、能够带来权威与经济利益的事情，则乐此不疲。这就是常说的“缺位”与“越位”。政府愿意提供

高铁与探月这类硬东西，不愿意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市场秩序这类软东西。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想办法把政府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并且放在阳光下，就是要依法行政，接受人民的监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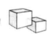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制定了许多法律，尽管这些法律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比起来还很低，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法律法规还得不到很好的执行。以食品安全领域为例，许多读者也许认为，生产厂商成千上万，工商、技术监督部门能够监管过来吗？正如成语所云，杀一儆百，只要这些部门能够严格执法，我们的市场是完全能够恢复秩序的。大家为什么远渡重洋、不远万里到外国购买婴儿奶粉呢？这说明市场是可以有秩序的。

也许有的读者认为，寡头垄断的市场还好监管一些，毕竟厂商的数量少，但在厂商数量众多的市场中，是否是很难维持市场秩序呢？有秩序的市场就是有秩序的市场，不会分成“解放区”和“白区”。如果我们连人的头脑、思想、言论都能管理得井井有条，还有什么市场管不好呢？管理言论、管理思想，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就是毫不留情、绝不手软、放弃幻想、老老实实。如果我们的市场管理部门能够向政治思想战线上奋斗的部门学习，市场的秩序是完全能够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依法行政，不能不择手段，不能黑打。

互害式的混乱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

互害社会的形成，不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本身是果而不是因。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人的行为方式是大不相同的，很多人在台北不闯红灯，在北京就不太遵守交通规则了。很多人在国内黑面判官似的，一出国就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慈眉善目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个人私利没有任何可责备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最富有解释力的一种工具，



其解释力首先就来源于经济学对人性的概括，这就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人类是一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物，人总是追求能够带来快乐的东西，而回避会产生痛苦的东西。在行为动机上，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但“自利”并非必然地等于“自私”。雷锋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也是“自利”的，因为他能够从帮助别人的行为中获得快乐与满足，雷锋也是在追求自我满足的最大化。自利不等于自私，自利更不等于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是否会通过损人利己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关键在于市场竞争主体所处的制度环境。自利说的是动机，动机本身不会伤害人，不高尚的动机不一定会导致坏的行为和坏的结果。如科学家都追求率先发现一个自然现象的产生原因、一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但这种自利行为却推动了科学的进步。餐馆的老板笑脸相迎不是因为真心喜欢你，而是为了让你下次再来，但对利润的追求却激励他不断提高服务的质量，这有什么不好呢？这就是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原理所表达的思想。

现代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更是法制的市场经济。没有市场规则，缺乏市场秩序，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怎么能够发挥出来呢？

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还远非法制的市场经济，也远非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还不是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是行政垄断和经济管制横行的市场经济，也是寻租活动泛滥的市场经济，因而还是一种混乱的市场经济。

所以，互害式的混乱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不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只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比较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我们每个人消费的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都需要通过交换活动从市场中获得，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加依赖于或高度依赖于制度性基础设施的质量罢了。

走出互害，实现互助、互利与互惠，让市场经济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只能依靠法制与竞争，就是建立法制的、自由竞争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如何把有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升级换代，如何把具有原始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造成现代市场经济，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恐怕还得依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现代市场经济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市场经济秩序就无法获得，我们就走不出互害的网络。

激进的中国高铁建设

> 照这样一个方向走下去，我们最终恐怕要通过修筑“金字塔”来拉动经济、解决就业了？

我国的“高铁”是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开始密集建设的，并不完全是满足国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需求所致。我国经过十几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整体上看交通运输网络已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了。在正常的情况下，高速铁路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与一国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渐进过程，不会出现我国现在这样的集中爆发。中国的高铁建设太过于激进。

高铁的超前建设，意味着我们的经济资源没有得到最好的利用，意味着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一方面是政府项目能够获得充裕的低成本资金，即使难以赢利也无所谓，只要事先做出一个可行性报告，声称能够赢利就可以了；另一方面是许多民营项目无法从以政府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中得到价格低廉的资金。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距离我们还相当遥远。

脱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水平的高铁的超前建设，其价格必然是“昂贵”的。这个昂贵与两个方面的要素有关，一个就是“超前”，另一个就是“国有”。脱离了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消费水平，其高成本基础上产生的高票价自然让消费者感到昂贵。而“国营”也必然导致高建设成本、高运营成本，冗员、浪费、低效率总是与之结伴而行，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只是在市场失灵领域才

设立政府企业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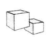
在行政力量而不是市场力量推动下建设的高铁，通常还会以牺牲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权为代价。快速列车、高速列车开通的同时，低速列车往往就被强制停运或减少运能，而不去考虑普通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这就是中国消费者经常自嘲的“被高速”。“被高速”属于一种强制消费，强迫消费者为这些不合时宜的政府项目捧场，强迫消费者陪着高端消费群体“享受舒适”和“节约时间”。不是所有时间资源的节约都是对资源的所有者有利的，你会去什么地方都乘坐出租车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主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什么样的运输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不应该通过领导们开会来决定，而应该由消费者通过“货币选票”来决定。通过投货币选票的方式进行选择，就不会出现超前与滞后的情况。能够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胜出的就是合理的。

在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消费者的时间还没有那么值钱，消费者还不愿意为速度和舒适度支付过高的经济代价，消费者有更为迫切的需求需要用有限的金钱来满足。人人都喜欢高档轿车，但大多数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卖掉住宅来买一辆高端奔驰轿车。这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在家庭内部进行资源配置和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资源配置的道理是一样的。

工程技术人员总是会强调高铁带来的快速、舒适，但这不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考虑权衡与选择，如何能够使建设高铁的这几万亿元得到最优的利用。速度和舒适是有代价的，你不会为了速度和舒适去哪里都坐飞机，除非是公家报销。如果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使自己掌握的工程技术能够有用武之地，就仅仅强调高铁的优势而对其所带来经济代价避而不谈，就很容易误导决策者。当决策者多为工程师出身时，就尤其危险。

技术人员也经常会告诉我们高铁的零排放，这也不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从经济系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高



铁列车本身没有排放，但高铁作为一种高耗能的运输方式，在巨大电力消耗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环境污染和炭排放。能源专家告诉我们，时速350千米的一个动车组，运行一小时就需要排放7.3吨二氧化碳。高铁是高速的，更是“高碳”的。

至于利用建设高铁来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提供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来拉动经济，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可以通过打破行政垄断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可以通过解除经济管制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可以通过在竞争性经济领域撤出固有企业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可以通过制度创新降低经济系统运行摩擦力的方式来拉动经济，为什么要使用扭曲市场机制、抑制市场力量的方式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呢？照这样一个方向走下去，我们最终恐怕要通过修筑“金字塔”来拉动经济、解决就业了。

在“大飞机”项目上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任重而道远

> 除非你准备把造大飞机当成一个政治项目，而不是商业项目，根本就不是为了赢利，或根本就不是为了出售，否则你就一定要考虑技术上的成功概率和商业上的成功概率。我们将来生产出来的大飞机很可能是个“联合国”牌的，发动机、机载设备和系统需要向世界一流公司购买，这些方面的成本大体要占到总成本的三分之二，研发方面也要开展全球合作。在全球化的今天，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地方，只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巨额投入不是仅仅便宜了我们的国际商业伙伴。失业者的民族自豪感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的，咕咕叫的肚子会提醒他们什么样的产业才是对这个国家最有利的，而不是仅仅对少数人有利。

作为第152家中央直属企业，被称为“大飞机公司”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2008年5月11日在上海挂牌。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90亿元，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国务院国资委代表的国家，出资60亿元，持股33%左右，上海市政府投资成立的国盛集团出资50亿元，占股26%；其余股东均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及宝钢、中铝、中化等大型国企。所谓“大型飞机”，是指起飞总重量超过一百吨的运输类飞机，也包括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完全开放的民用航空器市场中，通过政府投资设立国有企业进行大飞机研发和生产的方式，总是让人不太放心它的效率和前景，更不要说我们的创新体制和创新实力问题，毕竟我们曾经是个计划



经济国家，毕竟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国有企业，毕竟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毕竟我们的国有经济力量现在正在迅速地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

任何决心进入大飞机生产领域的投资人，都需要认真思考下列几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域，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要产品本身；是出于商业性的考虑，还是出于政治性的考虑。如果投资来自私人部门，无疑都是为了赚钱，它就会权衡在不同领域进行投资的回报率，然后进入中长期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领域。如果是政府投资，非商业的目标往往是决定性的，人民赋予了政府征税权，根本就不需要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的方式去自己赚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理由只有三种是正当的：市场在这个领域失灵了；市场虽然没有失灵，但市场的力量目前还太弱小，需要暂时请政府代为组织这些经济活动；市场是有效的，但出于政府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方面的原因，暂时不适合民营部门介入，如核武器的装配和军事基地的建设。许多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政府项目都是出于非经济目标设立起来的：政府官员想实现个人的理想与抱负；为了民族的自豪感；为了树立政府的形象；政府科学家想要大显身手，显示自己的才华和价值；公司的行政级别可以圆一下副部级的梦；掌握大项目、大资金可以满足自己的领导欲和虚荣心；等等。

不论投资者是否是为了赚钱，投资者都要评估自己的投资能否取得技术上的成功。技术上的成功指的不是大飞机能够飞上天，而是要有技术上的竞争力。技术方面的先进性是产品能够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和基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研发方面的投资是最具风险的投资，做出政治性的、哗众取宠式的豪言壮语当然不难，但那只能是政治性的表态，只是表示一下决心，不是科学的论证，科学的论证充其量也只能够给出一个成功的概率。制造大飞机不同于科学家为了职称而写论文、做项目，对于那些根本就没有打算实际应用的项目，鉴定专家可以不负责任地写什么“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的结论，鉴定完了就可以锁进档案柜了，没有什么人追

究。而大飞机是要参与市场竞争的，参与“商战”的，军用飞机更是如此，还要经受实战的检验，鉴定专家的结论写得再漂亮也没有什么用。

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在总体上说还是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的，大飞机的开发周期又很长，往往长达10～20年，开发出在20年后技术仍然世界领先的大飞机，风险是非常大的。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不计成本，如果从商业角度看，可否赢利就是最主要的决策原则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拥有世界一流制造业和研发部门的先进国家不愿意涉足大飞机制造这个领域的原因，风险太大，利润又不丰厚。

在技术上获得成功并不意味着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商业上也获得成功。在许多经济领域，生产活动集中在少数企业中，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其他企业不能生产出具有同样技术参数的产品，而是因为它们无法低成本地把这些产品生产出来，无法成功地将这些产品推销给消费者，这在某种意义上比赢得技术上的成功更为困难。美国的机械制造技术够先进吧，造钟表就竞争不过瑞士和日本。民用大飞机不是航天飞机，后者可以不考虑成本，不考虑销售，不考虑赢利，可以不惜代价。除非你准备把造大飞机当成一个政治项目，而不是商业项目，根本就不是为了赢利，或根本就不是为了出售，否则你就一定要考虑技术上的成功概率和商业上的成功概率。

即使我们最终能够赢得消费者，把自己生产出来的大飞机成功地卖给消费者，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率。与人们的想象相反，这个“看起来很美”的行业并不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宝地。作为一个法、英、德政府出资成立的政府项目，体现欧洲融合和团结的“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曾经经历了长达25年的亏损，直到1995年才实现赢利。在2007年，尽管空客公司签订了1 341架飞机的合同，超过了其竞争对手波音公司1 144架的全球订单总数，但却亏损了8.81亿欧元。

我们将来生产出来的大飞机很可能是个“联合国”牌的，发动机、机载设备和系统需要向世界一流公司购买，这些方面的成本大体要占到总成本的三分之二，研发方面也要开展全球合作，在全球化的今天这并没有什



么值得指责的地方，只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巨额投入不是仅仅便宜了我们的国际商业伙伴。

波音公司能够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将生产环节通过合同转包的方式转移出去，那是因为波音公司本身就具有世界最优秀的生产能力，只是自己亲自生产不划算才进行转移的，没有一流的生产能力就难以拥有一流的质量管理系统和管理能力。作为一个制造技术和研发能力都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驾驭比我们先进得多的国际资源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甚至如何提出技术要求都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不能说“来一个和波音公司定做的一模一样的发动机”，这涉及商业秘密。

也许发展民用航空工业能够带来许多在其他领域也能得到使用的技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必要采取政府投资风险大、回报率低的领域这种不合算的方式来推动技术的进步。只要是“能赚钱”的技术，市场是不失灵的，是会有人去投资的，政府只应该介入没有直接商业用途的基础研究领域。保护知识产权是政府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技术促进政策。

如果有人简单地认为，我国航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每年大量采购大飞机就是应该运用政府的力量大力发展大飞机项目的充足理由，把中国的航空服务业看做是未来中国航空工业的“自留地”的话，就忘记了关键的一点，在我国的航空服务业开放以后，我国的航空公司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企业了，就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了，就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了，而无法再像政府企业那样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了。航空公司首先是一个赢利性的企业，否则它就会失去市场竞争力，那样的话我们自己的航空公司就会在竞争中消失，或需要政府巨额的补贴才能够生存下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负担。

20 年后，我们的国内市场必将更加开放，市场经济必将更加成熟，政府的职能也许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转变，到那时政府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对国有航空公司的行政保护也许已经成为了过眼烟云，国有航空公司也许已经完成了民营化的历程，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大飞机也要和

波音飞机、空客飞机进行公平的竞争，而无法再要求中资公司根据民族主义的原则来下订单了，这也是需要我们今天充分考虑到的。

8 亿件衬衫才可以换一架飞机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数量上的差异并不代表吃亏，一辆宝马轿车同样可以换好多辆“凤凰牌”轻便自行车，一辆换一辆才公平吗？衬衣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不会低于飞机制造业，至少不会连续 25 年亏损。大飞机不是赤手空拳就能够造出来的，需要巨额的投资，飞机制造业也解决不了几个人的就业，没有饭吃的失业者的民族自豪感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的，咕咕叫的肚子会提醒他们，什么样的产业才是对这个国家最有利的，而不是仅仅对少数人有利。

也不要做“我们都能够把人送入太空，大型民用飞机不可能造不出来”的推理，航天项目不是商业项目，可以不计成本，不需要考虑规模生产，可以不考虑市场销售，把人送上天就是成功，而大型民用飞机能够“赢利”才是成功。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断言中国无法低成本地把大飞机生产出来，畅销世界，而是提醒决策者注意区分“能否造出大飞机、能否造出在技术上有竞争优势的大飞机、能否造出在成本上有竞争力的大飞机、能否成功地将这些在成本和技术上都有竞争优势的大飞机推销出去”这样几个问题。

以保护的名义垄断，以市场的名义掠夺！

一方面通过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措施，为垄断性的政府企业制造畸高的“垄断价格”和超额的“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又通过发放农资补贴的方式让全体纳税人和农民一起为这些特殊政府企业的垄断利润买单，还通过允许外国竞争对手投资入伙的方式让其分享我国垄断性政府企业的垄断利润。这种做法实在让人费解，还不如将农资补贴直接补贴给国有垄断公司，这样还可以减少因补贴给千家万户而产生的行政成本和腐败现象。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在农民的种粮成本中，化肥所占的成本超过了一半，化肥的价格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价格，反过来，农资产品的价格上涨也使农民难以从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中受益。

从2007年年底开始，我国化肥市场的价格开始飞涨，国家实行了农资补贴政策，以降低农民的农业生产成本，保护农民的种粮收益，2008年，国家每亩农田的农资综合直补比2007年增长了11元，达到每亩30元，但是单就购买化肥这一项，农民每亩就要因化肥涨价多投入30元，存在19元的一个缺口。

化肥的流通环节并没有从化肥的涨价中获得多少益处，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化肥从出厂到零售的综合经营差率最高不得超过7%。化肥的生产企业似乎也没有能够从化肥的涨价中获得什么特别的利润，化肥出厂价格的上涨主要源于化肥生产原料的价格上涨，而且伴随着生产原料上涨的还有原料的短缺，许多中小化肥生产企业都不得不因为原料问题暂时停

工，一些大型的化肥生产企业也不能保证满负荷生产。只能说化肥涨价的钱是被原料的生产商拿走了。

大家知道，许多用于生产化肥的原料我国还无法自给，如钾盐矿，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钾肥。而为了“保护”农业部门，“保护”农民的利益，使之不受“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私人部门的控制，国家一直对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而保护的结果却是，不唯利是图的国有垄断公司享受着超额的垄断利润。

长期以来政府只给“中化集团公司”一家政府企业颁发了钾肥的进口许可证，1998 年之后才增加了另外一家国有公司——中国农资集团公司。虽然后来为了引入所谓的竞争机制，政府又向其他 8 家政府企业发放了钾肥的进口许可证，但由于未知的原因，这 8 家企业主动停止了直接进口的业务，由中化公司和中农公司采取联合谈判的形式与加拿大和俄罗斯的国际钾肥生产商谈判。奇怪的是，作为两家政府企业，经营的又不是敏感物品，它们与加拿大、俄罗斯等国际钾肥主要供应商签署的合同内容竟然以“商业秘密”为由向它的所有者保密，我们无法知晓这些钾肥的中国港口到岸价格，真不知道这些政府企业在“商业秘密”的保护下是如何接受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中国储备棉总公司、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所经历的巨额亏损。

好在国际市场上钾肥的基础价格是公开的，远远低于中农公司和中化公司在国内市场的出售价格。例如，按照国际市场化肥行业的权威杂志《化肥周报》（英国）的报道，国际市场上 2008 年每吨钾肥的价格约为 1 800元人民币，与进口相关的其他成本约为 180 元，而国内市场上每吨钾肥的价格竟高达 4 000 元人民币。而我国钾肥的主要国际供应商——加拿大的 PCS 公司——竟然是持有中化集团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化化肥”20% 股份的大股东，PCS 的化肥销售高级副总裁目前是“中化化肥”的非执行董事。

显然，农民的经济利益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外衣下，以市场的名义被垄

断国有企业和国际企业攫取了。政府一方面以保护农民的名义发放农资补贴，另一方面却又通过严格的化肥进口许可证管理制度将这些补贴给农民的钱以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市场利润”和国际企业的“非正常市场利润”的方式收回，而且是加倍收回。农民从每亩田中获得的农资综合补贴的增加额为11元，而每亩田因化肥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成本却是30元，农民还要独立负担19元。农资进口企业的垄断性超额利润毫无疑问只能来源于农民的利益输送和政府的财政补贴。

政府一方面通过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措施为垄断性的政府企业制造畸高的“垄断价格”和超额的“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又通过发放农资补贴的方式让全体纳税人和农民一起为这些特殊政府企业的垄断利润买单，还通过允许外国竞争对手投资入伙的方式让其分享我国垄断性政府企业的垄断利润。政府的这种做法实在让人费解。政府还不如将农资补贴直接补贴给国有垄断公司，这样还可以减少因补贴给千家万户而产生的行政成本和腐败现象。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飞涨，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紧迫，而钾肥的国际价格也在上涨，中国的政府应该趁此良机，运用粮食安全的借口和市民、农民的不满情绪来制约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一举打掉这个垄断部门。化肥进口部门存在的不必要的行政垄断是罪恶的根源，政府应该立即解除行政保护，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密切监控民营企业之间的价格和产量协调行为，在此基础上再对农户进行直接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农户才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些补贴。

如果政府对这个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格斯拉”怪兽束手无策的话，那么与其让外国资本投资这个一本万利的行政垄断性政府企业，还不如让中国人自己的民营企业入股，古语云“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也算是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表现吧！

（本文作于2008年5月）

要求实名举报其实是官员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 国家安全机关对于举报间谍特务从来就不强调也不关心是不是实名举报，也不要求线索具体、可核查。因为国家安全部门时刻保持着警惕的态度，密切注视着破坏国家安全的各种蛛丝马迹，绝对不准备保护什么间谍特务。与间谍特务不同的是，贪污腐败的蔓延使问题官员成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二者的不同就体现在对匿名举报还是实名举报这种举报方式的关注与否上。

不知从何时起，纪检监察部门在对待举报问题上，在政策上是鼓励实名举报的，在具体操作上常常是只受理实名举报。例如，组织部门在进行干部的任前公示时，就通常要求“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要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要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这样的要求虽然没有明确说不受理匿名举报，但在具体操作上对匿名举报常常是置之不理的。这样的要求和做法在客观上设置了实名举报的高门槛。

在许多情况下，纪检监察部门不仅要求实名举报，还要求线索具体、可核查，仅仅提供“蛛丝马迹”是不行的。我们知道，搜集犯罪证据、搞清楚整个案件的犯罪事实，即使对于拥有执法权力的司法机关来说，常常也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对于进行举报的个人，其困难可想而知。

举报人为什么要匿名举报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一是因为举报人对自己所掌握的有限的线索没有能力去核实查证，因此希望纪检监察机关能

够去调查；二是因为举报人常常只能够观察到一些表面的现象，如豪宅和名车明显与合法收入不符，但又没有能力凭借个人的力量去调查取证，因此希望纪检监察机关能够介入调查；三是举报人担心遭到打击报复；四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但又担心被追究法律责任。从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实践来看，这是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

纪检监察机关应该欢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举报，而不必强调实名举报与匿名举报的区别。例如，国家安全机关对于举报间谍特务从来就不强调也不关心是不是实名举报，也不要求线索具体、可核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安全部门时刻保持着警惕的态度，密切注视着破坏国家安全的各种蛛丝马迹，绝对不准备保护什么间谍特务，这些人是国家与政权的敌人。与间谍特务不同的是，贪污腐败的蔓延使问题官员成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二者的不同就体现在对匿名举报还是实名举报这种举报方式的关注与否上。

对实名举报的鼓励，在操作上必然表现为对匿名举报的漠视，从而在客观上抑制了匿名举报，否则就不会刻意对二者进行区分，并鼓励其中的一种了。对实名举报的鼓励以及对匿名举报的消极态度，我认为是官员群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作为监督者，同时也作为人民群众监督的对象，这三重身份都使他们有强烈的动机限制匿名举报，对匿名举报置之不理。因为，如果在具体操作上只受理实名举报的话，就能够大大减少举报的数量，这在客观上保护了问题官员，降低了问题官员出事的风险系数，也大大减小了纪检监督部门的工作压力。

当然，实名举报在理论上具有许多优点，如纪检监察部门可以直接与举报人取得联系，进行调查取证，以尽快查清事实，从而少走弯路，降低办案成本；还有利于纪检监察部门向举报人及时反馈处理结果，便于对有功的举报人进行表彰和奖励；便于纪检部门对举报人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和制止针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行为的发生；有利于对诬告和陷害他人的行

为进行严肃处理，防止少数人利用人民来信捏造事实、陷害他人。

但这些都是实名举报在理论上的优点，这样的依据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客观事实；二是这只是刻意地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刻意地回避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实名举报给举报人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例如，现在我们还基本没有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证人和举报人保护制度，举报人在“身份暴露”以后，通常不仅得不到有力的保护，反而通常是处境艰难，丢失饭碗，乃至遭受牢狱之灾，甚至为此丢掉了性命。

还有的人担心，如果对于实名举报和匿名举报不予以区别，不抑制匿名举报和鼓励实名举报的话，会形成干部人人自危的局面。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正如法律和司法机关的存在不会造成人人自危一样，允许匿名举报也不会造成干部人人自危的局面。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况且纪检监察部门也不会不辨真伪、不明是非的。

轻责行贿，重责受贿，更有利于减少寻租行为

> 这样的法律安排会使受贿者面临着巨大的来自行贿者的道德风险，受贿者的安全完全依赖于行贿者的“道德”约束了。这样的法律安排将使受贿者觉得任何一次行贿看起来都像一次由行贿者精心设计的圈套，都面临着被行贿者敲诈的风险。

政府官员的腐败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官员腐败的形式很多，其中一种主要的形式就是进行权钱的交易，接受金钱的贿赂。围绕如何有效地减少官员的受贿行为，我们可以有许多非常有效的对策，如不断地扩大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范围，减少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转变政府的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和干预，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上来，加强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督和约束，缩小政府活动的范围。我们也可以不断加大对受贿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强执法的力度，强化舆论监督，发挥党内民主，使掌握权力的官员不敢轻举妄动。我们还可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有机会、有能力腐败的官员能够自我约束，不愿意腐败。但本文在这里想提出一个补充性的、能够有效减少受贿行为的立法思路，那就是在法律层面上对行贿和受贿实行区别对待，对行贿者轻责，对受贿者实行严刑重典。表面看来，这样的法律可能会鼓励行贿，但准确地说仅仅会增加行贿的动机，而不是行贿的行为。仅仅是坏的动机并不会对社会造成伤害，我们所要限制的是行贿、受贿的行为，实际上，这样的法律能够有效地减少受贿行为的发生，因为这样的法律安排会使受贿者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急剧

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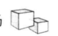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行贿、受贿者在行贿、受贿行为被发现以后所面临的法律后果极端化为无罪和枪毙，以此来代表轻罚和重责。这样，我们在应该如何对行贿者和受贿者进行法律处罚的问题上就面临着四种选择：行贿者与受贿者均无罪；行贿者枪毙，受贿者无罪；行贿者、受贿者均枪毙；行贿者无罪，受贿者枪毙。

如果行贿者和受贿者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均为零，其后果就会是官员腐败的公开化、制度化，权力价格的透明化、税收化，显然这是最坏的一个选项。

如果我们规定行贿者枪毙、受贿者无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就会将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全部商品化，全部通过“市场”来出售，并且在这个“市场”上拥有垄断性的地位，成为“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谈判者或接受者”，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提高计划出售的“公共服务”或“公共权力”的价格，以威胁告发来不断敲诈行贿者。而行贿者则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面临着被受贿者告发的巨大道德风险。这些风险的存在会使这个出售“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的市场急剧萎缩，从而使受贿者的收入急剧减少。这样，表面上对受贿者有利的游戏规则其实际后果却是使受贿者无贿可受。

如果行贿者与受贿者在被发现后均枪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会减少贿赂行为的发生，因为人们都是天然地厌恶风险的，只有那些“勇于”承担风险的人才能够获得“风险收益”，即贿赂和贿赂所购买到的好处。但在这种情况下，行贿者和受贿者所面临的“道德风险”最低，因为这样的法律规定在实际效果上起到了惩罚告密者的效果。除非是想自杀的人，否则，行贿、受贿的双方均有极大的激励去结成稳固的同盟，同舟共济，信守诺言，因为保护对方就是保护自己，爱别人就是爱自己。这样的法律最不利于对已发生的行贿、受贿行为进行惩罚。

如果法律规定行贿者无罪、受贿者枪毙，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呢？会产生政治思想教育想要达到但一直难以达到的效果，就是“拒腐蚀、永不沾”。只是这不是出于思想觉悟，而是出于规避风险、自我保护的需要。这样的法律安排会使受贿者面临着巨大的来自行贿者的道德风险，受贿者的安全完全依赖于行贿者的“道德”约束了。这样的法律安排将使受贿者觉得任何一次行贿看起来都像一次由行贿者精心设计的圈套，都面临着被行贿者敲诈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行贿者与受贿者不再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不再有“难”可以同当了，自然也就没有“福”可以同享了，受贿也就难以发生了。

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行贿、受贿均无罪，为所有社会的道德观念所不容，所以这样的法律规定不具有可行性，尽管在一些国家里权钱交易呈现出半公开的状态。

在法律上规定受贿者罪轻、行贿者罪重，重点打击行贿者，这样的法律很容易得到有能力受贿者的支持，很容易获得通过，因为在许多国家里，有权势的人往往有能力通过影响立法来保护自己。如在一些国家，受贿 1 000 万元可能仅获刑数年，而盗窃 100 万元就性命不保了，抢劫 100 万元就必死无疑了。行贿者被看做是引诱原本道德高尚的官员走向堕落的罪魁，而受贿者仅仅是疏于政治学习和自我约束或受到不健康外国思想的诱拐而已。在可行的法律安排中，这是最有利于受贿者的一种法律规定，或对于受贿者来说这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择。尽管这样的法律使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利益同盟关系受到损害，会使受贿者的“收入”下降，但对于受贿者来说“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赢利性”。

在法律上规定对行贿者和受贿者均处以重责的法律安排，表面上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但在事实上却起到了稳固“利益共同体”的实际效果，出了事谁都跑不了，受贿者反而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安全感，对受贿者来说这是“次优”的选择。

对行贿者轻责、对受贿者实行严刑重典的法律规定，对受贿者最为不利，对减少行贿、受贿发生的效果也最为显著，因为它会破坏行贿、受贿

者的利益同盟关系，会减少寻租活动的发生。就达成的交易而言，也会使受贿者以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出售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因为这样的法律安排会增加行贿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交易量的下降和交易价格的降低意味着腐败范围的缩小和腐败规模的减小。再说，对于官员来说，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也理应罪加一等。对受贿者最不利的法律安排就是对社会最有利的，所以，我们应该将上述这样一种思考融入我们的立法过程之中，使之成为我们的一种立法取向。

其实做衬衣比造飞机更有利可图

决策者要注意区分能否造出来大型的飞机、能否造出来在技术上有竞争优势的大飞机、能否造出来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的大飞机、能否成功地把这些具有技术和价格竞争优势的飞机推销出去这样几个问题。把这几个问题冷静、科学、严密地回答了，再做出决策。不要把这几个问题简化为单纯的在技术上"能与不能"的问题。

本文题目的意思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做衬衣更加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更加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比集中经济资源刻意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要更加有利可图，而不应望文生义地理解为主张永远生产衬衣，生产衬衣永远对我们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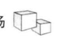
那些试图通过政府干预或舆论呼吁的途径去发展的产业之所以在经济竞争中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不具备竞争优势，刻意地去发展它们，不过意味着把经济资源从利用效率高的地方，运用行政的权利强行配置到利用效率低的领域，否则经济资源就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己流动到这些领域。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拿 8 亿件衬衣才能够换一架波音飞机太不划算了，我们不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而应该发展飞机制造业这样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8 亿件衬衣才能够换一架波音飞机是事实，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部分，或只是事实的表面。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生产飞机要耗费大量的资本，要支付风险极大的研发投入，需要极强的研发能力和极强的配

套能力，飞机不是缝纫机这样简单的设备就能够生产出来的，飞机也不是像自行车一样质量差一点也能够销售出去，也能够行驶，不致酿成大祸。

其实，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不但要占用大量的资本，而且提供不了多少就业岗位，资本的投入产出比也较低，适合于劳动力昂贵的国家。这些产业由于使用的劳动力较少，所以，凡是以人为单位计算的指标都比较占先，如人均产值、人均利润量。由于生产这些产品所使用和耗费的资本较多，所以，以产品为单位计算的经济指标都比较漂亮，例如单位产品的市场价格、单位产品的利润量，这是最迷惑人的地方。但如果我们计算资本的投入产出比的话，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的优势往往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所占用的资本较少，投入产出比高就意味着可以更快地积累起资本，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更多地使用机器制造产品，更多地生产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城市化和就业的压力较大，不去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快速积累资本，进行全面的产业升级，想在个别的点上搞突击、搞突破，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现在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再用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害而无益。

如果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这样的思想不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是一个经济竞争的结果，除了极个别的产品，如农产品和少数夕阳产业，政府会在对外贸易领域采取一些临时性、过渡性的、保护性的措施以外，政府总体上是一个中立的规则制定者，不会刻意地支持或限制某个产业的发展。即使西方国家的政府接受了某种主张政府进行产业结构干预的观点，西方国家的政府也缺乏进行干预的政策手段，它们的法律系统保证了自由决策、分散决策、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经济资源多数是控制在企业家手中的，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政府的资源主要用来支付社会保障和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在竞争性领域基本不进行直接的干预，也根本缺乏直接干预的手段。而在我们的国家就不同了，政府在竞争性领域还拥有大量的国



有企业，政府还控制着金融系统，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机会，还在实行着范围和强度都非常大的管制措施，尤其是针对民营经济部门的，行政性垄断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观点就有可能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现在有人主张运用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手段搞“大飞机”，与波音、空客竞争，气魄有，但认识比较粗糙、简单。这些人拿谁的钱表决心、玩豪言壮语呢？反正肯定不是他们自己的钱。

我们不仅要考虑能不能造出来大飞机的问题，还要考虑我们能否造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飞机，能否低成本地造出大飞机。后一个问题更重要，做起来更难，世界上在技术的层次上有能力造干线客机的国家不少，但能够拥有商业竞争优势的只有波音和空客两家公司。

民用飞机不是航天飞机，后者可以不考虑成本，不考虑销售，不考虑赢利，可以不惜代价。除非你准备把造大飞机当成一个政治项目，而不是商业项目，根本就不是为了赢利，或根本就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扬我国威，是为了给洋鬼子证明一下我们的聪明才智，样机造出来就算成功了。

如果有人简单地认为我国航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每年采购的大量飞机就是发展中国大型民用航空器制造业的充足理由，把中国的航空服务业看做是未来中国航空制造业的自留地的话，就忘记了一个问题，在我国的航空服务业开放以后，我国的航空服务业就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了，而不能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了。航空服务企业首先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赢利性企业和市场竞争者，不按纯粹的商业原则经营，就会失去竞争力，我们自己的航空服务企业就会在竞争中消失，或需要政府巨额的补贴才能够生存下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断言中国不能低成本地把飞机生产出来，畅销世界，而是提醒决策者注意区分能否造出来大型的飞机、能否造出来在技术有竞争优势的大飞机、能否造出来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的大飞机这三

个问题。把这三个问题冷静、科学、严密地回答了，再做出决策。不要把这三个问题简化为在技术上“能与不能”的问题，也不要做“我们能够把人送入太空”、大型民用飞机不可能造不出来的推理。航天项目不是商业项目，可以不计成本，不需要考虑规模生产，不考虑市场销售，把人送上天就是成功。而大型民用飞机能够赢利才是成功。美国的航天技术很发达，但造钟表就竞争不过瑞士和日本。决策者应该在严肃、中立、科学地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以后，再做出决策。

印度自行研制“光辉”战斗机的过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1983 年，印度为了替代当时印度空军的主力机型“米格21”，制定了“轻型战斗机”研制计划，自行研制“光辉”战斗机。至2012 年 3 月，“光辉”战斗机已经完成了 500 次试飞，但仍然没有进入投产阶段，无休止的试飞仍在继续。虽然许多技术难题被逐渐克服，但印度自行研制的“卡韦里”发动机仍然为一些技术问题所困扰。不断出现的缺陷让这款“落后”战斗机的研发费用直线上升，即使这款战斗机能够最终投入生产，呈现在人们目前的也是一款落后而昂贵的飞机。这款轻型战斗机的性能类似于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和美国的“F－16”战斗机，但“鹰狮”战斗机已经服役 10 年了，它的改进型也已经投入生产了。“F－16”战斗机也已经服役 30 年之久了，并且已经有了许多改进机型。与国外空军飞行了许多年的类似类型战斗机相比，“光辉”战斗机没有任何新颖之处或重要之处，这意味着印度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自主研制出来的战斗机还未生产出来就已经过时了，而且已经过时了几十年。

虽然印度希望能够通过出口一些“光辉”战斗机以弥补一部分研发费用，然而，人们对它能否寻找到客户没有信心，原因很简单，“光辉”战斗机与它的竞争对手“鹰狮”战斗机和“F－16”战斗机相比毫无竞争力，全世界“F－16”战斗机的数量已经不下数千架，尽管美国已经开始装备新型的“F－35”战斗机，但“F－16”战斗机仍然能够满足出口的需求。对于那些因为政治的原因不能购买到美国和瑞典的战斗机的国家，

他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购买到俄罗斯的“米格－29”和“苏－30”战斗机，有了这些选择，客户有什么理由选择印度昂贵的落后飞机呢？所以说，对于“光辉”战斗机来说，出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不但出口的可能性不存在，装备本国空军的可能性也非常微弱。印度空军已经购买了一些“米格－29”和“苏－30”战斗机，印度空军还将购买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和“阵风”战斗机，美国也准备向印度出售“F－16”和“F/A18”战斗机，可以预见这类采购活动会越来越多，印度空军是不会装备缺乏战斗力的飞机的，尽管是“自主研发”的。

学者们普遍认为印度政府应该收起它的自尊，在浪费更多的资源以前取消这一计划，这类研究计划只是能够提高印度航空业的研发水平，而无法把这种进步转化为产品的竞争优势，因为印度只是在与自己进行纵向比较时才能够发现这种进步，印度仅是超过了自己的过去而已，并未缩短与先进国家的距离，更谈不上超越，这种“超越”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有政治宣传上的意义，而且这类“进步”越多，印度就会越落后，印度应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展开自主的开发。在研发领域国际间的合作越来越频繁的时代里，印度人也许应该重新思考“自主”的确切含义和真实意义，不要不加思考地让一种传统的思想引导自己的决策。

让违法者倾家荡产，不如让不称职的市场监管者下岗失业

“让什么什么倾家荡产”的表态会让人产生强烈的错觉，似乎司法部门不是以法律为唯一的准绳，而是依据行政首长的态度来决定执法的力度，来作出司法裁决。这样的豪言壮语让人感觉到的更多的是“人治”的味道，而不是“法治”的精神。

在南方某市市政府为加强食品安全质量监管的会议上，该市的负责同志言辞激烈地表达了市政府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心，称近期要抓几个违反食品安全方面法律的典型，要加大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要让违法者倾家荡产，提高其违法的成本。地方政府有这样的决心当然是一件很令人振奋的事情，但在欣喜之余，也产生出些许隐忧。

近年来，这样的表态在官场中是颇为流行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要让什么什么倾家荡产”这样的豪言壮语，但这样的话让人感觉到的更多的是“人治”的味道，而不是“法治”的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法制经济，在法制社会中，违法者应该得到的是公正的惩罚。何谓公正的惩罚？就是依照法律，得到不多也不少的惩罚。“让什么什么倾家荡产”的表态会让人产生强烈的错觉，似乎司法部门不是以法律为唯一的准绳，而是依据行政首长的态度来决定执法的力度，做出司法裁决。同时，这是不是也说明司法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效率低下呢？否则何来集中严打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改善司法部门、执法部门的工作效率呢？如果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条款没有与时俱进，处罚标准过低，脱离了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那么在立法部门修改相应法

律条款以前，倘若我们依法行事的话，又如何能够让违法者在不会倾家荡产的情况下使其倾家荡产呢？如果是国有企业违反了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我们准备让谁倾家荡产呢，市政府、省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难道打击的对象仅限于私营经济部门吗？

其实，提高违法的成本不是靠抓典型、杀鸡吓猴这样的传统思路，而是要靠严格的执法，真正将墙上的标语付诸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制度创新，用制度而不是领导人的劝说与威胁来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岂能权衡取舍？运动式的市场秩序整顿行动只可能在短期内、在表面上见效，只会让违法活动在短期内收敛一些，或变得更加隐蔽。一旦风声过后，又会故态重现。

所以，今天国人之所以对食品安全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主要的责任不在生产者，而在于监管者。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企业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而在相同的法律环境下，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的行为方式又是高度一致的。所以，现在我们在食品安全方面面临的问题，完全不是企业经营者黑心的问题，而是政府缺乏对市场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问题。相关管理部门不应将自己能力的不足归咎于企业经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经营者的黑心。我们不能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寄托于企业经营者的自我道德约束上，寄托于他们的觉悟上，法律的存在就说明，绝大多数人在没有法律制约的条件下是一定会做坏事的。所以，企业经营者有“贼心”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要不将坏的动机付诸实践就不会对社会造成实际的损害，就不违法。

在逻辑上，民众是这些市场监管部门的雇主，地方政府负责人也是人民的雇员，为人民服务，让雇主满意、让雇主们能够吃上放心的食品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让他们“下岗失业”。所以，我们的地方领导人应该有勇气承担起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有勇气正视他们在市场监管方面的不足。地方领导人应该以党中央和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将“要让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市场监管者下岗失业”的豪言壮语勇敢地讲出来。

让“代言名人”承担“连带责任”可能会误导社会的思考方向

> 许多消费者认为，名人没有亲自使用过代言的产品就出演广告，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难道我们宁愿意相信名人的个人经历，都不愿意相信监管部门的科学检测报告吗？难道代言农药就要种上二亩地实验几年吗？退一步说，即使名人多疑到连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文件都不信任的程度，名人也没能力检验代言食品是否合乎官方颁布的各类标准、是否包含了虽然不在官方检测范围但却可能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所以，名人是无义务、无责任、无权力、无资质、无能力、无实力在市场监管部门之外再进行一次自行监测的。

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食品安全法》中，增加了“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条款。在食品安全倍受关注的今天，我们却很难为这样的条款感到高兴。这样的条款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意义，也不具可操作性，还可能误导社会的思考方向。

名人是绝对不会代言不具备相关合格证书的产品的，只要市场监管部门做出明确规定，名人也不会以患者、使用者、消费者、专业人士的身份或形象出演广告，因为这些广告是要“广而告之”的，而名人的“名”又是非常昂贵的一种生产性资产。不论广告费开出多少，都远远低于这种资

产的价值，就像房屋的租金再高也不会高过房屋的市场价值一样。名人代言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其唯一可能是受到了商业欺诈，广告主拿着伪造的各类政府批准文件和名人签了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名人作为那些“合格”的有害食品的受害者不但不应该受到谴责，还应该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法律的保护。名人由于自己的公众形象受损而蒙受的潜在商业损失是巨大的，因为名人形象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无形资产。

名人现在饱受谴责都是因为代言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在事实上又是不合格的。有能力找名人做广告、有能力到媒体打广告的企业，从来没有见过是连相关生产、销售手续都凑不齐全的企业。这些企业即使做出广告来也没有钱上媒体，即使有钱也找不到媒体给它播出，媒体还要严格审查的，除非偷偷贴到电线杆子上。

越有名的名人代言的越是驰名的品牌，甚至是被市场监管部门免检的商品，如“三鹿”这样的“国优部优”产品，头顶200余项官方颁发的桂冠。明星如果连这样的产品都不能代言，还能代言什么呢？如果我们连官方机构都不能信赖，我们的消费者还能信赖谁呢？还能消费什么呢？有专家讨论，法律条文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指的是形式上的不符合还是实质上的不符合？真是天真得可爱，当然是形式上的，除了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谁还能有“资质”对其颁发合格证书呢？代言政府许可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岂能有罪？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又没有在拥有官方合格文件的产品中明确区分“真合格”和“假合格”，名人怎么可能知道应该代言哪一类“合格”产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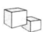
许多消费者认为，名人没有亲自使用过代言的产品就出演广告，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难道我们宁愿意相信名人的个人经历都不愿意相信监管部门的科学检测报告吗？难道代言农药就要种上二亩地实验几年吗？退一步说，即使名人多疑到连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文件都不信任的程度，名人有能力检验食品是否合乎官方颁布的各类标准、这些产品是否包含了虽然不在官方检测范围但却可能对人体有害的成分吗？即使是化学家也没有这

个能力，即使是李嘉诚也没有代言一种产品就建一座设备齐全的实验室的实力。所以，名人是无义务、无责任、无权力、无资质、无能力、无实力在市场监管部门之外再进行一次自行监测的。

单就产品的广告而言，名人在其中也是扮演了最无足轻重的角色。从广告的策划、制作到播出，在广告发布者、广告代理公司、广告主、广告制作方、经纪公司、代言的名人和消费者这些利益相关者之中，如果消费者因为虚假广告受到了侵害，第一责任者应该是媒体，媒体必定没有尽到广告审查的法律义务和职责。作为官方喉舌，播放虚假广告，更是罪加一等。没有媒体这个平台，名人的号召力根本就无从发挥，再有“感染力”的广告也难以误导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根本就见不到这些广告。广告代理公司和广告制作方也有广告审查的责任和义务，不是什么样的广告都可以制作和代理发布的。《广告法》第 37 条没有将代言人列为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法律漏洞，在广告产品中，名人扮演的角色在本质上和一棵古树、一座名山、一个精美道具的作用一样。卡通人代言的有害产品依然是有害的，是有害产品本身而不是明星漂亮的脸蛋或名人的“贪婪”在损害消费者。当然，名人也应该珍爱自己的名声和形象，应该自律。但这不重要，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果连法律都靠不住的话，名人的“自律”充其量就是根救不了命的“稻草”。

现在我们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了，不再依靠名人的自律了，要名人为其代言的产品承担“连带责任”了。那么，在车间里做这些“合格”的不合格产品的、知情不报的工人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呢？当我们面对食品安全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清楚谁才应该真正为消费者的消费安全负责。如果市场监管部门和媒体能够负起所担负的法律责任，名人就失去了犯错误的机会了。否则，即使禁止名人出演广告，又能怎么样呢？

是谁让那些不安全的食品“手续齐全”的呢？是谁让不安全的食品成为免检产品的呢？是谁让那些虚假广告在官方媒体上日夜播出的呢？是谁颁发给那些不安全食品各种荣誉奖牌的呢？是谁让送检代替抽检的呢？为

什么许多过时、落后、简陋的质量卫生标准得不到及时的修订呢？为什么许多法律法规得不到执行呢？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呢？降级、记过、撤职就是渎职者承担责任的恰当方式吗？社会的思考方向应该是这里。

这样的法律规定，在我看来有转移公众注意力、推卸责任、为食品安全问题寻找替罪羔羊的重大嫌疑，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太多实质性的意义。充当民众的“出气筒”算是名人的一种社会责任吗？我实在难以为名人的“连带责任”而欢欣鼓舞。

企业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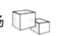
>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国内企业现在谈的企业社会责任，其实是企业的法律责任。企业要先承担起法律责任，再谈社会责任，不能将二者混在一起。如果一个企业连法律责任都不去承担的话，大谈社会责任就不会是一个认真的态度。

现在，不论是政界、学术界还是商界的领袖人物，都特别喜欢谈论"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将说服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看成是解决目前我国社会、环境、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的灵丹妙药，如环境污染问题、资源问题、产品质量问题、贫困问题、教育问题、社会和谐问题等。

虽然这个话题许多人都在谈，但"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什么是重要的？人们为什么热衷于谈论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协调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利润最大化目标呢？企业家应该仅仅是对股东负责，还是要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如股东、员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又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含义。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为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加工服装的海外血汗工厂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强大的工作强度被西方媒体曝光以后，引起了西方公众的极大震惊，西



方社会强烈谴责跨国公司只关注利润，而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商业伙伴对人权、法律和国际公约的践踏，跨国公司面临着来自消费者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为了改善公司的形象，Levi－Strauss 公司制定了全球第一份“公司社会责任守则”，将国际贸易和劳工问题联系起来，要求与其合作的公司必须满足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守则”才能得到订单，以此来约束商业伙伴的行为。随后，耐克、阿迪达斯、沃尔玛、通用电器、迪士尼等跨国公司也纷纷效仿，制定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在国际上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

由于这些企业层次的社会责任守则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对于每个企业来说，都不得不分别应对许多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准则”，不得不重复接受不同客户的社会责任审核，而且西方公众对这种公司层次的内部监督体制的透明度不够满意。这样，1997 年，美国成立了 CEPAA（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Accreditation Agency，经济优先权认可委员会，2001 年更名为“社会责任国际”）这个非政府组织，设计了“社会责任 8000”（SA 8000）国际标准和认证体系。这是个类似于 ISO 9000，通用于全球的社会责任标准，属于自愿性的标准，同时还建立了一套第三方认证机制，以期提高社会责任审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避免重复审核的资源浪费。

这个社会责任标准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涉及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反歧视、工作时间、最低工资等内容。这个标准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企业。

所以，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在其生产供应链上推行，旨在改善其商业伙伴的工人的工作条件，保障其生产安全、职业健康和合法权益，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通过有道德的采购活动和投资活动来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条件。

西方跨国公司承担起“社会责任”，就意味着大公司不再单纯地在本

国法律的范围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要在本国法律和国际公约的约束下，主动承担起要求别国商业伙伴遵守该国法律和国际公约的责任，承担起对供应商工人的安全和健康进行保护的责任，承担起对供应商所在国的环境进行保护的责任。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开展，公众要求跨国公司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内涵在不断增加，不再仅限于劳工问题，还要求跨国公司主动承担起对社会、环境、气候变化、民主、人权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中国的企业家也喜欢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企业家真的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或企业家真的准备出于承担社会责任而采取行动，或企业家真的认为企业能够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资源、环境、气候、社会问题，而常常是因为听众喜欢听企业社会责任。在舆论的压力或期待下，企业家可能会说一些他自己也未必真正认同并准备诚恳实践的话，煽情的成分往往多一些。

企业家谈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形象的塑造与提升，谈社会责任、捐款与真正承担社会责任是两回事，如果仅仅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就能够博得阵阵掌声，捐一些款就能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众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很难准确地区分一家企业捐款建希望小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在多大程度是为了商业宣传的目的。有多少企业选择匿名捐赠呢？

政府官员也喜欢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他们是希望通过号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来解决那些令政府头疼的问题，如社会、经济、环境、资源、气候方面的问题，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但许多看似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原本就是中国的法律要求企业必须做到而它们没有做到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遵守本国的法律。对中国的企业来说，只要满足了中国法律的要求，就一定满足了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准则的要求，也满足了中国公众对企业承担所谓社会责任的大部分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强化企业自觉遵守本

国法律的意识。

国内企业现在谈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是企业的法律责任。企业违反了《劳动法》、《生产安全法》、《环境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而得不到及时的惩罚，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司法效率的问题，如果不去完善我们的司法体系，致力于建立一个高效、透明、公正的司法体系，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提升企业家的道德水准，用说教的方式来解决因法律得不到有力的执行而带来的问题，这肯定是行不通的。其实，我们从计划经济年代就没有停止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人民服务”是我们最熟悉的标语。所以，不是企业家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意识，也不是我们对社会责任强调得不够，而是企业家受到的正面激励不够强，负面激励太强了，因为通过污染环境和强迫劳动可以赚钱，还能逃脱惩罚，而遵纪守法则可能会使自己在竞争中陷于不利的境地。

一个社会可以提倡高尚的道德，但一个社会不能将希望寄托于高尚的道德上，而要依靠制度的设计、改良与创新，依靠制度激励，依靠法制系统的有效运转，依法治国。企业要先承担起法律责任，再谈社会责任，不能将二者混在一起。

许多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其实不是这样的。企业在经营上的目标应该是单一的、唯一的，即利润的最大化，但这个利润最大化目标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企业要在法律的约束下展开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活动，就是所谓的要“守法经营”。例如，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企业通过走私活动、污染环境或使用童工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件产品常常是由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完成的，跨国公司采购的许多产品或零部件可能是由供货商在违反当地法律或国际公约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如在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中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是无法改变别国的法律标准和司法环境

的。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就自行制定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准则，以此来平息消费者的愤怒情绪，重塑自己的企业形象，通过“订单”这个武器来促使别国的商业伙伴改善劳工的工作环境，进行“有道德的贸易”。

所以，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说，不片面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实意味着公司应该在遵守本国法律、国际公约或更高标准的企业自身制定的社会责任准则的前提下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仅仅遵守本国的法律。但这会使那些承担额外责任的跨国公司失去一部分利润，如为了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而独自采取节能技术，尽管这种新技术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再如为了保护欠发达国家的环境或劳工权益而放弃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低成本订单。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企业经营的目标同样是单一的，也是利润最大化，但这个目标仍然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经营活动要受本国法律的约束。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开展企业的经营活动，然后再运用所获得的利润承担起额外的社会责任，如进行各种慈善活动等。如果一个企业连法律责任都不去承担，而大谈社会责任，就不会是一个认真的态度。

教育与文化



关于文化侵略

即使历史上曾经有学者提出过“全盘西化”的主张，全盘西化在实际行动的层面上，也不过是落后国家在制度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一种全方位学习和模仿的态度，而不可简单地从字面上去理解并声讨，好像吃饭也不打算用筷子了。

“文化侵略”似乎是一种很流行的担忧，总是能听到有人忧心忡忡地提醒国人警惕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但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算做是“文化侵略”呢？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确定清晰的标准。但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模糊的标准，看着大家举着爆米花兴高采烈地看外国电影，轻松愉快地议论邻国的电视剧，在洋快餐店里举办生日聚会，我们似乎很难把洋影片、洋快餐、洋节、洋词汇在中华大地上的流行草率地认定为遭受到了远亲近邻的文化侵略。

在国人享受以圣诞节的名义进行的各种娱乐活动的同时，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对春节的好感和兴趣也与日俱增。在美国，总统每年都要在中国的农历春节向全美华人表示节日的祝福，美国的纽约州甚至把春节那一天定为全州的法定节日。不仅中国的春节越来越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接纳，中国的汉语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了数百家孔子学院。中华饮食征服了“全世界的胃”这一事实更不必说。显然，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其他国家的人们把这些变化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正在受到来自中华文化侵略的证据。如果我们自己把洋节、洋词、西餐在中国的日渐流行

惊呼为受到了文化侵略，岂不是奉行了双重标准？

在看到西式快餐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西式快餐本身也在根据中国国情发生着变化，努力进行本土化的改变，努力打造中国企业的形象。例如，为了吸引中国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中国市场份额，麦当劳不断挖掘和满足中国人的文化情感需求，实现本土化策略。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麦当劳被中国消费者接纳与麦当劳的中国化其实是同步进行的。

即使在西方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影视产品领域，进口影片在影响中国影视文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中华文化的痕迹。例如，由美国梦工厂动画室历时两年半制作出的3D动画片《功夫熊猫》在全球市场的巨大成功，难道不是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共同的成功？

因此，对于这些不同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不要太过紧张，过分紧张其实是弱国心态的一种表现。文化的吐故纳新和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式。若我们无法摆脱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和弱国心态的控制，自困于"文化侵略论"的藩篱，反而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其实，在中华文化五千年乃至更长的发展历程中，封闭的时间远远比开放的时间短，所以中华文化才能够一直发展至今，虽历经坎坷但始终能够延绵不绝。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原黄河文化海纳百川的产物，没有各少数民族文化与域外文化的滋养，怎么能成就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呢？

再说，每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内核，随着跨文化交流活动的进行，不断融入外来文化的一些元素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具体形式，但要设想一个民族完全移植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心理，则是难以想象的。姑且不说没有哪个民族会有这样的要求，即使一个民族想完全西化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实际的行动层面上，全盘西化只能代表落后国家在制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一种全方位的学习和模仿，而不可简单地从字面上去理解与声讨。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了

全盘西化的策略，但在全盘西化了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却常常感慨于日本文化能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那么好的保护与传承。其实，先进的文化，真正有竞争力的文化，有内生发展能力的文化，能够不断从异质文化中主动汲取营养的文化，是不用害怕什么文化侵略的。这种文化必然是充满自信的，必然是从强大走向更加强大的。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还有很大的差距。面对差距，紧张、警惕、防范都是自然的本能反应，这样的反应虽然很好理解，但绝非正确的理性选择。真正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强大自我，而非通过阻滞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来进行自我保护。如何强大自我？恐怕还是要从我们目前的制度入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恐怕世界上没有人敢否定中华民族的文化生产力和中华文化的内生发展能力。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中华文化的内生发展能力，不过是受到了现在这种不尽合理乃至落伍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制约无法发挥出来而已。体制改革，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徐莎莎为本文的写作搜集了资料，特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我们的社会为何缺乏真正的知识分子?

> 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行政垄断横行、经济管制泛滥、政府官员腐败、社会管理能力低下等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吴敬琏所指出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国正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本该是中国知识分子大展身手、齐声呐喊的时代，人们听到的发出独立声音的学者却寥寥无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正当这个社会的发展进入至为关键的时期，知识精英阶层却拿不出长远发展的基本国策，在事关社会公平的重大问题上也没有声音；技术官僚层并不考虑也没有能力考虑这一类的宏观问题。”在人们期望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的时候，知识分子们却保持了可悲的沉默。雷海宗先生不无讽刺地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质疑，这些一言不发的“知识分子”是否称得上是“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上所说的知识分子主张以“道”自任，是“士志于道”的躬行者，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正如宋朝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代以来，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一直被视为是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勇于承担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能够超越现实追求理想、关注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苦难的人。定义知识分子的依据不在于职业，而在于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所维

护的价值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刘易斯·科塞提出，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鲍曼也提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以此来衡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语就变得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当下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首先，这种现象根源于职业化和专业化分工。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于是出现了学者职业化的现象。学者被当做一类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和其他职业相较，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他们的脑力劳动关注更多的也是提供服务、创造经济价值，而不是推进思想进步，这使得知识分子逐步丧失其生命力。知识分子应该以旁观者的角色观察世界、以实践者的角色体验世界，从而发展其思想。一旦知识分子湮没到这种社会分工中，就被固定在了某一特定环节，看到的只是局部，任何整体都消失了，只能孤立地理解社会现象，孤立地对待各种事实，孤立地研究各门学科。这就导致许多所谓的专业人士和专家，用越来越不被社会大众理解的技术化和专业化的术语，献身于狭窄的专业领域。他们的见解往往局限于他们的专业，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拥有专业知识，但常常缺乏文化，难以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更广泛的公共话语。

此外，职业精神所提倡的价值和行为方式与知识分子所应崇尚和遵循的价值和行为方式并不一致。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不会考虑权贵的感受，更不会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知识分子的工作一旦职业化，就会失去独立性，由于各方面的顾虑而丧失探讨重大社会问题的潜力，因此，也难以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其次，这种现象根源于文化工具主义风气的影响。真正尊重知识的时代，知识分子是因知识本身而受重视，而不是因为他对社会有用才受重视。知识分子追求的真理，可能是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毫无联系，甚至看起来是杞人忧天的一些东西。知识分子需要生产的不是迎合顾客口味的文化快餐，而应该有更高远的价值追求。但近年来，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渗透

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化工具主义风气开始蔓延。在知识分子层面就表现为，一些知识分子仅仅把知识和文化看做谋权、谋利的手段。他们或出卖自己的意志自由以换取舒适的生活，或放弃维护社会的良知而为利益集团代言，或丢弃理想和道德追逐荣华富贵。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独立感让位给了要求获得机构的肯定和承认。作为专业人士和专家，他们的权威不是建立在其思想品质之上，而是建立在号称具备专业知识的各种头衔和名目之上。评价知识的客观标准也逐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实用性成为知识和文化的仲裁标准。为了具备实用性，为了得到更多公众的接受和认可，知识和文化不得不一再放低身段，去努力迎合最低标准的公众思维能力，甚至不惜将意义深远的内容肤浅化、世俗化、娱乐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知识分子地位和权威的下降。

最后，这种现象根源于体制的束缚。托洛茨基在 1937 年就曾尖锐地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当权力在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可以决定知识分子生存和命运的时候，权力自然就会对知识分子形成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知识分子就会在压力下或作妥协状沉默不语，或作屈服状顺着权力说话。当思想和文化只有通过官方认可和审查才能进入公众视野时，它往往包含着一个潜在可能，即迫使思想和文化进入屈从奉承官方意识形态的状态，这样的思想和文化从本质上讲已无独立与自由可言。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需要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不只是注意自己的脚下。"中国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那些独立于利益之外、为国家与生民呐喊的人，需要那些对国家、民族、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关注的人。那么，如何破除阻碍真正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各方面障碍，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此文为作者和徐莎莎共同写作。）

透视中国高校的债务危机

既然是公立高校，政府就应该承担起财政支持的责任。

2007 年，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完成的《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指出，随着高校收费制度的实施和扩招，银行贷款成为继政府拨款、学杂费收入之后，我国高等院校获得经费的第三个主要渠道，央属 76 所高校的贷款总额在 2005 年年底已经达到 336 亿元。而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 年：中国社会形势与预测》，2005 年我国公立高校的银行贷款总额已达 1 500 亿～2 000 亿元。在稳定招生规模与收费标准、明确高校经济责任、加强银行对高校贷款的风险管理的政府政策转向的背景下，我国公立高校的债务危机在短期内凸显出来。人们不禁要问，中国高校是怎么背负上这沉重的债务负担的呢？

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没有随着高校规模的迅速膨胀而同步提高，要马儿快跑，又不给马儿吃足够的草。对于公立高校这样一种非经营性、非营利性质的机构，各级政府似乎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似乎想让他们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过渡，似乎想让它们“不靠政府靠市场”。从 1999 年开始，我国高校进入了一个迅速膨胀的时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校园改造和建设的步伐空前加快，而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并没有对这种爆发式的“教育大跃进”提供财政上的充足保障，各级政府依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来办教育，相对减少财政拨款。一方面提高高校的学费标准，另一方面鼓励国有银行对高等院校发放贷款，鼓励高校兴办企业自行创收，试图更多地依靠高校自身和

市场来发展教育事业。中央政府就多次表态，“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部也明确要求各高校要利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改造和建设的力度。

地方政府在推动高校负债融资中更是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地方政府积极鼓励开发高教园区、大学城项目，这类项目既可推动城市的经济、社会、科技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扩大预算外收入的规模，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策略还使地方政府并不用为此承受太大的财政压力，有些地方政府对高校的银行贷款所实行的财政贴息政策也极大地鼓励了高校不计后果地扩大贷款规模。所以，虽然在形式上这些大学城项目所需的投资有多种筹集渠道，但无论哪种投资方式，其最终的资金来源大多数都是来自银行贷款。国家审计署 2004 年对杭州、南京、珠海、廊坊 4 个城市“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调查表明，虽然银行贷款只占建设计划投资的 1/3，但实际取得的银行贷款占到了实际筹集到的建设资金的 59.42%。

对于银行来说，因为是国有银行，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所以，不是单纯地按照商业原则开展业务、发放贷款，而是按照各级政府的产业指导政策和文件来发放贷款。既然政府鼓励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银行也就可以不计后果地向高校发放巨额的贷款，因为由于执行政府的政策而产生的呆账、坏账，是可以被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原谅的，最终是容易被定期集中处理的，而那些按照商业原则发放的贷款则要承担很大的经营压力，费力不讨好，赢利则罢，一旦变成呆账、坏账，在剥离起来或在寻求政府帮助时就远远不如因为执行国家的政策而产生的呆账、坏账那么理直气壮。如果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前进行正常的、真正意义上的可行性分析，许多贷款就不可能发放出去，就不会产生吉林大学这样的“超级杨白劳”。吉林大学现在每年仅需要支付的利息就高达 1.5 亿～1.7 亿元。

公立学校原本就不是商业机构，公立高校原本就是非营利性的机构，

在世界各国均是如此，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高校背负的巨额债务拿什么来偿还呢？这说明国有银行在贷款前连最基本的风险评估都没有认真做，尽管在形式上该做的分析报告一个都不会少。所以，不是银行的风险控制制度缺失，该有的制度在形式上一个都不缺，但这些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吗？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原本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当政府要求银行配合政府的各类政策时，政府在事实上就是在要求这些银行放弃纯粹的商业经营原则。

对于高校来说，正常的财政拨款和学杂费收入只能勉强维持高校的正常办学开支，想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接受的捐款和自办企业的收入难以在短期内显著增加的情况下，贷款办学似乎自然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我们说因为银行是国有的，只要符合国家政策，即使明摆着注定要成为坏账，银行也不会过分担心，就像它们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时的心理一样，政府会统一处理的。高校决策者们的心理大体也一样，学校是公立的，是国家办的，银行也是国家办的，所以，虽然在法律上高校与银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是非常明确的，但在实际上，高校在贷起款来毫不手软，和我们的呆账、坏账生产机器——大型国有企业——一样，不用真正担心欠账的后果，还不了钱你能将学校怎么样？学校是国家办的，有数万学生，有数千教师，况且贷款大户都是国家重点扶持的“211”、“985”院校，是实现政府“科教兴国”战略的主力，你能将它关闭？那对于一个有32 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欣欣向荣的高经济增长国家来说，简直就是丑闻。所以，我们的高校很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虽然在口头上会表现得“负担沉重、难以为继、殚思竭虑、忧心忡忡、睡不着觉”，但在心底里，根本不用真正担心债务问题，政府最终会出面解决的，国有企业形成的坏账最终还不是政府出面解决的吗？大学的各种建设方案不是都由政府批准的吗？批准了就要承担责任，各级政府的大红印章就是最可靠的可行性报告。银行的想法也类似，它们在发放贷款时也很清楚，单靠高校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偿还这些巨额的贷款，它们得到的来自高校的还

款承诺不过是为了取得进一步的贷款而已，但有政府的批文，银行还用担心什么呢？

既然是公立高校，政府就应该承担起财政支持的责任，否则高校因兴办企业或大兴土木而大量地向银行贷款，最终必将陷入债务危机。当然，不管现在各级政府怎么表态，最终还是要靠政府为这些债务埋单，除了政府，还能是谁呢？公立学校是国家的，当然应该全民埋单，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绕个弯子，为什么不直接安排预算，而是要先生产出银行的坏账，政府再注销这些坏账或再为这些坏账埋单呢？为什么我们要一方面给大学施加财政上的压力，让它们从上到下整天围着钱转，另一方面又为有了一流的教学、科研、生活设施却只有二流的科研和教学水平而苦恼呢？所以，在政府埋单以前我们需要搞明白几件事情，公立高校的经费到底应该如何筹措？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高校如何处理知识生产与经济创收之间的关系？高校的哪些项目可以通过贷款来筹集经费，哪些不能？商业银行如何处理追求商业利益与满足政策要求的矛盾？高校对现有贷款的使用是否合理和有效率？如何在制度上保证高校获得的各种资金能够得到合理的使用？不搞清楚这几件事，即使政府这次为高校的债务埋单了，问题的根源仍然存在，我们的高校仍然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再次陷入债务危机。

中国实体书店危机

也许，高品位的实体书店没有了，有书店在就好；实体书店不在了，有网络书店在也好；纸质图书没有了，有电子书在就好。最关键的是有阅读在，就好。

近年来，许多民营连锁书店，如席殊书屋、明君书店、思考乐书局、光合作用、学而优书店、贝塔斯曼等，都相继关闭门店或被收购，还有许多民营书店通过搬迁、缩小营业面积、退到地下室来降低租金，谋求生存。我们发现，在讨论完连锁书店是独立书店纷纷倒闭的元凶这个话题不久，连锁书店也步其后尘，走上了不归路。即使有物业这种核心资源的新华书店，也在不断缩小图书的营业面积，尝试多元化经营。

中国的实体书店走到今天穷途末路的地步，第一，国民对纸质图书的阅读需求急剧下降，纸质图书销售增长乏力。

2011 年 7 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2010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0 年总印张数为 604. 7 亿，同比增长 6. 9% 。2010 年中国人均购买图书 5. 3 册，其中大部分应该是中小学教材教辅、各类考试辅导材料。图书销售量增长乏力是因为实体书店从身边消失，中国人买不到书？显然不是。实体书店的减少是阅读需求不足、图书销售增长乏力的果，而不是因，许多观察家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给颠倒了。电子阅读、浅阅读、功利性阅读、娱乐性阅读，使那些主营人文图书的实体书店倒下了。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是美容美甲按摩的、卖茅台酒的，但要找家书店就非常困难。少数的零售书店也差不多都成了考试书店。诚品书店在台湾的成功，



其基础是台湾人的阅读率高，而且是中青年人在读书。我们发现大学城的书店也办不下去了，最应该读书的都不读书了，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会读书呢？社会的两极分化，伪中产阶级的消失，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焦虑感，精神生活的委顿，使得国人的阅读日趋边缘化和功利化。看看过街天桥上的盗版书摊上都在卖些什么书，你就知道国人在读些什么书、国人在关心些什么了：办公室政治、厚黑学、官场小说、能让自己不得病的书、教人给自己看病的书、理财养老的书、揭露中国苦难现实的书。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管理体制和国情，中国本土图书的质量江河日下，这也是导致国民阅读需求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阅读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阅读、电子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图书阅读，国人对纸质图书的阅读时间在减少。从这个角度理解，实体书店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彩扩店。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照片的存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彩扩店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而数字出版连图书的肉身也要埋葬。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革命对网络书店的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

逛实体书店的感觉的确是网络书店难以提供的，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感觉能够挽救独立书店？显然不能，否则我们就不会谈论这种话题了。对这种感觉的向往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爱书人现在感觉都变成了“破落户”，回忆逛书店，回忆纯粹追求精神愉悦的、无目的的阅读，就像是在回忆原先阔气的时候下馆子的感觉。

第三，一业兴旺百业衰，房地产价格飞涨给了实体书店非常致命的一击。由于对图书的需求增长乏力，实体书店的数量必然会逐渐下降，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无疑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所以，实体书店的衰亡，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和房地产泡沫功不可没。除了国有的新华书店因有“恒产”而有“恒利”外，这么高的地价和物业租金，国人又无雅兴读书，有点时间还主要是上网电子阅读，民营的实体书店怎么可能生存下来呢？新华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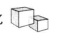
店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首先得益于新华书店在各个城市的繁华地段有自有物业，以及对中小学教材发行的垄断和基于其上的对教辅书的发行优势。许多人问，台湾的诚品书店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并获得不错的发展？那是因为台湾没有新华书店。

一些研究者认为，租金上涨未必是实体书店数量下降的主因，因为所有的行业都在承受着急剧增长的物业租金，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像实体书店这样迅速地凋零。比如，房屋中介、小吃店、美甲店、足疗店、美容店就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其实这些小店也主要是为房东打工，能存在下来的仅够经营者糊口而已。图书对于广大草根民众来说是非必需品。在这样一个以竞争惨烈、朝不保夕、只争朝夕、心急火燎、心烦意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为关键词的时代中，图书特别是严肃图书甚至成为了普通民众的奢侈品。现在物价飞涨，就是书价不涨，买一本书比打一次车还便宜，但大家依然抱怨图书贵。而与 CUCCI 这样的奢侈品不同，它们是富人的奢侈品，而图书是穷人的“奢侈品”，所以，卖图书的还没有卖 LV 的生意火爆。

物业成本飞涨，而实体书店又绝对不能开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但网络书店的物流中心完全可以设在偏远的都市郊区，这就是网络书店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除了物业租金的快速上涨以外，实体书店的员工工资、水电费等方面的支出近几年都在快速增长。这是所有行业都共同面对的问题，但问题是纸质图书的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实体书店的销售额和利润率都在绝对下降。

第四，网络书店的冲击巨大。作为图书超级市场的网络书店有四大竞争优势——品种齐全、覆盖面广、低价、高效便捷。网络书店 24 小时营业，永不打烊；多种检索途径，拥有功能强大的信息检索系统；拥有简化的购书流程和安全便捷的支付系统；提供实时更新的各种销售排行榜单；拥有完备的客户信息；能够根据客户的阅读习惯进行个性化的荐书服务，



进行精准营销；能够分享书友的读书感受；拥有高效的物流配送系统；在大中城市提供快捷的免费送书上门服务；智能比价系统能够自动对网上竞争对手相同商品的售价进行扫描比较，如果竞争对手的售价高于自己，会自动调价。

在突破了物理意义上的地域限制的网络世界中，网络书店之间更易于展开价格和服务的竞争。B2C网站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能够以低价来增加流量，即使在图书的销售上存在亏损，也相当于一种广告支出。而即使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实体书店，其极为有限的经营规模就决定了其不可能通过图书销售方面的微利或亏损来换取总利润率的上升。网络书店图书售价的降低还极大地缩小了盗版图书的生存空间。

与垄断市场中高成本、高价格、低效率、低质量、缺乏创新的特征相反，市场竞争越充分，质量和效率提高得就越快，成本和价格下降得也越快，创新越踊跃，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都把自由竞争的、法制的市场经济作为努力方向的根本原因。

在全世界所有的市场中都一样，抱怨所谓“恶性”价格竞争的只可能是那些在残酷的价格竞争中失败的企业。消费者哪有抱怨所购商品价格过低的理由？出版商抱怨网络书店之间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但其实没有扰乱市场秩序，扰乱的只是市场格局。当然，实体书店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但实体书店的平均价格水平和网络书店相比缺乏竞争优势，因为它们的成本下不来。从这个角度说，实体书店是中国房地产政策和房地产泡沫的众多牺牲品之一。

如果生活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到实体书店购书的时间成本很高，也就是说，到实体书店购书的会计成本也许不高，在北京往往来回仅有几毛钱的公交费，但经济成本却很高，这也加速了实体书店的萧条。而在网络书店购书，不仅价格便宜、节省时间，而且服务优良、送书上门。因此，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实体书店的减少有其必然性。实体书店所提供的基础性服务已经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市场竞争力。

网络书店的这些竞争优势使实体书店卖书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被网络书店取代了，实体书店身上网络书店体验店的色彩越来越浓。

虽然现在图书销售的主渠道依然是线下，但线上销售的市场份额扩张很快。易观国际发布的《2011 年第二季度中国网上零售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数据显示，图书的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率为 84.5%。现在进行网络购书的主体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这意味着未来通过网络购书的人群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2011 年第二季度中国网上零售市场季度监测报告》预计，到 2013 年，图书的线上零售额就会突破纸质图书年总销售额的 50%。

但传统的实体书店不会完全消失，因为第一，纸质图书不会完全消失，阅读内容不会完全数字化，销售也不会完全电子化；第二，消费者先体验再购买的模式也是无法改变的，实体书店所具有的展示性使网络书店难以完全替代它。

现在图书出版机构也普遍开设了自己的网上书店。这些网络书店既是出版社展示产品的一个橱窗，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图书销售平台。但这不过是传统业务模式的网上渠道，是卖场业务的延伸，仅仅是一个服务的手段。

该留下的不用留，该走的留不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实体书店的拯救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徒劳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放弃胶片相机、接受数码相机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可以惋惜，可以怀旧，但不必抱残守缺。时代在飞速进步，社会在剧烈转型，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转型，只是我们无暇顾及这个问题而已。

第五，采购成本高。网上书店与新华书店直接面对二级批发市场。网上书店的库存通常比较大，所以采购成本很低，图书成本通常在五折左右，如果通过与出版社或者书商以其他特别方式合作，成本会更低。而实体书店因为规模小，缺乏采购优势。

第六，盗版猖獗。2007 年 3 月，原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

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每年生产的盗版音像制品大概有1.2亿张，盗版图书5亿册左右。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2011年12月公布，2011年1~11月，全国查办侵权盗版出版物案件9 463起，收缴侵权盗版出版物3 915.8万件，其中盗版音像制品3 154万件、盗版图书663万件、盗版电子出版物98.8万件。中国的盗版源头主要有四个：国际盗版团伙走私、国内地下生产线、合法生产企业违规制造和个人零星盗版。盗版图书蚕食了市场份额，极大地损害了包括实体书店在内的正版图书生产者、销售商、读者和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

所以，对实体书店的政策扶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成立中国独立书店协会，维护独立书店的权益。这样可以统一代表会员与供货商谈判，使民营独立书店能够享受到和连锁书店、网络书店一样的折扣优惠。为独立书店提供开业、管理方面的咨询、培训和帮助；向会员定期公布准确、可信的畅销书排行榜；向会员推荐新书，向会员推荐好书，引导社会阅读行为。

第二，对实体书店实现优惠税率。目前民营书店在税种和税率上与餐饮业一样，要缴纳13%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应该在对不同所有制实体书店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对中小型实体书店实行税收上的特别优惠或减免。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实体书店的运营成本，还有助于鼓励民众阅读，建立学习型社会，建立文化大国、文化强国。况且这些年各级财政收入均增长很快，对实体书店实行一些税收上的扶持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第三，开放中小学教材的发行。新华书店图书业务主要的利润就来源于中小学教材。

第四，物业单位对实体书店实行租金减免。一些大型企业，既有能力也有义务肩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对承租其物业的实体书店减免房租，既是企业的一种慈善行为，也是其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在中国香港，尽管一些黄金地段的商厦租金很高，但书店却仍然能够在其中生存下来，其原因就在于业主会为书店在建设规划时就预留出位置并主动降低租

金。新华书店能够幸存下来，就首先得益于它们在各个城市最好地段的物业。

实体书店本身也必须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经营，以特色取胜。复合书店、咖啡馆、餐厅、网吧、画廊、展览、文化用品、时尚、电影、音乐、休闲、娱乐等元素的混业经营能否成为实体书店转型的一种有效方式？混搭、跨界、多元会长期存在，也会有书店据此取得成功，但很难成为实体书店转型的一种主流模式。台湾的诚品书店恐怕是一种例外而非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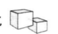
实体书店营造出浓厚人文气息，陈列古旧物品、手稿，举办各种讲座、签售活动、诗会、文化沙龙，让其成为爱书人的乐园，享受精神的阳光，成为灵魂的休憩之地，当然很好，问题是喜欢这种氛围和愿意为这份快乐、这种氛围支付金钱是两回事。有客流不见得就一定有现金流。这就好像喜欢听流浪歌手唱歌和往他的琴盒中丢钱是两码事一样。流连于此的爱书人，在抚摸完图书精美的封面、享受完油墨的清香以后，往往没有走向店中的收银台，而是回家到网上下单去了。

如果没有销售量、没有利润，我们凭什么来证明自己一大堆漂亮的分析呢？在怀旧的人眼中，油灯也许是充满情调的，但电灯不会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留恋的总是逝去的，暂时离开还是永远逝去？为什么逝去，这才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个围观者，我们往往会在语言上说小书店多么重要、是城市的名片等，但却为了能多打一折而到网上下单。就好像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姑娘说多么爱他，但却不愿意为她花一分钱一样。行动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不重要。在生存面前，品位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从一家实行多元化混业经营的实体书店的营业面积、营业额来看，图书销售所占的比重都很小，那么这家经营实体能否再称为书店就很难说了，倒像是以阅读为主题的茶馆或咖啡馆。

也许许多人认为，多元化以后的书店还是不是书店并不重要，这实际



上混淆了一个问题，我们是要挽救民营书店，还是要挽救民营书店店主。多元化是诚品书店的解，不是民营书店的解，不是独立书店的解，也并非连锁书店的解。

也许，高品位的实体书店没有了，有书店在就好；实体书店不在了，有网络书店在也好；纸质图书没有了，有电子书在就好。最关键的是，有阅读在，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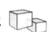
经济学家为什么经常会被妖魔化？

> 出镜的次数多了，谈经济问题久了，就慢慢成了经济学家乃至著名经济学家。许多经济学家其实应该算是一个经济新闻工作者。

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媒体上，特别是在网络上，经济学家经常遭到民众强烈的质疑，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不应简单化处理。

在中国，“经济学家”这顶桂冠通常是由媒体颁发的，而不是单纯学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结果。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经济学家有时也是这样，出镜的次数多了，谈经济问题久了，就慢慢成了经济学家乃至著名经济学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经济学家队伍不仅平均专业水平很低，而且成分极其复杂。有时一个对经济学基础知识尚不具备的学者也被冠以经济学家的名号，在媒体上大讲昏话、外行话，却被舆论以“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名义进行批判。

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家”队伍的首要问题就是成分复杂。只要你喜欢谈论经济问题，有机会让大众听到你的声音，你就有机会成长为一个“经济学家”，就算你没有经过最基本的经济学训练，也完全可以胜任这顶桂冠。在中国，“经济学家”的意思常常是“知名的、喜欢谈论经济问题的人”，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有交集，但交集极小。丁学良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人，有些偏颇，但大体不差。问题是这少数几个人还不一定知名，还不一定喜欢在大众媒体上谈经济问题。丁学良先生在这里讲的，我的理解是按照纯粹的学术标准，而且是按



国际标准来衡量的，与大众媒体知名度无关，与官方的评价无关，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无关，也不包括在海外学术机构工作的华裔或拥有中国国籍的经济学家。

“五人说”甚至与学术贡献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大陆的经济学学术水平很低，目前还处于学习和赶超阶段，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贡献，能够写出在国际纯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很不简单了。丁学良先生所说的标准其实放在国际视野里看并不算高，无非是香港科技大学这类国际高校聘用副教授或助理教授的标准而已。

中国经济学家的成分复杂，成为“媒体经济学家”的学术门槛很低，即使那些栖身于专业研究机构或高校的“经济学家”，其专业水准有时也不敢恭维，他们之中有名气者往往不过是个“经济新闻工作者”而已，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在转型期难以避免的现象。经济学者利用媒体普及经济学思想、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错，错就错在不独立、不中立、不专业、没水准、没骨气、没良知。这样，成分复杂、专业水准低下的“经济学家”们的言论自然就“鱼目”多多而“珍珠”少之又少了。

许多还算业内人士的经济学家也发挥极不稳定，有时说的一针见血、真知灼见，有时又胡言乱语。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时候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利诱与威逼，或自己主动去讨好献媚，卖身以求名利，屈膝以保平安；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能够系统地掌握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对经济学一知半解，偶尔能对几次，一旦面对复杂问题往往就失去了理解能力。非专业的或非专业水准的胡言乱语被当做专业言论对待，这就不可避免地连累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名声了。

但在有些情况下，经济学家遭到非议是因为他们能够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坚持独立思考、自由思考的精神，敢于坚持那些不同于公众依靠直觉得出的判断，不去迎合公众，不去迎合利益集团控制的舆论。例如，许多看似维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实际上是在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而许多看似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政策，实际上在根本上、在远期却是对他们有利的。西方

国家的经济学家一说自由贸易，欧洲服装业的工人和资本家就会骂这些经济学家，说他们出卖了国家和工人的利益；中国的经济学家一说应该运用市场的力量、通过让生产要素价格反映市场稀缺程度的途径来鼓励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行为，老百姓就会骂他们，说主张涨价是在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人们有时知道，但有时并不知道，究竟谁在真正维护他们的利益，什么样的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什么样的政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他们是有利的，什么样的政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体是有利的。经济学的魅力正在这里，它能够给我们提供认识现实世界的独特视角和对特定现象的强大解释能力。

当然，我们需要强调，尽管经济学具有基于自由学术竞争的、基于自身解释能力的、能够进行“帝国主义”式学术领土扩张的学术竞争力，但经济学不可能解释一切，经济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有其局限性。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严格地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进行学术研究的，一切假说都要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和通过统计学检验才能够成立，这是为了维持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但经济学从不认为，不是“科学的”理论和观点就没有价值。经济学家经常深入不应该进入的学术领域发表意见，也成为经济学家经常露怯的一个原因。

此外，经济学家饱受非议，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当今中国盘根错节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与激化的体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改革为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经济学领域的气氛自然就要活跃一些，经济学家能够发言的机会就必然多了很多，甚至许多研究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的专家也进入到经济学这个圈子里，以“经济学家”的名义发言。但由于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严重滞后，深层次体制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和激化，财富分配问题、贫困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似乎都与经济、（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家有关，这些方面出现的问题似乎都应该由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家负责。其实，经济学家的意见，不论是对还是错，都处

于一个被动选择的位置上，充其量只能是受宠、依附、建议与配合，而不能决策和主导。况且，经济学家也分左、中、右，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决策层的青睐。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扩展了民众言论自由的空间，网络世界是普通民众最先获得话语权的地方。网民们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同时网民们在现实世界中又饱受苦闷、压抑、不公之苦，再加之传统媒体有意无意地断章取义、刻意突出、引导暗示、推波助澜，网民们很容易就某些专业话题慷慨激昂、群情激奋，凡是与自己意见不相符的就一概批判，表现出一种对意见长期被压制的“报复性反弹”。

中国的学术腐败

《科学新闻》记者　徐治国

系统性的腐败

科学新闻：“科学的春天”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之带来的就是学术界的造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也日渐显著，学术腐败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卫志民：目前严重的学术腐败是与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密切关联的，要理解与反思今天发生在中国的这种系统性学术腐败，就不能不去思考产生这种系统性腐败的制度基础，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洞察力与解释力。在围绕这些基础性的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我们是很难单独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目前只能呼吁有关部门在严肃惩治已经浮出水面的学术腐败的同时，能够着眼于基础性的制度创新，关心这个问题的相关各方要看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国学术腐败的危害不亚于官场腐败，现在应该把态度化为行动、把态度化为制度，不要止步于就事论事，还要通过制度创新来遏制学术腐败的蔓延趋势，消除其产生的制度基础。现在的学术腐败是一种系统性的腐败，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不是一个个人品德问题了，因此它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行为。在这种体制下，好像所有的人都难以独善其身。在口头上人人厌恶腐败，在行动上又有几人勇于拒绝腐败呢？正常的学术竞争、来自同行的互相监督是遏制学术腐败的一种主要的力

量。创新活动非常活跃的发达国家，并非依靠什么道德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几个专家，甚至没有成立这些委员会，他们靠的就是同行之间的良性竞争、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不受限制的新闻监督，这是主渠道。一个研究人员，欺骗一两个专家教授容易，收买一两个专家容易，但是想欺骗同行、欺骗公众非常困难，在资讯不受管制的情况下几乎是做不到的。就像在官场上一样，讨好一个上级、搞定你的上级很容易，但是你要让下面的群众真心信服你就很难，正所谓“骗一个人容易，骗天下人很难”。

科学新闻：为了遏制学术腐败、净化学术环境，最近几年，高等学校和一些科研院所都成立了相应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其目的就是监督和调查学术造假，规范学术行为，可到如今这个组织基本是碌碌无为。

卫志民：对于学术道德委员会等监督调查机构，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有聊胜于无。你不能去责备它，因为这原本就不是它所能承担起的重任，它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况且它还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对于目前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在现有的这种体制下，想通过学术道德委员会这类技术性手段来加以遏制乃至根除，显然是避重就轻的，是绕着走的。目前的反腐机制不是根据产生腐败的原因去设计的，而是根据针对腐败的现象本身去设计的，所以是治标不治本的。

科学新闻：既然这样，这个机构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卫志民：当然有。当出现学术不端这类问题后，总是需要学术道德委员会或学术规范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处理的。只是单凭这样的机构是无法遏制住学术腐败的蔓延的，必须针对学术腐败不断恶化的制度性基础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其存在的土壤。要立足于建立起基于良性学术竞争的学术评价机制，要从体制上真心诚意地去保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中立

性，真心诚意地去保护学术领域的良性竞争、自由争鸣，真心诚意地去促进舆论监督，打破学术界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和对中青年学者的控制，让优秀的中国人能够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繁荣昌盛痛痛快快地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也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但我们又为什么做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呢？

大家都不敢讲真话

科学新闻： 对于学术腐败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难道在整个学界和教育界就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吗？

卫志民： 中国的学术腐败，并不是这些腐败隐藏得有多深，而是因为学界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不是大家不知道，而是学者们都不敢讲真话。你顺着我讲话的话我就给你各种项目，开会就邀请你，还有红包拿，慢慢地你就能进入这个圈子，否则一切免提。现在的科研人员很难做到独立，不独立就很难做到中立。

现在，我们依靠风烛残年的老人讲真话，依靠外国人或拿了外国护照的中国人讲真话，依靠圈外人替圈里人讲真话，依靠拥有了财务自由和世界性学术竞争力的圈里人讲真话，依靠翻脸的人讲真话，这是不正常的！

多数人恐怕还得选择低眉折腰，顺从依附。项目的分配、学术荣誉的分配，教授岗位的分配，总而言之，金钱与荣誉，光荣与梦想，你想想有多少是掌握在别人手里，自己的命运自己又能控制多少呢？

科学新闻： 您觉得相关管理部门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吗？

卫志民： 作为这个游戏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游戏规则的设计者，我想



他们是很清楚其中的弊端的。比如说我们目前实现的种种量化考核制度。现在还在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搞研究，严重违背了科学研究的规律。创新怎么能够提前规划呢？这本身就非常荒谬。然而，我们却很难看到这种规则和制度的终结，相反还在不断地受到强化，愈演愈烈，这种考核体制直接助长了学术腐败。

在这种体制下，论文专著不再是科学研究的一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获取研究经费、满足考核要求的一个手段了。慢慢地，科研人员就不会再去追求科学真理了，而是以能够发表为原则了。

所有参与游戏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也看得很清楚。但是在深层次的体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们似乎认为也只能如此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创新体制是不可能在更为基础性的制度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单兵突进、独善其身的。日子还得过下去。

科学新闻：不断增加的研究经费是否会缓解体制因素对我国科研效率的掣肘？

卫志民：国家投入到教育和科研方面的经费逐年增长，而且数目巨大。虽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规律，虽然研发活动不能脱离投入，但是单靠重赏很难出现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创新性的成果首先依赖的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资助科学研究活动绝对不同于寻找勇敢的刺客。尽管中国发表的论文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但引用率超低，这说明我们的成果多数都是没有创新成分的。

科学新闻：您认为中国科研投入的效率有没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卫志民：国家花了很多钱，但花大价钱“买”来的这些论文许多是既没有促进学术的发展，又对社会的繁荣进步没有什么作用。似乎只是造就

了一批富翁学者、富豪教授。如果国家只是往里投钱，而体制不变，必然会滋生大量的学术腐败，并且刺激学者们以更快的速度放弃追求真理，转而追逐金钱、名誉与权力。现在的学者教授主要的工作就是跑项目，项目获批之后基本由学生做，这已不算潜规则了，都是这么运作的。在我看来，某些研究项目系伪造数据，收买评委，贪污浪费，几乎等同于诈骗，严格说来就犯罪。

选择性执法

科学新闻：但是，我们通过各种媒体还是能看到学术道德委员会或学术规范委员会处理过相关的案件。

卫志民：确实有过，不过当前的这种状态也只能是选择性执法，有些案件能得到迅速的处理，但是有些案件白纸黑字放在那里也得不到处理，甚至组织出面做工作、来压事，比如西安交大的案件。所以，我们的相关监督机构忽而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忽而又装聋作哑，甚至帮着腐败分子去掩盖“犯罪”事实，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也得不到处理。

为什么会出现选择性执法的现象？因为这些机构工作起来过多地受制于利益的权衡取舍和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而非单纯的是非对错那么简单。边缘性人物的处理难度通常较小，牵涉面也窄，但是牵扯到很多人的案子处理起来难度就会很大。处理一个普通教师常常能够显示出其雷厉风行的一面，但面对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处理起来就要仔细思量了。如果他本身就是学术执法机构的负责人，怎么处理？

科学新闻：中国每年招收和毕业的研究生几十万，他们将来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要走向科研岗位，他们的前途在哪里？

卫志民：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三大特点：不独立、不中立、不专业。不独立就是他们的大部分都身处公立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活动的资金来源非常单一，基本来自政府或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摆脱行政主导的命运。所以口口声声说去行政化，怎么去？拿人钱财替人讲话，这就是无法中立的根源。

我们可以反思一下，那么多项目，如果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掏钱，有几个民营公司会投资他们做这样的项目，会花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来购买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在基础性领域里，我们有多少成果真正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能够走向世界？许多研究人员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根本就缺乏兴趣，更谈不上热爱了。正如北京大学饶毅教授指出的，很多教授不去倾听一流专家的报告，或者主持一下就跑了，真正的学术讲座特别是他本专业的讲座，他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听，完全是官场做派，只有跟他直接利益相关的一些专家来了他才很谦虚得像个研究生一样，从头到尾地陪同，还记着笔记。

科学新闻：难道国家对此真的就置若罔闻吗？

卫志民：我猜测国家的“千人计划”有多重含义，除了通过吸引一流学者回国提升中国的教育科研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复兴以外，可能还暗含一个较为次要的考虑。目前大家对院士制度很不满，希望把它慢慢变成一个荣誉性的东西，不要控制那么多的资源，但是现在取消院士制度会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会产生某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实际上，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对许多情况看得很清楚，可能是在寻找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和最佳方式。目前的院士制度严重挫伤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把学者们都搞得低眉顺眼、低三下四的。这是最高决策层不愿意看到的，我猜测引进“千人”有稀释院士权威的深层次考虑。

除了档案柜还能去哪儿？

科学新闻：但毕竟在中国，这样的模式已经运行了许久，很难改变的。

卫志民：作为一种常识，在应用性研究领域，市场没有失灵，企业原本就应该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现在大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公立的研究所效率很低，研发投入浪费很严重，贪污屡屡发生，这都是公开的秘密。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获得一个大的项目，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祝贺他可以有机会从事自己心爱的研究了，而是说他发财了，这就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研究项目的账目都是不能公开的，公开的话就非常荒谬了。如果把所有科研项目的开支明细都公布出来，你可能会发现他们买了数吨的复印纸、成千上万支签字笔、很多台专业级的数码单反相机，许多发票都是超市的。

科学新闻：现在的一个现象是，科研项目鉴定完后，基本都默默无闻了，能走向应用的似乎很少。

卫志民：在应用性研究领域，那些所谓的科研成果，首先应该反思一下有没有产业化的价值。在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的今天，在流动性过剩资金追逐项目的今天，有市场价值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想被埋没都难。许多研究机构所承担的国家级项目，鉴定完之后就进了档案柜了，除了档案柜子还能让它去哪里？难到企业家视金钱为粪土？显然不是。

这就涉及国家的创新机制。政府活动的范围应该在基础性研究领域，这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企业应该成为应用性研究活动的投资主体，他们最了解市场需求，也不缺乏投入的动力，更不会存在应用和科研的脱节。但在

中国这个就分得不是很清楚，政府是急于求成的“赶超思维”在作怪，企业则是能沾国家的便宜为什么不沾，他们会游说政府采取种种补贴政策。

学术腐败，人人都是参与者？

科学新闻：在当前这样一种常态下，多数科研人员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去努力适应它。

卫志民：中国的学术力量不独立，因为科研人员的资金来源非常单一，特别是文科，所以很难摆脱行政主导的命运。行政力量控制着资源，所以知识分子在面对学术腐败的时候就很难畅所欲言。学术领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江湖，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每个人都痛恨学术腐败，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或深或浅，或直接的或间接的，这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在这种体制下，培养了一大批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但是他们也有苦衷，他们也要生存，一方面不喜欢腐败，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参与腐败，在有机会腐败的时候不会客气，在没有机会腐败、腐败的机会被别人拿走的时候，就谴责腐败，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怪象。

科学新闻：与国际相比，有什么区别？

卫志民：在一种比较健康的学术环境中，对学术成果的评价是一个较为单纯的事情，不会因为你不在学术界了或没有多少人认识你这个大活人，就置之不理。他们主要看你的成果，即使某天你已经不在大学里面，变成一个农夫、售货员、司机也无所谓，照样可以被授予很高的荣誉，如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就是一位小公司的职员。这对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是个很大的启示，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

科学新闻：但是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卫志民：说到这个，媒体也可以呼吁一下，在改变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也许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学术委员会要改变传统的只接受实名举报的游戏规则，事实上，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在保护腐败者，对匿名的举报也应该受理。与此同时，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带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否则相关领域的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要为学术力量的独立和学术活动的中立创造制度性的基础，建立独立、透明、高效的学术评价机制。在各种奖项和院士的评选制度方面，逐步废除目前这种申请制度和单位推荐制度，改由提名委员会秘密提名、投票来确定。

（该文发表于《科学新闻》杂志2011年第10期。）

学术反腐，大有可为

> 目前学术界发生的大规模学术腐败，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学术道德问题了，而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在基础性制度系统无法发生根本性创新的前提下，相对于在其他领域的反腐，针对“结果”的学术反腐却是最有可为也大有可为的。

说学术反腐大有可为，指的是相比较于其他领域的腐败而言，学术领域的腐败较为容易得到惩处。就像是有一群贼，都很狡猾，都不容易抓到，但其中总是有个别贼相对容易抓一些。

第一，学术腐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腐败而言，通常比较孤立，涉及的面比较窄，没有太多盘根错节的“萝卜”和“泥”的关系，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活动，通常非常类似于个体劳动。反学术领域的腐败就好像攻打敌人的炮楼一样，孤立的炮楼通常是最容易被端掉的。

第二，学术反腐活动搜集证据的成本很低。学术腐败与其他领域的腐败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搜集信息的成本非常低。例如，学术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学术腐败的证据常常是公开的。特别是借助于数据库和搜索引擎这样的信息技术，收集学术腐败证据的成本非常低。通常不需要“人肉”，不需要当事人和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配合，也不需要对当事人进行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和记录，就能够获取相当详尽的证据。

第三，由于现在处在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导致我们对腐败行为通常拥有很高的宽容度。具体到

学术腐败问题上，就体现为我们主要反那些“太过分”、太“牛”的抄袭和数据造假，而无暇顾及那些泛滥化的、可以“理解”的、不太“牛”的学术腐败。不加掩饰地整段、整篇、整章地抄袭，连实验室的门都不打开就能够结项，邮购两个芯片就敢请来一流的科学家进行鉴定，还能够得出“世界领先水平”的结论，就属于太过分的学术腐败了。这非常类似于穿着国民党军装“潜伏”在延安一样，而不是仅仅抽个天价烟、戴块天价表的问题了。

第四，学术反腐比较适合打人民战争。主要清查太“牛”、太过分的学术腐败就意味着进行学术反腐的门槛变得非常低，特别是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腐败。与通常人们的惯性思维不同，有时我们的“学术”成果非常没有专业水准，发生在我们学术界的许多腐败也非常没有专业水准，具有小学文化的人就能够识别那些整段、整篇、整章抄袭的学术腐败。

第五，比起政治领域的腐败，民众对学术腐败的容忍度通常更低。学者们也许觉得这是一种苛求，但公众普遍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应该比其他人、比官员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觉悟，就应该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身为一个被社会认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失去了礼义廉耻，也干起偷鸡摸狗的营生了，这就尤为可恨和可耻。

第六，在学术界，目前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比较“卫生”的科研人员。如果大家都腐败了，都不“干净”，就会很忌讳反腐，更不会进行反腐，甚至还会千方百计地保护那些已经暴露了的学术腐败分子。

第七，由于最近几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我们现在每年“培养”数万博士、数十万硕士、数百万学士，这些人绝大多数并不在学术界谋生，没有太多学术腐败的包袱背，又对学术领域的情况相对比较熟悉，对学术界的事也比较关心和感兴趣，已经成为学术领域反腐行动在公共舆论上的重要支持力量和推动力量。

第八，比起其他领域的反腐行动，反学术腐败也较为安全，不太会发生反腐不成反蚀了几把米，甚至搭上了卿卿性命这样的严重后果。比起掌

握着巨大行政权力、这些权力又缺乏有效制约的腐败官员，科研人员不过是提供某种服务的专业人士，显然不属于“猛禽”，没有太大的攻击力。

第九，在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对发生在不同领域的腐败行为，纵容、理解、堕落、麻木、深恶痛绝与忍无可忍并存，学术领域的反腐活动也容易成为一个社会的减压阀门，从政府的角度看不是特别的敏感与警觉。

第十，学术反腐非常适合匿名举报，这是因为学术腐败的证据天然地具有合法性、权威性，不仅非常容易收集，还难以被当事人及时销毁。学术腐败的证据通常刊载在官方机构的出版物或国际刊物上，广告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宣称遭到了诬陷、造谣这样的策略就很难奏效了，而且匿名本身也不会损害到这些证据的效力，还能保护检举人免受报复打击。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腐败的当事人通常只能从举报人、发帖人的动机入手进行反击的原因了。其实，动机根本就不需要去查究，这是个毫无价值的问题。腐败了还是没有腐败，这才是当事人需要认真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今天，在我们的学术界发生了大规模的学术腐败，发生了许多很离奇和很离谱的学术腐败，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学术道德问题了，而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了。知识分子个人堕落的背后是学术体制。有人抱怨现在学者们的脸皮太厚了，其实，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来说，脸皮是可以变厚的，也是可以变薄的，厚与薄取决于学者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的“游戏规则”决定了参与游戏的人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点。要治理目前学术界的学术污染状况，就犹如治理太湖或滇池的污染一样，不改变基本层面的游戏规则本身，是很难取得可持续的成效的。但是，学术界的游戏规则作为一种派生性的游戏规则，又无法孤立地进行实质性的改良和创新，只能静待改革时机的成熟。但在基础性制度系统无法发生根本性创新的前提下，相对于在其他领域的反腐，针对“结果”的学术反腐却是最有可为也大有可为的。

学术竞争与学术道德

> 建立有制度保障的、自由的、平等的、开放的学术竞争环境是当务之急与治本之策，凡是空、假、伪、劣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自由的学术竞争的考验的。

某大学在2008年开学之初成立了由院士、专家教授组成的学术道德委员会，专司处理校内出现的学术违规行为，学术道德委员会是学校学术委员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

在学术界，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真心认为这样的机制能够遏制住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抄袭、造假行为，其效果充其量是“有聊胜于无”。如果不讲究说话的艺术和策略，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今日中国的学术界，抄袭、造假绝非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司空见惯、相视一笑、心照不宣的现象。大量的学术垃圾堂而皇之地充斥着各类学术期刊、图书馆、书店、档案馆、文件柜和各类出版社的仓库。当学术研究活动失范成为一种集体性的行为特征时，就表示学术欺诈不再是一个个人的学术道德问题了，而已经成为一个体制性问题。

出现现在这样一种局面，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竞争，而之所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竞争，又是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独立性、中立性，学者这个群体有太强的依附性。这样，学术竞争就逐渐让位于官场游戏和利益的权衡与交换，学术地位的高低要依托于行政职务的高低，学术成果的价值取决于研究经费提供者的层级和承担者的行政级别和学界威望，学术荣誉的取得要依靠行政力量和学界权威的关怀与分

配，科研项目的取得要依赖于学界强人的关心和照顾。

于是，学术界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学术竞争就逐渐消失了。学校、科研单位越来越像行政部门，学术界越来越像江湖了。有地位者越来越像制造业部门中的跨国公司了，他们有能力拿到“订单”，但往往并不用“亲自生产”，而是将学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过程全部外包出去，搞“贴牌生产”，搞组装集成，他们自己往往只负责或只保留获取订单、组织协调、成果鉴定、评奖、对外文宣这些“技术含量”和投入产出率均比较高的关键环节，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核心技术”控制着学术市场的份额。

当对学术成果的评价与学术成果本身的学术价值渐行渐远时，当学术垃圾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重大突破时，当学术批评蜕变为广告文宣时，当量化考核被当成可以绕开基础性体制变革的灵丹妙药时，当学术会议直接交由旅行社运作时，当学术地位由行政职务奠定时，当著名学者、学术权威找不出学术上的代表作时，当多、快、好、省成为越来越多学者们的行动指南时，当缺乏学术评价机制下的科研成果附加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时，当学术行为不端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惩罚时，当行政力量主导了学术领域时，当搞学术是为了最终有一天能够修成正果可以不再费神“亲自”做学问时，就犹如旧国营企业里的工人努力表现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当上车间主任不用再亲自劳动一样。当学者们聚在一起除了学术无话不聊、没有什么忌口的时候，学术研究活动的集体性失范就自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这种局势下，我们就很难对“学术道德委员会”这样的学术领域的“纪检委”寄托太高的期望了，这不是它所能够承担起的重任。在一个大学内，这些有地位的人都是学界和校内各个领域、各个院系的代言人、负责人、领军者和掌门人，师徒关系、利害关系、上下级关系交织在一起，再加上中国人“山水有相逢”、“事不要做绝”、“适可而止”的处世哲学和生存智慧，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就远非一件“是与非”的简单之事了。学

术不端行为的举报者往往会被看做是不懂事者、找事捣乱者、被人指使者和别有用心者，学界同仁或学界主事者对举报者动机的关心常常大大超过对事实真相的关心，人们的是非观念几近殆尽，人人只想趋利避害，学者们变得越来越“成熟”、麻木、功利、世故甚至堕落。这样，身处学术江湖中的人在行动前都会三思而后行的，除非他有能力和强烈的意愿无限期地退出学术界。但体制内的学者们离开这个有特色的学术界还能够做什么呢？

所以，这种“学术纪检委”不会对学术界学术研究活动失范的整体状况产生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影响，只能是有聊胜于无，只会是“有选择”地发挥一些作用，必然是抓典型，抓边缘分子，弄不好还可能会沦为人际纠葛和杀鸡吓猴、敲山震虎的工具。

由体制产生的问题恐怕最终还要依靠基础性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来解决。建立有制度保障的、自由的、平等的、开放的学术竞争环境是当务之急与治本之策，凡是空、假、伪、劣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自由的学术竞争的考验的。

当然，制度的创新不是朝夕的事情，在制度能够创新之前，我们还是应该欢迎和鼓励这样的举措和行动的，至少可以起到表明态度和些许警示的作用。

我们也许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

> 我们在思考类似问题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混淆了需求和需要、需求和欲望，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进行总量调整，甚至希望在招生规模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幻想单纯依靠调整专业或调整专业名称，增强开设课程的市场针对性、实用性、技能性来解决大学生培养总量层次上的问题，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对于越来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教育专家们的普遍看法或说法是，这仅仅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代表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太多了，不代表我们的社会不需要大学生，仅仅说明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和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不协调，是一个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一致的问题，因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总量过剩的问题。因此，教育专家们普遍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对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的应对之策应该是在稳定招生规模增长率的基础上调整培养结构，我们的大学入学率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起发达国家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还太低，我们的大学生还太少。

这种认识对吗？尽管这种观点很流行，但完全不合逻辑。

美国的大学入学率比我们高，就意味着我们的大学入学率应该提高，我们应该扩大大学招生规模吗？那作为先发展国家，美国的入学率是否合理？美国的入学率又是如何确定的呢？美国又该和谁比，难道和火星社会比吗？

一国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超越本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尤其是作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特别要防止那些脱离社会整体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的“赶超战略”和“大跃进”，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实在不需要新的教训了。就像我们不能在家用轿车出现大量库存的情况下，因为美国的家庭轿车拥有量比我们高，我们就说“因为我国家庭的平均轿车平均拥有量比美国低多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家用轿车的总量过剩，不是我们生产的轿车太多了，而是我们生产的轿车和市场需求的轿车不一致，我们拥有轿车的家庭还太少，我们的家用轿车制造业还要进一步大发展”一样。我国的家庭轿车拥有量低这一事实充其量说明了我国的家用轿车制造业“在长期”具有“发展的潜在空间”而已，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应该减少产能，而只需要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在“长期”也许一切都是不足的，难道这就意味着在“今天”一切都没有所谓的“过剩”吗？在“长期”我们都会死去，难道意味着我们今天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吗？

我们在思考类似问题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混淆了需求和需要、需求和欲望，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比如，我是一个无比贪婪的人，我需要 10 辆或更多的高档轿车，但我一辆都买不起，那这就仅仅是欲望或需要而已，构不成市场需求。在现实中没有一个企业会为我们的“欲望”而安排生产，也没有企业会因为我连一辆高档轿车或私人飞机都没有而安排生产。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就认为因为我们的大学入学率比美国低而坚持认为我们的大学生是不够，而非过多呢？

我们的大学生在总量上到底是过多还是过少，只要看看大学生首次就业率和平均薪金水平的总体变化趋势与速率就会知道了。那么多的大学生就业不了，一些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比小学毕业的农民建筑工人还低，大学生做的工作，高中生或初中生就能够胜任，大学生不是“过多”又能是什么呢？虽说不上大学似乎更难以就业，但上大学不是没有成本的。我们为什么要招那么多大学生，花费宝贵的资源去“培养”他们，

而又让他们在毕业后去干那些即使他们不上大学也同样能够胜任的简单工作呢？难道仅仅为了改变这些年轻人在长长的“领取工作机会”的队伍中的排队顺序吗？

在我国现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也许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考虑到我们的教育质量，我们更不需要这么多“名不副实”的大学生，考虑到我国公立大学高昂（相对）的收费水平，我们就更加不需要这么多“昂贵”的“名不副实”的大学生了。

大学这个层次进行的是通才教育，注重培养的是能力，而非专业技能训练和积累基础知识，更不是“岗前培训”。所以，绝大多数大学生学非所用，是正常的现象。21 世纪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的时代，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一个人的知识结构、职业生涯、工作技能都在处于快速的变化之中，这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和过去的旧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古代，一个人入了钟表匠这一行往往就意味着他一辈子都是钟表匠，甚至连儿子都成了钟表匠。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往往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办公室、一张桌子后面度过我们的一生，在现在这个时代还可能会是这样吗？

就国家或社会这个宏观层次来说，如果我们投入了许多资源到高等教育系统，而同时又有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最终却无法顺利就业，这时，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培养规模也许“超前”了。不恰当的“超前”就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费，浪费的不是社会共同的财富就是我们的个人财富和时间资源，而所有的财富都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浪费它们，损害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不能运用“总有一天这些知识能够用得上、上大学总不是坏事”这样的理由，来否定进行合理资源配置的意义。

在个人层面上，上大学是一项投资，投资的结果是形成人力资本，拥有人力资本的好处是这些人力资本与股票、存款、住宅、机器设备这样的资本一样，能够为它的拥有者带来收入。当我们的大学生在付出经济上的成本和时间上的机会成本而得不到相应的、长期意义上的、合理的投资回

报时，岂不是一种错误的投资决策，岂不是一种时间资源的错误配置，岂能说“上大学总不会错”，岂是要求大学生转换就业观念、放下精英思想、到基层的广阔天地这样的说教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理解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就应该首先或主要从总量入手，其次再考虑提高教育质量和调整专业结构。专业结构的调整和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高岂是一日之寒，而搞换汤不换药的专业名称调整和教学评估这样的花样文章，快倒是快，但没有什么正面效果，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就教育部门而言，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要“三管齐下”。而在调整总量、提高教育质量和调整专业结构这“三管”中，最容易进行的就是总量调整，所以，我们应该首先进行总量调整。不进行总量调整，甚至希望在招生规模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幻想单纯依靠调整专业或调整专业名称，增强开设课程的市场针对性、实用性、技能性，来解决大学生培养总量层次上的问题，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八大原因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

“优秀”、“高端”和“顶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永远只能是少数人才能被称之为“优秀”、“高端”，“高端人才”永远都必然是紧缺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培养成“高端”，我们也不能因为高端人才紧缺就责备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不够“高端”，须知就业的总量是由经济活动的总量来决定的。况且，高端的人才也不是学校能够培养出来的，而只能是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

大学生就业困难原因，第一个是大学生传统的就业领域对大学生的需求比较稳定。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增加；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这些大学生传统的就业领域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比较稳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就业人数基本稳定在 3 700 万人的规模上，其中公务员的人数稳定在 1 000 万人的规模上。随着国有经济部门布局调整的进一步深化和国有经济比重的进一步降低，从整体上看，国有经济部门有一个工作机会向民营经济部门转移的问题。尽管也伴随着岗位结构的变换，但总体上能够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岗位是有限的。

第二，民营经济部门工资水平的高度市场化降低了大学生在这个部门就业的意愿。民营经济部门是我国最重要的增长部门，提供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但这个部门也是市场化最彻底的部门，工资的水平基本由市场来确定，不会像传统的国有经济部门或行政事业单位那样，按照一定的标准给就职者确定等级，支付不同的工资报酬，高学历者往往仅仅依靠学历本

身就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水平。这些部门在过去也愿意用较高的工资和福利雇用高学历者来从事简单的工作。

民营部门工资水平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工资水平会更多地与工作效率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文凭联系在一起，这样对于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至少在工作的初期要经历一个低工资时期。大学生承担的是一个相对于我国平均收入水平来说较为高昂的教育成本，对教育活动的巨大投资必然要求获得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报率，这就意味着大学生不愿意轻易接受一个较低工资水平的工作。较低的工资水平意味着教育投资的回收期过长，因此，高投入、低回报会加剧大学生的就业困难。

第三，就我国的产业结构而言，就业岗位增长最快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部门，操作性岗位的工资水平低，对于付出很大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的大学毕业生来说，由于教育方面投资的回报率过低、社会地位过低而缺乏吸引力。而对于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岗位，这样的部门往往更注重雇员的工作能力和效率，而不是文凭的高低，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会面临很大的考验。

第四，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使发达地区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来看，我国的经济活动主要发生在局部的区域，大学毕业生大多流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少数优势地区求职、就业，这虽然是一种对地区间收入水平差异和个人生活、发展环境差异的理性反应，无可厚非，但无疑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困难，使相对发达地区的就业竞争更加惨烈。

第五，就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来看，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有所降低，劳动生产率会持续提高，这些因素都会降低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

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渐消失和后发劣势的逐渐显现，越难以保持经济增长初期的快速增长速度，再加上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等因素，都不允许传统上那种“不惜一切

代价”实现某一经济目标的执政风格再继续强化。

第六，就我国整体的就业形势而言，在城市，由于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和布局调整，有大量的失业人口需要再就业；在农村，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和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来就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虽然有层次的差别，但除了少数优秀的人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会越来越多地与低学历人员展开激烈的竞争。

而对于优秀人才的短缺问题，“优秀”、“高端”和“顶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永远只能是少数人才能够被称之为“优秀”、“高端”，“高端人才”永远都必然是紧缺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培养成“高端”，我们也不能因为高端人才紧缺就责备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不够“高端”，须知就业的总量是由经济活动的总量来决定的。况且高端的人才也不是学校能够培养出来的，而只能是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

第七，就我国的教育体制而言，高等院校定位雷同，稍微好一点的高校都要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缺乏层次性；教育部门对市场需求反应迟缓，专业结构与人才市场的需求结构脱节；学校侧重理论传授，不重视理论运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黑板上种田，教室里开机器，上述原因均造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数量过少，削弱了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第八，我国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还没有从过去的“精英意识”中完全清醒过来，难以接受那些“不体面”的蓝领工作。

现在，大多数大学生是独生子女，特别在社会贫富差距持续加速扩大的大背景下，他们的父辈甚至祖父母辈都对他们寄予了过高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期望，都望女成凤，望子成龙，造福家庭，光宗耀祖。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他们都千方百计地到发达的大城市求职，不断延长寻找工作的时间，很多没有名气的大学的毕业生由于找不到正规和体面的工作，就沦为“漂”一族。

上述问题，没有一个是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的，对大学生的供求关系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随着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加剧，人们可能会更加慎重、更加理性地做出是否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的决策了，而不会像过去那样不假思索地进行盲目的教育投资了，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

学习、思考与运用

> 我们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忽视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忽视经济学基本思想的掌握，而过早地偏重于进行经济学数学分析技巧的训练，这似乎是体现了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

学习经济学，贵在思考与运用。经济学是一个逻辑非常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经济学一定要首先从这个理论体系的“整体上”加以把握，才能建立起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是掌握一些只能在课堂上或在考试时对着答题纸才能想起来的零星片段所能够形成的。

对于那些不想做职业经济学家的人来说，深刻理解并熟练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形成一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而对于那些立志要做职业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则更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上最好的经济学系里，总是由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来讲授《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原因。

我们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忽视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忽视经济学基本思想的掌握，而过早地偏重于进行经济学数学分析技巧的训练，这似乎是体现了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

数学是职业经济学家必备的基本分析工具和“执业资格证书”，不掌握必备的数学分析技术，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济学家，但数学并不是培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必需，也不是掌握经济学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的前提条件。不要担心数学和曲线这些问题，就表达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而言，常用的文字和词汇就基本可以胜任了。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以后

表现出的数学化其实仅仅意味着，一个不经过长时间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的人，无法胜任经济学的研究者、传授者、创新者这个工作，但绝不意味着他不能够成为经济学思想的普及者、接受者和运用者。

在学习经济学课程的学生或经济系的学生中，绝大多数的学生是不打算也不会成为职业经济学家的，因为我们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做职业经济学家，我们需要的是他们能够将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运用于日常生活和不同的工作领域之中。所以，在本科阶段做艰深的习题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逻辑，建立起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培养起对经济学的兴趣和热爱。仔细观察国际主流经济学系的课程设置和授课内容，莫不如此。

而我们的经济学教师在这方面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本能地把所有的学生都按照职业经济学家的目标去培养，并且在本科阶段的授课内容上偏于理论观点的介绍，偏于琐碎细节的分析，偏于数学技巧的培训，偏于解答习题能力的培养，而疏于经济学研究规范的培养，疏于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养成，疏于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如果学生陷入数据、图表、方程和定义的琐碎细节之中，不能把经济理论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他们就无法充分认识到经济学原理作为一种理解真实世界的重要工具的真正价值。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是记忆了一些现成的结论，不知道这些结论的来龙去脉和适用条件，这些结论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学生头脑中僵硬的教条。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也一定要明白，学习经济学是为了运用它，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躲在现实世界之外完善自我，更不是为了向别人“秀”那些时髦的或高深的经济学术语，经济学理论的价值在于运用。大学生们经常会发现他们能够听得懂老师的讲解，也能够记得住课本上的定义和定理，但就是不会从现实世界中发现问题，更难以运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那些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学生们最拿手的往往是记忆和复述课本上的内容，而且能够解释的经济现象往往也

仅仅局限于课本里举过的例子。

经济学理论只有在运用的过程中才能够真正地掌握，只有真正领会了经济学理论的含义，才能够融会贯通、灵活应用，仅仅依靠对理论的阅读和记忆是做不到这些的。让学生们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鼓励他们尽可能多地尝试着把学习到的经济学理论和概念应用到解释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当中去，仅仅把经济学应用于教师选出来的寥寥可数的几个经典事例上，是不可能让学生学会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的。

做经济学练习题当然是应用经济学理论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那些希望成为职业经济学家的同学来说尤其如此。但运用经济学原理去理解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则是一种应用经济学原理更重要的方式，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最终极目的。对经济学的兴趣、耐心和对现实世界的好奇心对于学好经济学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

经济学理论大厦也许是不完美的，但它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部分是值得我们赞美和惊叹的。经济学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如此众多的学科，如政治学、法律、金融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已经不再被人看做一门“忧郁”的科学了，人们现在常常提到的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了。

通过对经济学的学习，你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没有什么学问能够比经济学更富有解释力的了。

经济学教科书的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学

所谓经济学教科书的中国化，也称为经济学教科书的本土化，指的就是将目前由西方经济学家创立的这个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中国的经济现实紧密相连，以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为背景来撰写经济学教科书，以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为学术背景来展开经济学教育，以理解进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为经济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努力运用中国经济历史和现状的实例来阐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需要，对移植自欧美国家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传统结构进行调整和内容上的取舍与增删，以更好地理解有鲜明转型特征和历史局限性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致力于经济学教科书中国化的努力不是创建中国经济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并不存在理论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就犹如不存在中国数学、中国化学和中国物理学一样。现在的“西方经济学”这个称谓指的是“非马经济学”，是我们在过去那个极“左”年代按照政治的标准而不是地理标准进行划分的结果，并一直沿用至今，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更习惯于使用“经济学”这样的称谓了。

在全世界，所有的职业经济学家使用的理论分析工具都是一样的，所遵循的研究规范也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研究对象，以及不同的经济学家在设计和评价一项具体的经济政策时所持有的不同价值判断。

在政策层面，各国的国情不一样，各国的制度环境不一样，各国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不一样，决策者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所以，对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绝对不能奉行拿来主义的原则，不能简单地照猫画虎、人云亦云，

而要紧密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设计。但在经济学理论层面、具体的前提条件下，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会因为解释对象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些逻辑关系反映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如果有些经济学现象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还不能很好地解释，那只能说明经济学家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经济学的机会，他发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解释对象，而不是急匆匆地宣告现在这个经济学理论体系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至于有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者为了多、快、好、省地出论文、出成果，或者研究者本人学艺不精，拿西方经济学家已有的理论模型生搬硬套于中国的经济现实，从而得出错误的乃至荒唐的结论，则既不能说明经济学无用，也不必为这样的结论而吃惊。

过去我们总是说对待西方经济学要批判地借鉴，在方法论层面上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真正应该批判地借鉴的是西方国家曾经实行过的和正在实行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政策。特别注意别的国家在政策方面失败的教训，只因为它们是先发展国家，只因为它们现在是发达国家，就把其当做成功的经验去学习、借鉴，照着做。以为只要发达国家曾经用过这个政策，这个经济政策就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就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施与这些国家最终成为一流国家之间一定存在着因果关系。

本土创作的经济学教科书要与中国经济的客观现实紧密结合

过去，我们一直在谈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经济学教学、研究的本土化，核心含义指的是解释对象的本土化，指的是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要基于对中国问题的系统分析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不能简单地直接运用西方的经济政策，并在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去发展经济学，为经济学这座大厦添砖加瓦，作出中国经济学家创新性的贡献。而经济学教学科研的本土化，其中就天然地包含了“经济学教科书中

国化”这样一个内在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能够很方便地接触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使用最多的、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的国际一流经济学教科书的今天，还要致力于经济学教科书中国化的主要原因。

虽然较之过去使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本土作者编著的略显简单粗略且时存谬误的本土经济学教科书，使用原版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广泛使用国际通用的经济学原版教科书并不是与国际接轨的最理想状态。真正需要接轨的是教育体制、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价机制、课程设置和经济学教育的理念，而非使用原版教科书这么简单。经济学教育与科研必须以中国经济为背景展开，经济学教科书的中国化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工作者一个恒久的努力方向。

自清末民初中国人从日本、欧美引入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开始，如何对西方经济学家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进行中国化就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许多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还没有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经济学教科书中国化的努力始于民国时期南开大学的何廉与方显廷。在1926年6月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何廉接受南开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的聘请，归国任教。何廉抵达天津之后就奔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状况，先后考察了北大、燕京、清华、金陵、复旦、交大等十余所大学。这次考察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当时中国非常落后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基本状况。何廉发现，在中国大学课堂里使用的经济学教材均为英文原版教材，课本的内容自然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的，尤其是美国的，而与中国的经济现实毫无关联。经济学教师多是留洋回来的，说起美国经济头头是道，却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历史知之甚少。例如，教师精通美国的税制，却对中国自己的财政制度一无所知。在这样的经济学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看懂英文报纸，却看不懂中文报刊上的金融版面，甚至对某些中文的经济学专用名

词不知所云。正如当时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出的，（学生）“鲜谙社会真正情状，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膜，诸事束手”。经济学教育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现实，使大学的教学活动与外部真实的中国经济世界完全隔离开了。

在现阶段，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作为一个存在严重政府管制和大量国有企业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着许多先发展国家现在已不再面对的问题，面临着许多先发展国家根本就未曾面对过的问题，如广泛存在的政府管制，庞大的、低效的国有经济部门，关键性生产要素的非市场化配置，沉重的税负，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羸弱的社会保障系统，亟待提高的社会管理能力，紊乱无序的商业秩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严重的政府腐败，对市场严重的不信任，对民营经济力量的限制与防范，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迷信与依赖，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所隐含的巨大代价和潜在危机的漠视与回避，私有产权得不到法律真心诚意的保护，等等。在我们的经济学教育中，如果教育者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教育工作者；如果教育者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他就失去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必备的、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就无法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因为他们不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国经济，不能够准确地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具备最基本的正确的价值观。这样的青年人是缺乏洞察力和责任感的，是容易受到错误的传统智慧和直觉支配的，他们甚至会成为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种种谬见的支持者，从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阻碍力量。

所以，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应该以中国经济真实的状况为背景进行写作，努力运用中国经济的实例来阐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对西方经济学家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从结构上和内容上进行调整、取舍与增删，把运用经济学理论理解、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为经济学教育的根本目标。

经济学教科书要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本土创作的经济学教科书必须反映中国在过去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所获得的基本经验教训和在未来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雄冠全球。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从最根本的层次来说，得益于经济自由，就是作为微观个体的中国人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主创造财富、改善自己生活、实现自己梦想的自由。而中国人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虽然还不充分但已弥足珍贵的自由，就是因为党所实行的好政策，这些政策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和开放的伟大政策，中国的市场就无从发育成长，作为微观个体的中国人就难以让蕴涵于自己身体中的聪明智慧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就难以和先进的技术与制度、外国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去创造财富。所以，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是中国经济奇迹能够得以发生的最根本前提。

但我们也为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另外一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世界上也不存在没有代价的经济增长。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技术比较落后，经济增长的效率较低，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尚待培育，政府手中的权力还得不到非常有效的监督，我们单位产值的背后所需耗费的能源、自然资源自然要多一些，我们的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会严重一些。况且，我们还是一个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去发展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这也注定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会付出许多额外的代价。但回望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我们还是无法不对许多原本我们应该也有能力避免的许多代价而感到惋惜，在许多方面我们原本能够做得更好，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供未来汲取。

我们过去所取得的经济成功就其最本质的原因而言，得益于围绕经济

自由所展开的改革与开放。尽管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行政垄断和经济管制，但已获得的经济自由已经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我们在未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把经济增长和提高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感受更加直接地统一起来，从最本质的层面上说，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社会的经济自由度。

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扩大经济自由度呢？解除竞争性经济领域的进入管制，打破国有企业在金融、石油、电信、铁路等领域的行政垄断，开放经济机会，促进市场竞争，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并举的经济政策；创造条件积极主动地推进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把国有资产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积极主动地建设生产要素市场，让市场在土地、资本等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中真正发挥主导性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消除政府进行投资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微观经济干预的体制基础，增加政府活动的透明度，加强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提高行政效率；减轻税负，激活经济系统的活力，改变目前这种国富民强的格局；在解除经济管制的同时加强社会管理，逐步消除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的局面，把政府活动的重心放在良好商业环境的营造上，让市场能够在这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中有序运行，不断发育成熟。

上述提高经济自由度的一系列措施能否得到实施，又取决于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够取得的进展。在现阶段，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会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本能抵抗。所以，比起过去的30年，未来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改革发展稳定是我们时代的三大主题，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如果离开改革，我们的发展必然是低效率的、不健康的和不可持续的。

应以兴趣培养和思维方式的建立为中心

本土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应以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和建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为中心，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对于经济学的本科教育阶段，经济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让学生热爱经济学。那么，如何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呢？主要是依靠理论紧密联系现实，特别是紧密联系中国的经济现实。

经济学的魅力就在于它对现实世界和人类行为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经济学的这种强大的解释力只有在解释真实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如同只能在游泳的过程中学会游泳一样，学生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真实世界的能力，自然也只能在教科书和教师引导下解释真实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培养起来。不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感受到这种解释力，不能让学生拥有这种对真实世界的分析能力，学生就无法建立起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学生就无法对经济学产生可持续的兴趣。

所以，激发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绝不可能单纯依靠教科书的语言风格、材料选择和版式设计这类技术性手段所能实现，因为我们写作的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专业教科书。对于一部经济学教科书而言，读者可持续的学习兴趣主要来源于书中的理论与读者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就是说主要来源于读者在教科书中所接触到的那些概念和理论对他所生活的这个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以及学生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所培养起来的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的大小。

重知识的记忆与积累，轻能力的培育与知识的运用；重记忆，轻创造，重强制；轻兴趣的激发，是我们在经济学教育领域由来已久的弊端。这种重传承、轻运用的教育传统、学术传统，使得为师者把学习理论知识和运用理论工具分割开来，就仿佛不让学生在水里学习游泳，而是止步于

在岸上总结各种泳姿、各种动作的特点和要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学到的经济学就难免不是黑板经济学、考试经济学，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的就难免不是赵括式的夸夸其谈的理论家。

我们的许多教科书，学生使用以后反映很难，学过以后也记了一些概念，但不太会运用，在真实的世界面前束手无策，难以做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由于无法灵活运用，由于无法转变为一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所学到的知识就不可避免地非常容易被遗忘。至少就面向本科学生的经济学教材而言，这种“难”不是因为这些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思想不容易理解，而是因为作者阐述这些经济学思想的方式出了问题。作者往往受到了自身的经济学教育理念、写作理念和作者自身运用经济学原理理解现实世界的能力的局限。那些学生反映读起来很难、很晦涩的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例外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有效地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中国的实际，学生无法在解释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来学习如何解释世界，来领略经济学的魅力。

因此，本土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要摒弃过去那种只注重概念、定义、结论的传递和输送，而忽视对这些结论背后的逻辑推理过程的解释，不注重介绍这些概念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应该如何运用的弊病。教师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教学也不单纯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教师的工作是育人。

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要以学生为本

在当下的学术体制下，学者们的学术性写作和教科书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论文和教科书直接当做科研和教学的“成果”去创作的，而不是作为科学研究、教学活动的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结果”而出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教科书写作就整体情况看没有很好地做到以学生为本，以教学效果为本，而是以作者为本，以编辑为本，以考试为本。

以作者为本，就是说一些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没有进行精心的内容取

舍，以使读者能够更好地认识他所生活的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不太考虑如何进行生动有趣的叙述以激发出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与热爱，而是过多地考虑了作者自身的习惯、自身的方便。以编辑为本，就是写东西以能够发表或出版为原则，在这个前提下越快速越好。以考试为本，就是我们主流风格的教科书是非常便于应付考试，非常便于记忆和背诵，非常便于死记硬背，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要点都帮学生准备好了，找起来非常方便。

以学生为本，以教学效果为本，就是以帮助学生认识当下的这个现实世界为本，以对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为本。我们学习经济学，根本目的就在于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真实世界，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更好地理解实际经济运行中所蕴含的各种因果关系。

如果我们的教师把“教”着眼于“传送”知识而非“育人”，如果学生把“学”着眼于记忆、考试和学分的话，教学就蜕化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学习就蜕化成了一种猎取学分和文凭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就无法获得可持续的成功。

以学生为本，在经济学的本科教育阶段立足于兴趣的培养和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建立，内在地要求我们要摒弃那种面无表情、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叙述方式，要摒弃那种“产品说明书”、“高等数学”式的写作风格，语言要生动有趣、轻松活泼，内容要紧密联系实际。

在教科书的叙述风格上，我们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就是往往认为教科书的叙述风格就应该像产品说明书一样，如果叙述方式轻松活泼了、口语化了，似乎就不专业了、不严谨了。其实，专业与否、严谨与否，与叙述方式的选择之间不是必然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叙述的轻松活泼当然不能以牺牲叙述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深度为代价，同时也不是说要保持叙述的准确严谨，就只能采取产品说明书的方式。教科书的写作，在保持叙述严谨、准确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地以学生为本，以教学的实际效果为根本指向，尽可能用清晰、简洁、有趣的方式来解释经济学理论，来说明经济

学理论在人类活动的广泛领域的实际应用。

经济学教科书产品说明书式的写作风格其实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那个特殊的政治高压年代。知识分子都害怕犯错误，都害怕因言获罪、惹祸上身，所以，都尽力去除掉个人的见解，舍弃掉个人化的表述方式，而统一采用官方认可的内容、表述方式，都尽可能地不去联系实际，而只去孤立地介绍理论本身，尤其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因为这样最安全。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虽然已经今非昔比了，但这种写作风格依然占据着主流的位置。这类教科书看久了，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认为教科书就应该是那个样子，那个模样才够严谨，才够规范，才可以用来教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就很难从根本上摆脱分解组合、互相借用、缺乏个性、大同小异、千书一面的局面。

没有财务自由，就难有思想自由

金钱的确买不来幸福，但整日为金钱发愁的生活很难说是幸福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金钱显然非常有助于人们实现幸福。

什么是财务自由？赚够多少钱就算是实现了个人的财务自由？是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天天什么都不干了，可以天天躺在那里睡大觉，或东游西逛了？不，财务自由最本质的特征是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就是有能力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也就是说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做你自己，发挥自己的天赋，实现自己的梦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金钱不是罪恶之源，贪婪才是罪恶之源。金钱绝对不是万能的，但受困于金钱匮乏的生活很难说是幸福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买不来家庭幸福和身体健康，买不来别人对你的爱，但金钱无疑有助于你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获得人生的乐趣、保持健康的身体，更是你祛除病魔的基本保证。金钱还能够让你有能力帮助别人，从事慈善事业，像卡耐基、比尔·盖茨、巴菲特、索罗斯一样。如果你喜欢胡思乱想，别忘了“没有财务自由，就难有思想自由”。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就曾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金钱不是万能的，但金钱的确是很有用的。没有财务自由，就难以有肉体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

尽管有理财方面的公式可以告诉你，拥有多少财富就可以算做是已经实现了或拥有了财务意义上的自由，但那些公式均不可靠，因为所谓的财务自由，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觉，是一种以“随心所欲”为最基

本特征的生活状态。

因此，拥有多少钱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很容易就能够获得财务上的安全感，不多的钱就能够让他拥有财务自由，而有的人则比较缺乏安全感，拥有了许多钱还在继续痛苦不堪地打拼，继续从事着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的生意。

如果我们不得不为了一点儿微薄的工资忍受一辈子，和自己不喜欢甚至痛恨的人一起工作几十年，如果我们无法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人生还有多大的意义呢？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自由是多么可贵啊！

为了实现财务自由，你必须理财。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但是，乱理财又不如不理财，不如“及时行乐”——及时消费。因为如果没有健康、正确的投资理念，不掌握正确的投资方式，你的“财”就会越理越少。就像我们身边许多从事高风险的短线或超短线操作的、“精明”而“勇敢”的散户朋友们一样。乱理财会把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很轻松地理成“无产阶级”。股票市场，就是有经验的人获得更多金钱、有金钱的人获得更多经验的地方。

你不理财，省吃俭用，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仅有的一点点财富也会最终离你而去，因为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人，是所有国家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自然也不会例外。通货膨胀率就像是温度一样，当“温度”高于零摄氏度时，我们手中纸币的购买力就开始蒸发了。当“温度”高于4摄氏度时，我们通常就会认定发生了通货膨胀。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让你的货币财富不断增加，以抵消蒸发掉的水，并尽力使之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加。

世界各国的统计数据都告诉我们，就长期而言，投资于储蓄存款这类资产只能让你陷入财务的牢笼，而投资于股票则有可能让你通向财务自由。所以，朋友们，快把躺在“存折”里沉睡的钱叫醒吧！

必须理财，因为我们社会很快地老龄化速度。人口研究的数据显示，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就会突破4亿。到2050年前后，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4.5亿。越来越少的工作人口在养活越来越多的老人，所以，你未来的公共养老金也许能够为你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如果你希望拥有一个较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就必须从30岁开始进行规划。如果你想只为钱工作30年，从50岁开始为兴趣而工作，就更得如此了。况且，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退休年龄的提高似乎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了。现在欧洲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执行67岁的退休年龄了。日本厚生劳动省研究会在2011年6月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日本应最迟在2025年之前把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并对那些雇用65～70岁雇员的公司根据公司规模的大小提供最高每人160万日元的补助，以鼓励公司雇用65岁以上的老年人。

由于中国实行着世界上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再加上国富民穷、贫富差距、经济管制、传统价值观和家庭观念的弱化，中国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要比欧美、日本来得更为猛烈。所以，读者一定要认真考虑一下，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你准备为钱工作40年，还是50年？你希望工作到67岁，70岁，还是75岁？

所以，从现在开始理财，为钱工作20年、25年，努力追求财务自由，争取在50岁后为兴趣而工作，再快乐地工作20年，快乐地生活30年、50年。那将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一件事啊！

也别对你的子女抱太大的期望，一方面，他们自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职场竞争；另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希望能够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与父母不同的生活，越来越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独立，越来越不愿意和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这是时代的潮流，也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无可厚非，你喜欢不喜欢都只能接受。他们在未来不会再将奉养自己的父母视为理所当然，社会保障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家庭保障，这其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试图通过对子女不计成本的无私奉献来换取自己在晚年时依赖子女生活，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还可能会给子女的生活

带来很大的负担。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如何度过漫长的老年生活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将来成为儿女们的包袱；如果你不想因为“退而不休”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不想因为忙碌操劳一生而没有真正生活过一天；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相对安逸的晚年；如果你想提前退休，而不是除了在病床上与癌症作垂死搏斗的最后几个月以外，都在辛苦地为自己和儿女操劳；如果你不想整日生活在对贫穷和失去工作的恐惧中；如果你不想永远为了一点微薄的工资低眉顺眼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一名“有工资的奴隶”，你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进行投资。

另外，热爱金钱并不是一种罪恶。当你富裕以后，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与独立；你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别人，从事慈善活动。被大众媒体理解为到处捣乱的“金融纵火犯”的投机大师索罗斯，其实是一个生活极其简朴、处事低调、为慈善事业“挥金如土”的慈善家。在前苏联解体的初期，他曾经为前苏联的核科学家支付了数亿美元年薪，以防止他们迫于生计为独裁政权服务。

金钱的确买不来幸福，但整日为金钱发愁的生活很难说是幸福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金钱显然非常有助于人们实现幸福。

在负利率的环境中，你似乎只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一个选择是长期定投指数型基金，或在市场冷清的时候购买指数型基金、在市场狂热的时候卖出；另一个选择是留下少部分应急的钱，然后在它“蒸发”之前“及时行乐”——消费掉。股票投资的资金门槛和技术门槛是很低的，你只要具备一些简单而正确的投资理念和几万元钱就可以入场了。

银行储蓄则是最常见的但也是最缺乏技术含量、最不明智的一种“投资”选择。因为就长期而言，不仅全世界的实际利率水平都在不断地下降，而且通货膨胀还可能使实际利率成为负数。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你的钱就购买力而言会越存越少。

购买国库券、企业债券、货币型基金之类的货币性资产，比购买银行

存单略好一点，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长期的低利率和通货膨胀会使这类资产的投资者面临着严重的购买力风险。持有的时间越长，面临的风险越大。就长期而言，不同国家货币的购买力都在下降，只是下降的速度不同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讲，与人们的传统智慧相反，就长期而言，国库券、企业债券、存单是一种不安全的资产，其安全性远比不上波动性大的生产性资产，尽管债券的持有人通常能够按照事前的约定，准时收到利息和本金支付。股神巴菲特非常注重投资的安全性，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股神，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可口可乐公司这样的生产性资产，而非“安全”的政府债券。2011 年，巴菲特购买了 107 亿美元的 IBM 公司股票，成为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2011 年，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还斥资 90 亿美元收购了全球最大的润滑油添加剂生产商 Lubrizol。

当然，在一个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应该保持一定比例的货币性资产。但投资者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为了资产安全或获利，通常是基于保持资产流动性的考虑。

在现在这个价位上，房子作为投资手段已经基本上与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了，因为价格已经太贵了。况且在目前这个价位上，即使我们不去争论是否存在泡沫、泡沫有多严重，我们也必须告诉投资者，投资住宅的风险已经很大了，尤其是在投资者使用了“财务杠杆”——银行贷款以后。当房价的上涨能够大大抵消由此而产生的利息负担时，让贷来的钱为自己工作，为自己赚钱，的确是个好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像阿基米德一样充满自信：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撬起地球。

但世界上没有不破的泡沫，现在没有破，不意味着明天不会破。过去几年住宅的价格一直在上涨，并不意味着住宅价格会一直涨上去。树是永远也长不到天上去的。

对于那些准备自住的首次购房者来说，一定不要机械地认为在任何价位上贷款买房都是正确的。使用了杠杆的购房者，特别是那些用来自住

的、经济承受能力很低、收入微薄、买得非常勉强的首次购房者，一定要想清楚：你是只能承受房价上涨，而无法承受房价下跌的。

1996年，中国香港发生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香港影视明星钟镇涛与前妻章小蕙借款1.54亿港元炒楼。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香港楼市泡沫破裂，钟镇涛所投资的豪宅大幅贬值。由于其部分贷款的利率高达24%，其所余本息滚至2.5亿港元，被迫于2002年宣布破产。

在未来，出生率的下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廉租房的大量建设，高房价、高地价对中国经济的致命伤害，民众对高房价的抱怨，投机性购房所产生的闲置房存量，房产税的试点，没有一个是对房价的利好因素。所以，住宅投资在未来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似乎是一项安全性很高的投资方式了。

在政府密集出台的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调控政策下，北京住宅市场上住宅的“市盈率”依然高达50~80倍，住宅的租金回报率不足2%，也就是说还赶不上折旧率，也没有活期存款的利息率高，更赶不上通货膨胀率。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为40~50不等，与国际50个首都的平均水平3~4倍无法相比，况且外国的花园洋房与我们的公寓楼房更是无法相比。那些借债投资房产的业余投资者们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否能够承受泡沫破裂带来的财产损失？

即使对于那些有一定资金规模的投资者，目前的房地产价格也使他们很难实现投资的分散化了。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套普通公寓住宅的价格动辄四五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上的价位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名画、玉石、罕见的邮票、钱币、钻石、红木家具的市场价格的确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但其报价通常是水分很大的，也是波动巨大的。不仅它们的价格是极不真实、极不可靠的，这类物品的流动性也是很差的，变现很难，特别是如果你不是“圈里人”的话。投资者通常在需要变现时才发现必须打一个很大很大的折扣才有可能将其脱手。买东西的时候，你是

“大爷”；等你准备将这些东西出手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是“孙子”。当初满面桃花、把东西卖给你的那些人，突然变得那么奸诈、苛刻、吹毛求疵、冷酷无情。他们只愿意以在原来的价格上1折收购你手中的东西，这还是行情好的时候。如果行情不好，他们只愿意0.5折甚至0.3折收购。

古董、艺术品市场中大量充斥的赝品也是普通投资者防不胜防的。2011年9月，北京燕山华尔森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一审被判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而他用于诈骗的道具，正是两件经过五位权威专家鉴定的“价值连城”的古董：另一件是“金缕玉衣”，一件是“银缕玉衣”。这五位权威专家是：世界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主任王文祥、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主任杨富旭、中国宝玉石协会原秘书长李劲松、原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已故）。这五个权威专家在装着所谓“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圈，看了一看，就给出了24亿元的估价。作为报酬，谢根荣给了这5位专家几十万元的评估费。

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拍中，以7 280万元的价格成功地拍出了一幅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油画的背面还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与这幅画的合影，以及徐伯阳出示的“背书”：“此幅油画（人体）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作。徐伯阳2007年9月29日”。一年后，10位原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届研修班（1982年）的学员同时发布了五幅与《人体蒋碧薇女士》场景、人物都相同的画作，称该幅油画与这五幅油画均是他们在第二学年（1983年）时的一幅人体写生习作。

所以，艺术品、古典家具、古董这些领域绝对不适合“圈外人”进行收藏和投资，更不适合资金规模很小、拿养老钱进行投资活动的业余投资者。这些领域的投资活动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松掌握的“手艺”。事实上，在这个领域进行投资是风险极大、极不安全的。在介入之前，你一定要反



复确认：自己是否“非常熟悉”这一领域。如果是“不熟悉”或仅仅是“熟悉”，你最好不要介入古董、家具、字画、玉石、邮币这种高技术含量的行当。

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实却是，2010 年，中国有 8 000 万人（中国收藏家协会估计有一亿人）在从事古董的收藏，但中国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只有 2 400 万人，也就是说月收入在 3 500 元以上的只有 2 400 万人。2011 年上半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额为 428 亿元，可以想象，有多少投资者的财富已经遭到或将要遭到毁灭性的洗劫。

购买黄金、白银和收藏艺术品一样，在本质上属于投机而非投资，因为黄金和艺术品的所有者无法从黄金和油画的盈利中获得回报。它们没有盈利，也不可能产生盈利，尽管它们的所有者可以从它们的升值中赢利。当然，大多数的投机者最终会因为它们的贬值而受损。

黄金的价格自 2001 年开始一直表现良好，但黄金价格变动的历史记录却比较糟糕。近 150 年来，黄金价格的增长率仅为 2%，近 50 年来的增长率也仅为 5%，仅略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

你可以比较一下，1 克黄金在 1800 年的欧洲能够购买多少斤小麦，在 2011 年又能够购买多少斤小麦。在中国，1990 年 1 克黄金的价格为 60 元人民币，2011 年经过金价暴涨之后，1 克黄金也仅为 300 多元，年增长率为 10%。虽然比统计局公布的通货膨胀率高，但比你实际承受的通货膨胀率高不了多少。

与艺术品一样，黄金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不是生产性资产，也不是货币性资产，不能生息，因笨重累赘还可能会产生储藏费用，这是黄金和股票、债券的一个重大区别。当你购买了黄金以后，你只能期待未来有人会用更多的钱从你手中购买。这在本质上和赌博是一样的。

关于投资黄金，巴菲特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同样价格的一堆黄金和一片农田，一个世纪后，无论使用哪种货币，这片农田都将依然能够不断生产出玉米、小麦、棉花或其他作物，继续带来有价值的回报。而那堆黄

金还是那堆黄金，既不会增加规模，也不能产出任何东西，“你可以深情地抚摸它，它却不会有任何回应”。

至于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会如何？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有时间和骗子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黄金价格的波动幅度就中长期而言是非常巨大的，换言之，投资黄金的风险就中长期而言是非常巨大的。黄金投资者们一定要睁大眼睛，密切关注国际通货膨胀水平的变化情况。“有一种资产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这个世界变成炼狱，那它的价格就会节节攀升。”这是美国投资家查理·芒格说的（芒格是股神巴菲特的黄金搭档）。

不过，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购买黄金就长期而言，一定不如投资股票市场。黄金是没有长期“投资”价值的。黄金更多的是被用来当做投机的工具和躲避严重通货膨胀风险的避风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黄金被看做是一种世界性的避险资产。黄金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一种货币卖出，完全不会有汇兑的损失问题。

除了黄金以外，与其他国家投资者不同的是，中国的投资者还喜欢投资白银这种贵金属，这与白银在中国的古代长期充当流通货币有直接的关系。

那彩票呢？购买彩票是一种娱乐的方式，从来都不应该把它当成一种投资方式。的确，有许多人把购买彩票当成是摆脱贫困、实现人生梦想的一种途径，但这无法改变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比一个人遭受雷击的概率还低很多倍。积累财富，靠的是勤奋、节约、知识、投资，而不是低于遭受雷击概率的运气。

至于投资实业，即使在一个规范、自由的商业环境中，经营实业的门槛也是很高的。经营实业需要一种非常稀缺的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

所以，留给我们普通百姓的投资渠道其实是非常单一的，就是证券投资。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投资理念，以健康的投资理念引领我们安全的投资行为，以安全的投资行为实现可持续的投资收益。我们一定要依靠常

识和正确投资理念的巨大力量，捍卫我们的财富和未来。在抗击通货膨胀、投资理财、追求财务自由的道路上，让我们一起前行，相互搀扶，相互依靠，相互鼓励，永不放弃。

工资是靠不住的

理财对于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在眉睫。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像是一个隐形的税务局，按照通货膨胀率向诸位手中的现金征收“通货膨胀税”。而且这个“税务局”铁面无私，绝无后门和关系，童叟无欺，官民平等。所以，读者目前首要的问题不是赚钱，而是如何保住手中这点来之不易的辛苦钱。在此基础上，再谈增值。

当然，即使没有通货膨胀的威胁，读者也应该关注自己的财富增长。金钱当然不是万能的，但金钱的确很有用。即使你是一位视金钱如粪土的高人雅士，金钱也能让你更有能力去扶危济困。金钱本身并不是罪恶之源，我们心中的贪婪才是万恶之源，不择手段地获取财富才是一种恶行。

理财专家常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但读者看到更多的是事与愿违，那就是财越理越少。所以，这话仅对了一半。我想告诉读者的另一半就是乱理财，不如不理财。乱理财，不如及时行乐，就是把这些金钱的一部分给它消费掉。消费，是一种“合理避税”的手段。避的什么税？通货膨胀税。

如何避免乱理财？对于散户这样的业余投资者来说，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投资理念。这些正确的投资理念很神秘吗？是不是像《九阴真经》这样的武林秘籍隐于江湖而难以一窥真容呢？完全不是。借助于现代印刷术和互联网这样的信息技术，任何投资者都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它们，并且可以很轻松地理解它们。那些最重要、最深刻、最能改变人生的真理总是极其朴素、非常简单的。所谓大道至简，要言不烦。

那么，业余投资者为什么不去照此执行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理念朴实无华，没有较长时间的投资实践，特别是如果没有惨败的经历，很容易轻视它。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者身上所固有的贪婪与恐惧这样的人性弱点，投资者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巴菲特说，投资真的很难，但真的很简单。

无知并不代表愚蠢，而只代表你需要学习。学习本身固然是一种可贵的意识，但知道学习什么才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能力。因为在错误的道路上，你奔跑得越快，离你的目标就会越远。

希望读者在年老力衰时，回首自己的漫漫投资路，不会无限懊悔地说：年少时，我们不懂投资。

珍爱财富，请进行安全的投资行为！

（此为《工资是靠不住的》一书的前言，该书已于2011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春天如果到来，坚冰必然融化

总统阁下：

我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在电视新闻中不断地看到发生在你们国家的冲突、流血和死亡，已经有大量平民死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动荡之中，更多的平民受到伤害，人民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人民的生活被暴力、混乱、无助、恐惧、愤怒和死亡的威胁所控制。

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是谁造成的？这些问题留给历史学家们在未来去做出判断吧！但在此刻，总统阁下，您拥有创造历史、改变贵国人民目前生存状态的机会和能力。贵国人民身处苦难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贵国人民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不能让这一切再持续下去了。

阁下，您现在需要冷静下来倾听贵国所有人民发自内心的声音，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声音；您需要倾听世界所有国家人民对贵国国内情势的看法，而不仅仅是您朋友的意见；您需要认真观察历史前进的方向，忠诚地服从内心正义与真理的召唤，对贵国的未来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来。

春天到了，坚冰必然会融化，自由民主之花也自然要盛开。中国著名的革命者孙文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智者与勇者的选择。过去发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完全消除掉自己身上历史的痕迹，但我们却可以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重新选择不同的前进方向。

历史的确会在我们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但未来却掌握在现在的人手中。贵国人民每人手中都握有一把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总统阁下，

您也不例外。一个自由的国家，对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自由和幸福的。而生活在不自由的祖国，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戴着有形或无形的枷锁，不论他身处偏远的乡村还是金碧辉煌的宫殿中。总统阁下，我们无比焦急地期待着您做出智者和勇者的选择，做出顺应时代潮流和贵国大多数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做出面向贵国未来的选择。民主和自由的光芒已经照亮前行的道路，通向未来的红地毯已经展开，铺到了您的前面，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吧！

愿贵国人民尽早过上平静、自由的正常生活。祝福你们，伟大的民族。

卫志民

2012 年 4 月 6 日

鸣　谢

本书得到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并经院学术委员会审定。

本书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背景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